

黑色文库 第24集



胡显中 著

阳谋下的人生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24集

阳谋下的人生

胡显中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8年

阳谋下的人生

黑色文库 第 24 集

作者/ 胡显中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部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 作者/ 胡显中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My Life as a Pawn in Mao's Political Game

By Hu Xianzhong

Black Series Volume 24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8

www.laogai.org

ISBN 978-1-931550-24-6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25.00

目 录

出版缘起	1
历史究竟应该由谁来书写? (自序)	5
武夷山上的神秘枪声	11
初涉社会, 吃了一堑	19
路在何方?	27
纵论国是	41
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53
歧路、歧路, 铁窗生涯初度	61
三十六计, 走为上!	67
再次出逃未遂	73
黑律师	81
我为管教当枪手	89
肃反肃反, 越肃越反	97
权力与时间的较量	105
当了三个小时的“外交部长”	115
林彪一号通令下的大转移	125
恶毒攻击罪	135
“马车副司机”生涯	141
偷看机密文件	149
劳改犯滚回去!	153
劳改犯的工资遭克扣	167
再次与死神交手	179
雪中送炭好大姐	191

难友群像	197
东风送来春消息	211
吉林大学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223
万花梅为首 先占春色	241
纵论古今笔未休	251
《一个幸存者的思考》	255
打工生涯	259
结束语：友谊来自理解	263

附录：

为纪念反右派运动 50 周年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269
---	-----

世上的一些聪明人，
往往是傻子。
把真理告诉了世人，
自己却在火刑架上丧命。

——歌德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融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社会，如果不经过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

讨和思辨，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8年于华盛顿

勘误表

页	行	原文	更正
7	倒 9、倒 8、倒 7 倒 2、倒 1	做庄	坐庄
15	9	福省委	福建省委
16	18	是的组织	是党的组织
20	2	几年个青年人	几个青年人
29	6	发来发电报	发来的电报
32	9	几乎的一无所获	几乎一无所获
32	14	邻坐	邻座
33	6	材料的不能	材料是不能
35	倒 1	半圆型	半圆形
38	12	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的影晌
41	3	二年前	两年前
53	5	潇潇	萧萧
53	倒 9	挺而走险	铤而走险
53	倒 6	都的爱国主义教育	都是爱国主义教育
54	倒 4	喽罗	喽啰
60	2	刘静	刘靖
60	2	佟东	佟冬
61	8	安局的大门	公安局的大门
63	20	直等转移	直到转移
63	倒 4 64 1、2、4、8	范曾	范增
67	7	背景的这样	背景是这样
68	9	36 远	36 元
71	3	在次恰恰	这次恰恰
75	4	径骨	胫骨
82	倒 6	2 个多月	两个多月
86	13	成大事业着	成大事业者
86	倒 10	鄙漏	鄙陋
87	1	史家的	史家之
87	4	联想的我自己	联想到我自己
90	12	自然找我的头上	自然找到我的头上
90	倒 3	不继	不济
95	倒 3	喽罗	喽啰
96	6	漏室铭	陋室铭
102	13	枷锁争脱	枷锁挣脱
107	9	红色保江山的永固	红色江山的永固
108	倒 13	马克思主义是全部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
109	13	思维定势	思维定式
110	倒 3	混混噩噩	浑浑噩噩
111	15	铍手铜	撒手铜
116	12	太了怕	太可怕
117	2	2 个多月	两个多月

119	5	拌随	伴随
122	5	瓜瓜的	呱呱的
122	16	放我一马	放我一码
125	倒 1	慢慢捂干	慢慢焐干
136	倒 3	后来又人	后来有人
144	6	气喘嘘嘘	气喘吁吁
149	9	切贴	贴切
152	8	后道	后鞞
159	9	龌浊	龌龊
165	3	犯悃	犯困（或暈）
168	倒 7	硬坐	硬座
174	倒 5	吡牙咧嘴	龇牙咧嘴
185	倒 2	不悃	不困
186	16	也触过	也接触过
191	12	疼爱	疼爱
192	倒 5	却的值得同情	却是值得同情
199	13	有如	犹如
202	12	棱在那里	愣在那里
203	1	发表以不久	发表以后不久
205	倒 2	接近起来年	接近起来
208	1	在坐作陪	在座作陪
209	10	20 载辛酸史	廿载辛酸史
211	倒 9	绝然相反	截然相反
218	倒 8	在名字	的名字
220	11	米超群	宓超群
225	13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27	1	一万发拥护	一万分拥护
227	倒 11	《至打手》	《致打手》
227	倒 3	积极因素	积极因素的精神（见影印件）
229	倒 12	做法的错误的	做法是错误的
231	5	照相像	照相
237	11	误导所至	误导所致
245	13	集体们瓜分	集体瓜分
245	16	可以说的人类的	可以说人类的
246	倒	一个谁？	一个唐代诗人高适在《封丘作》中
248	14	杂志的的	杂志的
255	2	集结	结集
257	倒 2	识分子	知识分子
260	嗒 11	值得令人欣慰的是	（“值得”、“令人”二者取一）
263	4	来概：	来概括：
264	倒 6	为了他的完全	为了他的安全
封 3	4	政经济系	政治经济系
封 3	8	他现已	现已
封 3		书作	著作

历史究竟应该由谁来书写？（自序）

胡显中

大家都记得，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不错，胜利者拥有人力、物力、财力……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写而特写，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爱好来写，甚至还可以对历史任意筛选、取舍、剪裁，甚至编造、篡改，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爱好（例如文革期间，林彪上井冈山“会师”之类的谎言就属于这一类）。但是，毛泽东显然忘记了一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点：胜利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垄断历史，更无法垄断后人对历史的解读权、评价权。也就是说，除了胜利者以外，失败者也有权书写历史（虽然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该书流传至今，2000多年了，曾经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评价之高，超过了所有胜利者所写的煌煌巨著。

不论是胜利者写的，还是失败者写的，最终能否站得住，流传下去，并且获得人民的认可。则首先应该取决于其是否忠于史实。

那么，对于距离今天半个世纪以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的历史，作为胜利者的毛泽东是怎样写的呢？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场反右派斗争已经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了。他的估计与实际是否吻合呢？这要由历史来检验，由时间来回答，由实践来裁判。

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面：首先是对人的层面。运动结束以后，55万多右派分子统统被打倒了，有的被送进监狱，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有不少的劳动教养分子后来也被送进了监狱），有的虽然在原单位，但是被管制，强迫劳动，作为反面教员。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全部被消灭了。直到今天，这些人所剩无几，除了自然淘汰以外，更主要的是长期被迫害导致身心倍受摧残，过早地离开人世。再经过几年或十几年以后，这些人恐怕就全部“消灭”了。从这个层面来看的确是“致命的一击”，把这些人几乎消灭得精光。

其次，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却未必。因为思想是不能被消灭的，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其正确与否，不正确的思想会自然而然地退出历史舞台，被人们忘记，销声匿迹（即使花大力气来吹捧，什么精神原子弹呀，什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呀……等等令人肉麻的吹捧也没有用）。而正确的思想则相反，越“打击”越有市场、越有群众，越批越香。到了最后，甚至那些当年的批判者都不得不服气，不得不接受，更不得不佩服，不得不遵照实行。空口无凭，有事实为根据：

1、罗隆基先生建议的“平反委员会”曾经被认为是最严重、最恶毒的右派言论。可是在20年以后，在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设立过这样的机构，不过不叫“平反委员会”，而称为“落实政策办公室”，其实任务是一样的：平反冤假错案。

2、章伯钧先生的“罪行”是提出“政治设计院”，似乎是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云云，何谓“政治设计院”，不就是今天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吗？不过章先生所建议的是四个设计院：政协、人大常委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今天大家都承认：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远未到位，其中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没有真正起到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仅仅是“橡皮图章”而已。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加强这个机构的权力。

这一点已经成为广大有志之士的共识，今后还是应该按照当年章先生的建议来办。

3、再拿“反苏”这一条来说，当时那真是不得了的大罪行。可是仅仅过了几年以后，在与苏联公开论战时，在“九评”里面，就有许多论点或是出自当年某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或者与当年某些右派分子的意见不谋而合。如果“反苏”就是右派分子的话，那些写“九评”的人，以及审批、同意发表、掌握最高权力的人都应该被打成右派分子。

4、当年许多青年学生（包括我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重要“罪行”是：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叫屈。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胡风先生的确不是反革命，而是举国公认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如果仍然坚持当年毛泽东的意见，那些为胡风先生平反的各级干部都应该被打成右派。

5、关于人口的问题。当年马寅初先生所提出的控制人口主张被诬陷为“新马尔萨斯主义”，马老本人则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钳口幽居二十年”。如果当初接受马老的建议，从50年代末期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到了今天，中国的人口总量最多也不会超过8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必定比现在要高得多。实践雄辩地证明了马老意见的正确。

6、关于“轮流做庄”的说法，当然也是对中共权力的挑战。其实，只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然要实行“轮流做庄”。也可以说：“轮流做庄”正是民主共和制的灵魂，是杜绝一切专制独裁的制度保证。哪有像袁世凯那样由“终身总统”进而“登基”做皇帝的民主共和国？就是中共自己不也曾经于1956年9月29日做出过“党的主席规定只能连任一届”的正确决议吗？再来看看今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不也是“轮流做庄”吗？

“轮流做庄”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实行多党制，轮流执

政。在许多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里，这已经是很正常的现象。多党轮流执政的好处首先表现在由竞争产生激励机制，激发各党派努力为选民谋福利，为国家提出正确的政策主张。其主观动机当然是为了争取选票，但客观效果却是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的福利。其次是纠错机制。执政党做了错事，在野党批评，很快被纠正过来，或者被赶下台。这样就使执政党的错误或丑行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什么“文革”的灾难延续长达 10 年之久？就是因为没有反对党，共产党一党独裁。

颇有意思的是，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已经看出了一党独裁对于国家的严重危害。他说过：“斯大林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的只是反对其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¹奇怪的是，既然“还是几个党好”，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中国实行呢？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来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的时候说过：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成为这次农民革命运动“遗嘱的执行人”。在反右派斗争过去 20 多年以后，当年右派分子的许多“遗嘱”都被先后“执行”了，或者被全国人民一致接受了。右派分子的思想不但没有被打倒、消灭，反而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是共和国的功臣，功在何处？就在于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

在章诒和女士所写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里，曾经记载其父伯钧先生的话说：“像胡风、储安平这样的人都是历史人物！”好一个历史人物说！什么是历史人物？就是其是非、功过都应该

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3 页，邓只引述了毛的前一段话。整段话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385 页。

由历史来回答、来裁判的人物。看来不仅仅是胡风和储安平两位，可以说所有的右派分子的是非、功过都应该由历史来裁判，因此，所有的右派分子当然都应该成为历史人物。

今天，究竟谁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历史做了最好的回答，实践做了最生动的结论。

作为那场运动的受害人，作为一个幸存者，今天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公开地、大声地说：反右派运动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许多高级干部共同推进的，完全错误的运动，其恶果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并将继续被证明着。

作为那场运动的受害人，作为一个幸存者，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被迫害的全部经过如实地写出来，向世人展示，向后人展示。以史为鉴，以史为诫！



左起：钟延坝，陶懋颀，胡显中，熊大楞。1989年于北京。



1986年老战友返南昌参加当地党史座谈会期间的合照。右起为熊大楞、熊国模、罗时烽、张自旗、舒之禄及胡显中。

武夷山上的神秘枪声

深山枪声费疑猜

在那山高林密的武夷山上，1948年4月某一天的午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随着枪声响过，127个活生生的生命结束了。他们是谁？是江洋大盗吗？是汉奸卖国贼吗？都不是。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福建省委下属的闽浙赣边区域工部的成员。

那么，枪杀他们的人又是谁？是国民党吗？是日本侵略军吗？也不是。下令枪杀这127名共产党员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审干工作委员会。

共产党杀共产党？老天爷是不是喝了迷魂汤？这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打杀一家人，岂有此理。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谁人能解？

“第二战线”言犹在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处在全面的包围中》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与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民不聊生，以至于丧失民心，所以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江西省南昌市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6年，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刘少奇代表中央对当地工作做出指示。主要精神就是六个字：巩固、发展、提高，并且具体指示应该向浙江、江西、皖南方向发展。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福建，而且是为了全国。曾镜冰从延安回来，途经苏北，陈毅又指示：福建的中心工作要放在闽浙赣边，依仗武夷山的地理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11月曾镜冰回到福建，召开省党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江西的形势：江西从1942年大破坏以后就没有党的组织，因此作出了恢复江西赣南苏区的决策，并任命闽浙赣边区党委委员黄衣禹为特派员。

1947年5月，黄衣禹到达江西省兴国县，6月到泰和县。7月，省委通知他回福建开会。在会议期间，他向省委建议，必须同时开展城市工作，希望省委派人到南昌开展工作。经过省委研究，黄衣禹和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商量后决定，调李健到南昌工作。1947年10月，李健到南昌，以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小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李健搞了一个工作方案。方案认为：南昌是中等城市，产业工人比较少，而手工业者和店员、公教人员、中小学教师比较多，但是他们都非常分散，与我党长期失去联系；再加上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黄色工会的政治欺骗，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很少。因此，打算先在大、中学生中着手建立党组织，并首先选定当地的最高学府——中正大学作为突破口。黄衣禹同意这一方案，南昌的地下党组织由此顺利地发展起来。

由于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南昌已经形成了有几百人的地下党组织，名称就叫“中共闽浙赣边区南昌市城工部”。除了在南昌市的大、中专学校里建立了党组织以外，还在广大的农村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此外，还通过私立心远中学的学生胡康新的关系，联系到中国民主同盟在江西的领导人廖伯坦、唐敬斋和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廖少仪等。

自从 1948 年 2 月起，中共地下党南昌市城工部陆续向湘赣边工作委员会机关据点羊岭山送去黄金 40 余两，银元 300 多块，短枪 20 多枝，以及革命书刊、生活用品等等，占城工部组织筹款总数的 80%，筹枪总数的 90%，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反活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面攻势。

在李健所领导的中共南昌城工部的成员中，除了大量的大专学生以外，还有一群中学生。这些中学生当时的年龄不过十六七岁（按照党章规定，入党年龄应该在 18 岁以上，但是在地下工作环境可以变通）。他们是：一中的罗时烽、二中的熊国模、私立心远中学的钟纯民、胡显中。这四个人是由《中国新报》国际版编辑张自旗（诗人，笔名陈夜）按照李健的指示介绍入党的。后来，胡显中又奉命在心远中学发展了熊大楞、陶懋颀、舒元禄、刘振辉等四名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由胡显中担任组长。

我们这些中学生年纪虽小，但是志向却不小。我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幸福和自豪。但是，在我们单纯而幼稚的心灵里，万万没有料到，在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却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挫折和坎坷。

风云突变冤如海

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任务之一便是筹集经费以支援游击战争。当时的福建省委城工部认为“变敌人的资财为革命的资财乃是城市游击战争的特殊形式”。早在 1947 年 7 月，国民党福建海关查扣了一批布匹和棉纱，总价值大约相当于黄金 200 两。城工部通过海关的内线关系，里应外合冒领出来。这件事被称为“布变”。其中一部分布匹临时存放在城工部副部长孟起家里。孟起家的女佣人无意间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孟起以刑事犯的罪名被逮捕，家也被抄。敌人在孟起家中发现了党的文件，因而发现了其真实身

份，孟起后来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

孟起被捕后，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曾经提出三条营救方案，其一是“假自首”。由此引起上级组织的怀疑，立即调庄征上山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实事求是地认真核实，而是依靠刑讯逼供，认定庄征出卖了孟起，定为内奸，并于9月末处死，这可以说是福建城工部冤案的远因。

1948年初，又发生了阮英平失踪案。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带领一名警卫员化装成商人，从宁德往福州。在中途遇到国民党保安团的巡逻队，二人失散。阮英平自己隐蔽到洋中乡大窝村村民范起洪家。范的邻居周玉库见阮英平的褡裢里有金银首饰，就唆使范起洪联手谋财害命。他们哄骗阮英平说：“国民党兵来了，快随我们上山躲避。”在山上，他们乘阮英平不注意，将其杀害，这是解放后调查所得的失踪真相。当时的情况是，警卫员陈书琴寻找三天没有找到首长，便回到福州，向负责交通联络的苏华和城工部部长李铁报告。李铁给他路费命令他回到出事地再找。陈书琴在途中遇到叛徒，被拘禁在旅店。当晚逃脱，回去再找李，李派一位熟悉宁德的人再次寻找。同时，闽东地委派出游击队发动老乡四处寻找均无果而终。

阮英平是闽东红军领导人之一，改编为新四军以后担任旅政委，1947年被华东局派回福建领导军事斗争。他的失踪使省委领导感到震惊和怀疑。陈书琴为什么丢下首长单独回到福建又说不清首长失踪的原因和经过？陈书琴被拘禁在旅店，竟然能够逃脱？为什么几次去找李铁？而派陈书琴给阮英平当警卫员的正是这个李铁，李铁当时已经调任省委宣传部长，为什么还要关心并且直接处理这件事情？许多的疑点集中在一起，再联系到前面所介绍的“庄征事件”，就认为陈书琴和李铁都是坏人。曾镜冰轻率地决定成立审查城工部的委员会，并且立即逮捕李铁及在省委机关工作的城工部干部。在审查工作中，大搞逼供信，认定城工部已

经是被敌人控制的“红旗组织”。尤其严重的是，省委轻信了在刑讯逼供之下得到的所谓“五一节”前后杀害各地委领导干部的假口供，要求各地在五一节以前紧急处理（即杀害）城工部的骨干。在未经请示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情况下，李铁及城工部的干部共计 127 人，一律被当作“叛徒”、“特务”处死，由此铸成了千古奇冤。这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密集枪声的由来。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案件进一步牵连到江西的地下党组织。这是因为 1947-1948 年福建省委奉中央的命令向江西发展组织。江西的地下党组织就是在福省委指示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黄衣禹的赣南特派员身份也是由福建省委委派的。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稳妥的决定：没有把江西地下党的人调上山，而是切断与江西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联系，让他们独立作战，“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来证明自己”。

在黄衣禹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领导人李健的周旋下，南昌城工部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但在解放后却面临着新的考验：1949 年 9 月，在当时地下党集中学习的地方——葆灵女子中学，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向全体地下党人员正式宣布：由于李健的上级是叛徒，造成组织严重不纯。所以，不承认南昌城工部是党的地下组织，不承认这些人的党籍，只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于是，这个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在南昌正式公开，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所有的成员都作为普通干部，分配到各地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坚持工作和学习，坚信总有一天，党会承认自己的。

苦苦盼春姗姗来

1984 年党中央决定全面清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9 月 12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昆明召开了 16 省、市处理地下党

历史遗留问题的座谈会。

10月底江西省委成立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在工作了20多个月之后，终于恢复全部地下党成员共计652人党籍。我本人因为在1953年以调干的身份考上了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千里迢迢来到吉林省，直到1986年才恢复了党籍。前后历时37年，而其中三分之二的的时间是被当作“敌人”被打入监狱里度过的。



战友钟纯民遗照

在这里需要插述一笔：其实，经过被害人家属的不断上访和中央的调查，早在1954年福建省委就已经澄清了全部案情，并且在1956年6月为含冤而死的127位人平反昭雪。1957年6月，江西省委批发省委组织部《关于南昌城工部地下党组织的处理意见》。这个文件承认南昌城工部地下党组织是的组织，对其成员则按照不同情况分批予以承认：“首先恢复已经重新入党的同志的党籍；其次，解决已经参加工作的干部的党籍；再次，处理没有参加工作而本人申请者的党籍。但是不必公开宣传和登记，以免造成混乱和被动。”然而文件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于是问题又被束之高阁，这一搁就是20多年。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和罗时烽²、熊国模、钟纯民等

² 罗的大哥是民主建国会南昌分会的秘书长，属于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鸣放期间为帮助党整风，甚是积极。开始反右派时，即由江西省委定性为右派。

罗本人所在的省文联领导找他谈话，因为罗在机关内外从未参加鸣放，更没

四人连同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张自旗，还有对我们几个中学生最早进行启蒙教育的心远中学语文老师廖伯坦、心远中学学生胡康新等多人，虽然在不同的岗位工作或学习，都无一例外的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尤其令人扼腕长叹的是，钟纯民在划为右派不久就抑郁而亡，年仅 29 岁³。我和其余几位，终于顽强地活到了平反昭

有说什么反党的话，又自认为清白，就主动交出几篇文章（因为尚不成熟，所以没有投稿）。这一下，在位者如获至宝。他们抓住其中的《乱话三千》（内容主要是批评江西省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大做文章，又用推理法，根据其家庭出身，断言罗对土改不满，对资本主义改造也不满。再根据罗在反胡风运动中被审查年余，又断言其对肃反运动也不满。由于强加罪名，无限上纲。罗不堪其辱，愤而自杀。被救活以后，单位则改用“软攻”：由其熟悉的领导人出面，说服向党低头。并交给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让他学习。这样，罗才开始自我检查，写了 51 页纸，内容完全是根据批判者的发言材料和需要，自我污蔑、乱扣帽子。最后，他因自杀而加重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罗家一门三个右派（包括其父亲），其余还有“中右”几人，可以说是“全军覆灭”。

³ 2006 年末，我读了关于甘肃省“夹边沟”的几本书（包括和鸣凤的《经历：我的 1957 年》、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才恍然明白。钟纯民的情况：（1931~1960）江西南昌人。多才多艺，擅长音乐，会作曲。1948 年在心远中学读书期间，因为不满国民党统治，经张自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南昌市城工部。解放前夕，曾在地下党负责人李健的直接领导下，对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人员进行策反工作。解放后即进入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后转入南昌市公安局做便衣侦察工作。因其家庭背景（其姐夫曾某是国民党江西警备司令）而被辞退。1951 年再次参军，后被分配到兰州，在市花纱布公司从事财经工作。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农场劳动。估计就是在这个夹边沟农场。在 1960 年大饥荒时，饿死在该农场。1979 年由熊大楞自费赴兰州，向兰州市纺织品站反映，经过调查以后才宣布：右派问题纯系错划，予以改正。本文借此机会，特地告慰战友的冤魂，安息吧！

雪的那天。

作为一个幸存者，回顾几十年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追忆含冤而死的战友，深深地感到，有责任把过去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下来，公之于世，一方面是为了告慰逝者，让他们的灵魂得到些许安慰；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昭示来者，以史为鉴，以史为戒！

初涉社会，吃了一整

1946年，我随父母一起回到家乡——江西南昌。父母首先要解决的是房子问题。我家原有的住房被日本军征用了；日本投降以后，又被最早回来的难民们洗劫一空，成为废墟。我们一家只好暂时借住在姑母家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对于我来说，首先的问题是继续学业，也就是选择一家比较好一点的中学。但是在南昌有两所比较著名的公办中学：一中和二中。由于我是从外县回来，学习成绩差一截，所以没有考上。只好求其次，选择了心远中学。因为是私立的，需要交一定数量的学费。以当时家庭的经济条件，也还可以承受得起。

在心远中学的初期，由于我学习成绩好，每个学期都获得数额不等的奖学金。但是，到了1948年的春天，新来的语文老师廖伯坦先生喜欢教白话文。而这正是我的弱项，每当做作文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下笔，这个学期语文成绩陡然下降。苦恼之余，我逐渐发现：廖老师非常器重胡康新同学，经常表扬他的作文写得好，有时还朗读几段作为示范。向来好胜心强的我，开始有意识地 and 胡康新表示友好，并逐渐接近他，向他学习。在胡康新的启发和帮助下，我开始阅读左派文艺作品来，例如高尔基、鲁迅……等人的小说。后来，课余时间，胡康新还带领我去廖老师家里聊天。当然，一般情况下都是他和廖老师之间交谈，我很难插得上言，只有旁听的资格。一来二去，我开始领悟到写作的某些要领，甚至可以说是诀窍。作文的成绩也有所上升。再以后，通过廖老师的关系，又认识了二中的学生熊国模、一中的学生罗

时烽……等几个青年人。

几年个青年人凑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以胡康新为核心。其中的原因，一是他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其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律师，家里有栋二层小洋楼，他自己有专用的房间，可以供好几个同学聚在一起，交流思想，互相切磋。更为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确读了很多课外书籍，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对于大家的活动，他也很有主见。经常出谋划策，并且所料必中，因此我们大家也都听从他的安排。比如他建议我们应该看那本书，我们也就乖乖地听从，读后还要向他谈谈自己的体会，他再加以启发、帮助。总之，他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群青年人的精神领袖。

忽然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冒出了一句：我们何不办一个刊物来？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

1948年的夏天，我和胡康新、熊国模、钟纯民、罗时烽等几个青年学生躲在湖滨公园一个角落里，啃着烧饼商量着筹办文学刊物的事情。我们办刊物的目的，意在进行思想启蒙，唤起群众觉悟，因此为刊物取名为《呐喊》。当时在南昌《中国新报》任编辑的地下党员张自旗支持我们办刊物。我们是通过投稿认识他的，对他也很尊重。刊物组稿、选稿、编辑、印刷，事实上是他一手操办的。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刊物面世了，刊名改为《人民的旗》。张自旗给我们解释，因为你们办《呐喊》闹得沸沸扬扬，已经无密可保，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我没同你们商量改个名称，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人民的旗》通过秘密渠道发行后，在南昌很有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共在香港办的文艺刊物。据胡康新在“《人民的旗》创办始末”一文中说：“这是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把利剑，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恐慌和注意。”

青春的热血在我们的血管中燃烧，革命的激情在我们胸中鼓

荡。此时，我们向张自旗提出，请他设法送我们到解放区去，真刀真枪地干。

张自旗没有同意我们去解放区的要求，他公开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要我们留下来同他一道斗争，并教育我们说，留在蒋管区干革命，就像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尖刀。不久以后，张自旗报经上级领导批准，吸收了熊国模、钟纯民、罗时烽和我四个人入党。从此，我们就成为中共南昌城工部的一员。本来是决心紧跟毛泽东搞革命，并且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日后会发生一系列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令人心寒、心碎的事件。我这个地下党员竟然自己被革了 20 多年的命，还差点革掉了小命；而且 60 多年后的中国现实，仍然距离共产主义十分遥远。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是打算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跑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全集》第 25 卷 第 335 页）。恩格斯也曾经在 1890 年致书战友讨论历史的动力问题时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这个意见概括为“力的平行四边形”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8 页）。如果仔细想想，现实结果和当初的理想大相径庭的现象岂只是发生在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青年人身上？多少老于世故、善察风云的政客不也是如此吗？像刘少奇、彭德怀……，想当初，刘少奇最先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之时，彭德怀“横刀立马”舍命保驾之时，他们会预料到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吗？如果他们有先见之明，能够预测若干年后的未来，他们又将作何选择？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已无法知晓了，但是有一位地位不算高，但也不算低的人物却坦率地披露了心声，这个人就是韦君宜女士。当她辗转病榻、求生无望、处于弥留之际，克服病痛的折磨，奋笔写下了 10

多万字的《思痛录》。她在书中坦言：“早知道如此，我是不会到延安来的。”看来，这些由衷之言代表着许多有着类似经历朋友们的心声。那么，有没有先见之明的人？有。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1949年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人才，特别是具有高知名度的著名学术带头人。为了争取胡适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共产党派出多位说客登门游说，并许以北京图书馆馆长之位，但是胡并不领情。他幽默地一笑说：“他们会相信我吗？”多么清醒，多么睿智，多么洞达事理，多么看透世风！什么叫大学问？什么叫洞察力？胡适便是也。

* * * * *

解放以后，我们被集中到解放前由教会创办的葆灵女子中学学习。后来才知道：这个学习机构就叫“江西省委组织部训练班”，简称“组训班”。“组训班”尚未结业，我和刘振辉二人被派到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房产处工作。为什么派我们二人去？不知道。去干什么工作？很快就明白了：当时军队频繁地通过南昌，再向前挺进。气候非常炎热，大军需要开水供应。我们的任务就是请当地的民工烧开水，日夜供应大军，地点就在赣江边上。为了及时联络路过的军队，我晚上就露宿在江边。那个时候正是8月份，高温气候。但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也觉得有些凉意。而我仅仅裹着一条旧军毯，躺在木版临时搭建的所谓“床上”。那真是“天做锦帐地做毡，星星月亮伴我眠”好一派浪漫的画卷！

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我们回到房产处，已经没有什么适合我们能力的工作了。恰好这个时候，刚刚成立不久的政府机构江西省政府办公厅需要下层办事人员，我们就被转“卖”给新的

单位去了。到了办公厅报到不久，就被分配到秘书处文书科下面的文印股，做校对工作。具体任务是：校对每一份文件。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打字和复印机，机关的公文几乎都是用蜡纸油印。个别重要的文件，则有专门的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字，需要好几份则用复写纸打字，而这一切都应该由我来校对。另外还有保管大印的是秘书长的老婆冯忠革（从名字看得出来：忠于革命），一个很年轻的女士，这又是老夫少妻型结合。股长也是位从北方南下的干部，叫胡志国。另外就是好几位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书写员，他们岁数大都 30 出头，因此，都称呼我为“小胡”。那个时期，江西省人民政府下发的所有文件的最后，在省主席的名字后面，都有“校对：胡显中 监印：冯忠革”这样 10 个字。校对的任务仅仅是核对蜡纸和原稿是否有误，有误则要求书写员改过来。如果原稿有误呢？怎么办？通常应该请示股长，或者起草人（一般都是秘书，或科长）。可是天长日久，我就发现，他们的语文水平并不高，在原稿中经常出现语病。这个时候本来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办，有时工作比较忙，就自作主张，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了。尽管 100 次处理得正确，只要有一次处理不正确，麻烦就来了。什么高傲自大呀，骄傲自满呀……等等，这是工作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对于取消地下党员资格思想不通。经常牢骚怪话，发泄不满情绪。这个问题说轻就轻，说严重也可以上升到很严重。

1950 年的秋天，我的母亲去世。她因为生育过多而患有子宫癌，又没有足够的钱治疗，只好等待死亡。她死前我们子女都来送终，看到她那双可怜而又无限悲伤的眼睛，我们一个个都流下了热泪。晚上停灵于老屋的堂前，我以长子的身份守灵。秋风阵阵，寒意逼人，一灯如豆，摇曳明灭。回忆母亲一生，生活得太悲苦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也不懂卫生常识，生育了 13 个子女，青春和生命几乎全部献给我们这个家庭。

母亲的一生，可以说就是过去社会妇女命运的缩影。前些日子，日本一个高级官员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而被迫辞职。他说了什么话呢？就是说“女人是生育的机器”。其实他说的也属于实情，只不过是“过去式”，而不是今天的情况罢了。

在这个时候，我又做了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我的父亲胡仲乘，早年毕业于警官学校，曾经在江西省的好几个县里担任过警察局长，后来又在国民党的保安第8团担任上尉军需官（共产党称呼为后勤工作），据说他在这个岗位上和团长余材闹别扭（因为团长的岳父也是军需官，父亲看不惯裙带关系及其作风），不得不离开。再以后又在贵溪县担任田粮管理处的主任（相当于共产党的县粮食局长）。抗战胜利后，辞职回南昌，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做点生意，由于不善经营而亏本。晚年身体也不好，家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最后甚至不得不变卖地产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坐吃山空，决非长久之计，因此他经常发牢骚：“大崽不养爷，细崽要爷养”（意思是：我这个大儿子不供养父母，而我的弟弟则需要父母来供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开始琢磨着如何来帮助他找一份事做。在我工作的秘书处，经常有军、烈属来要求给钱、给物，或者要求介绍工作的，有位姓杨的秘书专门接待这些人，并处理这类问题。通常是介绍到某个单位去处理，公文所用的介绍信和公章就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些，我的心中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也如法炮制一下呢？思虑日久，终于下决心一试。我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在公用的信笺上，仿照杨秘书的行文习惯这样写：“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同志：兹有干部家属胡仲乘前来，请你们接待，并量才录用。此致敬礼。”当我完成这个计划以后，又感到担心害怕。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考虑再三，还是作罢。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及时住手，也还算聪明的。问题就在于：我毕竟太幼稚了。根本没有做的事情，有什么好汇报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主动去

汇报自己原来打算做但后来并没有做的事情。今天想起来，完全是多此一举，是庸人自扰、自讨苦吃。于是，单位开会批评我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大家结合平时什么自高自大呀，擅改领导的文稿呀……汇总到一块，这个分量已经不轻了。我最后被开除了。1951年3月31日，在细雨纷飞的下午，我怀揣着一封“辞职信”走出了曾经工作过一年半的省政府大院。走向哪里？何处为家？这个时候真是悲痛欲绝。悲痛之余，我只好大骂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大笨蛋！我记得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卢梭曾经写过一本《忏悔录》，里面记叙了作者一生中的许多错误或恶劣行为。我现在应该忏悔的不是写那封信，也不是中途停止，而是自讨苦吃的所谓“坦白交代”，真是一大蠢事！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可是，以后的事情表明：我并没有“长一智”，而是继续地“吃一堑”，悲乎！

路在何方？

当我踟躇街头、彷徨路边的时候，思想极度苦闷，不知道何处安身。那个时候，我的父亲由于城市里生活无着，为了节约生活开支，早已移居乡下老屋；大姐虽然仍然在南昌，但是居室狭小，也难以容身；还有一位亲戚，就是我的姑妈。她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当年因为同在城里，相对而言来往比较多些。但是，姓李的姑父是地主成分，而深受极左思想毒害的我，认为共产党员不应该再和地主分子的亲戚来往，所以早已避而远之。反复权衡，真是无处可去。

在思来想去之际，时间已经悄悄地流逝，眼看快要天黑了。情急之下，只有硬着头皮往大姐家走去。

当她知道了一切以后，并没有怪罪于我，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床铺和日用品。次日，又领我去姑妈家里商量办法。

就是这个地主家庭的姑妈，就是这个我曾经为了划清界线避而远之的姑妈，敞开胸怀接纳了我，接纳了一个曾经冷淡过她的侄子。我终于暂时有了栖身之所了。

下一步就是考虑今后怎么办？一个快到 20 岁的小伙子，难道就这样混下去？摆在我面前的出路有二：回家和父亲生活，在农村混下去；在城里待机而动。前一条路是现成的，只是我实在不甘心这样活一辈子。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大学，不知道马克思关于城市是现代文明汇聚地和社会进步标志的种种论述，但是我朦胧地知道：城市才是我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而乡村只不过适合养老而已，决不是青年人施展抱负的舞台。

要按照第二条路走，就需要相对长时间在城里混，等待时机。

而姑妈的家就是我暂时落脚的根据地。这样我就成了在姑妈家里混饭吃的“乞儿”。有的时候，当然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接送两个表弟上幼儿园之类。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内心当然是非常痛苦的。我认为，一个有志男儿岂能如此消耗时间和精力？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这样了。

偶尔我也去找过罗时烽，试探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先找一个能赚来饭钱的工作也好，但是没有结果。好像他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从公安局做便衣工作，改为在一个什么农场里混日子。其他的老朋友也不便去找。

告别故乡 远走他方

在痛苦中熬过了3个月吧，终于等到了一个并不理想的机会。中央税务学校中南分校在南昌招生。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应考，直到录取，我才于1951年6月上旬离开姑妈家、离开大姐家，踏上远赴武汉的旅途。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江西，离开那个养育了我20年的“窝”，我应该飞得更高一些。果然，从此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1985年夏天以一个地下党员的身份应南昌市委党史办公室的邀请回南昌参加城工部老同志座谈会。

在这里需要补叙一笔：我报名的时候，不得不隐瞒了自己曾经被开除的历史，伪装成一个社会无业青年。否则恐怕也不会录取的，官方把这段历史称为“历史污点”。

在武汉市前进四路的校舍里，我开始了新的一页。不久，随着学校上了庐山。在这个避暑的胜地学习，真是太理想了。当然，隐瞒历史的思想重负仍然时时压迫着我，连做梦都害怕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向组织坦白交待了。

又过了几个月，天气转冷，山上的气候已经不适宜生活，即随学校下山，回到武汉学习。冬天，是实习期间。我被分配到武

汉某个分局的花楼街税务段（即现在的税务所），实习 2 个月。在实习过程中又因病卧床多日，由于实习期间并没有什么待遇，真是贫病交加啊！

1952 年年初，实习结束，回到前进四路学校里继续学习。不久就开始“三反”和“五反”运动。6 月某日，忽然接到从南昌发来发电报：“父病重，速归”。立刻请假并向学校借点路费，一切准备好，只等次日一早起程。到了晚上，又接到第二份电报：父亡。几天以后看了大姐的来信，才知道父亲起病很急，几个小时就不治身亡。据说那天是传统的端午节，他带领我那年幼的弟弟从乡下走到南昌城里（大约有 20 华里，即 10 公里的路程，据说现在有了公共汽车，只需要 2 元钱的车票。而当年我的父亲要步行 3-4 个小时），先在姑妈家里吃过午饭，当然按照惯例，喝了一点酒。后来又在大姐家里吃了一点东西，就匆匆赶回。来回步行的劳累，加上天气炎热，再由于酒精的刺激，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使血压升高，导致发病。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应该是脑中风吧？

当天晚上，我很久难眠。回想起父亲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过得很不称心。我作为他的长子却无力赡养，且远走他乡无法送终。从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来看，应该说是大不孝！父亲，儿子对不住你的生育、抚养之恩啊！想到这里，泪水夺眶而出。作为他老人家最为钟爱、最为期待的儿子，实在愧对亡灵。

后来大姐告诉我：从三叔的嘴里得知：父亲去世不久，当地的政权机构就接到关于他的材料，从他的职务来看，应该属于肃反和镇压的对象。如果被捕，至少要判个几年，甚至更多。以他的身体状况，肯定无法承受那残酷的劳改生涯。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早死（死时只有 51 岁）未尝不是躲过了那场劫难的幸事。如此说来，《老子》的名言“寿者多辱”很有道理，实在表达了深刻的智慧。

在椰林深处

在税务学校，经过一年学习就结业，按照原计划，本来应该回江西工作。但是恰逢“三反”和“五反”运动开展，据说因为广东省的干部被严重腐蚀，因此被打倒的太多，以至于无法展开工作。于是，把我们这些人转而分配去广东应急。到了广东，再被分配到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县（石岐镇，后来改为石岐市）税务局工作。

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而是语言不通。双方都好像是外国人，说话听不懂。在机关内部还好办，因为都是讲普通话，当地干部虽然说得不标准，但也能听得懂。而我们几个被分配到外勤，经常和企业主交往：宣传税务政策、了解营业状况、查账……等等都需要说话，需要交流。在形势的逼迫下，只有硬着头皮学！还好，在分配到该局的 13 人当中，我和另外两个学得比较快，最慢的是几位河南籍的朋友。大约半年以后，也就是到了 1953 年年初，我就从外勤被调回机关，担任局长和企业主对话的翻译，有时还去县广播站用广东话宣传税收政策（当时恰好实行新税制）。直到现在，凡是遇到广东籍的朋友，我仍然可以和其交流、对话。

在自觉很顺利、颇有一点成就感的情况下，忽然出现了意外的逆转：要我参加整风学习班。据说我有历史问题：16 岁就入了党？按照党章规定，必须 18 岁才够资格，因此，其中必有假。经过我的主动介绍情况，他们外调，终于查明。在某次晚会上，管人事的那位女士特地邀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了李健的回信。大意是：在地下工作环境下，可以通融办理云云。令人不解的是：作为负责全局人事工作的那位股长，也算是老党员了，为什么就不懂这个道理呢？我曾经举出刘胡兰的例子企图说服他们，但都无效。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送到整风学习班去？走这样的形式有什

么用处？

当我回到局里，就知道了答案：原来和我比较要好的女朋友已经嫁给这位股长大人，成为股长夫人了。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由于精神沮丧、心理失衡，导致痔疮复发，并进一步发展成痔漏（从肛门生出几根细管子，通到体外，粪便随时通过这些管子流出来，狼狈之状无法形容）；同时，胃病也严重起来（吃点东西就吐，甚至喝面糊糊也不行）。因此，不得不住进医院，一次手术没有根治，又一次住院。本来打算长期住下去，既医治身体的疾病，更抚慰心灵的创伤。

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转机来了：从报纸上看到大学招生的消息。再细看，更令人喜不自胜：由于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满足不了大学招生的需要（和现在的情况相反），允许其他在职干部和社会青年报考。

又看见了新的希望！次日立即出院，向局长要求报考大学。经过人事股的研究：不批准，理由是：高中没毕业！奇怪，报上根本没有学历的限制呀！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刁难？这就是！

我岂肯善罢干休？于是跑到市委组织部（连非党员也归其管辖）说明来意和理由。他们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并写一纸信给局长。拿着这把“尚方宝剑”，一溜烟地跑回局里，向局长呈上这张纸。这才绿灯放行。

报名以后，请假在广州复习功课一个月。那真是苦和累呀！因为那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啊！考试的成败决定我一生的未来啊！如果考不上，还有脸再在这里待下去吗？只好卷起铺盖走人啦！真是“破釜沉舟”啊！可是展望前程，仍然十分渺茫。

在准备考试期间，晚上通常来到珠江岸边，买一碗“艇仔粥”（就是在水面来回游荡的小艇，专门向游客供应各种粥类小吃）边喝边思考、遐想。既是休息，更是策划。策划什么？如果考不

上，下一步怎么办？想呀想呀，始终不得要领，无计可施。后来我有机会看京剧“文昭关”，当听到伍子胥那高亢的唱腔：“一轮明月照窗前。”和痛苦的独白、看那悲愤的表情、无奈的神态，立刻就联想起我当年徘徊在珠江岸边的所思、所感。天下的有志之士大都有过共同的阅历——痛苦与彷徨。

回忆那个时候的复习，根本没有正确的门径，在图书馆里乱翻书，什么书都看，可都没有什么用处，一天到晚就这样虚耗掉了。现在有许多的复习班、辅导班，真是令人羡慕呀！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几乎的一无所获，心中的紧张自不待言。就这样，一点把握都没有，慌慌张张地走向考场。

政治、历史、语文、地理等几科都还可以，及格没问题；可是数、理、化就一筹莫展了，特别是物理，因为我只学了高中一年的课程，什么力学、电学、热力学……等等都没学，当然无法回答。情急之下，只好出一下策：抄！幸亏我的邻坐很通融，不但不反感，而且有意识地把卷子向我这个方向移动，显然是让我看得更清楚，更便于抄了。事后回想起来，也真是应了那句古话：狗急跳墙啊！

今天公开写出这一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痛苦和羞愧的，也非常犹豫，有点豁出去的心情。一个人的一生，总会做出一些丢人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我所做的丢人事件之一。

回到石岐市，继续上班，可早已是心不在焉了。天天屈指细算日期，盼望消息。终于，盼到了发榜的那一天。当地许多机关都没有《南方日报》，我不得不在大清早就跑到邮局去查阅当天的《南方日报》。当我接过报纸，翻阅的时候手都在发抖。是激动？还是恐惧？我自己也说不清。

谢天谢地，总算看到我的名字了。奇怪！我原来所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可现在，竟然是被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录取。

虽然如此，总算是被录取了，我可以坦然地离开这个令我伤心和气愤的地方，远走高飞了。当时，我是如何回到局里的，真记不清了，反正是如鸟之高翔，如兽之飞奔，一路小跑，回到宿舍，准备行囊。

就在即将起程之时，还是那位人事股的女办事员交给我一个口袋——我的档案材料。按照规定，这样的材料的不能交给本人携带的，可见他们还没有经过什么严格的训练，只图省事。

由于她的疏忽，给了我一个机会。在从石岐市到广州的小轮船上，我反复思考了一个晚上，思考的结论是：这样的天赐良机千万不能错过。在街头小摊贩那里，很容易买到一小瓶“涂改液”。用这种液体可以消灭任何钢笔书写的痕迹（毛笔写的墨迹不能消除）。

本来我可以花很少的费用，住进广东省税务局专设的招待所，但是为了实现我的计划，决定另找旅店住下。在旅店中，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档案袋，把我在江西省人民政府被开除的这一段历史轻轻地抹去，变成这样：1951年3月，被调入中央税务学校中南分校学习。再仔细地包装好，通过邮局寄出。然后再去住那个省局招待所。在等待的时候，顺便买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准备路过江西去看望大姐。后来又发现：所有的大学实行联合招生，每个大城市都有人专门接待，并统一出发到校。这样就可以免去我单独旅行的一切麻烦。于是我又住进他们设在广州的集合地——执信女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执信”两个字。几十年后，我研究孙中山时，才读到关于朱执信的事迹，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思想家》。该文发表在《暨南学报》，很快又被好几家媒体转载。

在广州所买的土特产只好通过邮寄的办法送给大姐了，其中有一样小食品——中山县的特产“杏仁饼”（当地的读音是“亨烟扁”，仅此几个字，就可以看出粤语和国语的差异有多么大，

简直和外语差不多。)，非常可口。寄到大姐手上，再转送给姑妈吃了。几十年以后，听表弟们闲谈时说，在一次姑妈病重期间，儿女们问她想吃点什么东西，她说：就想吃立鑫（我的小名）送来的那个什么饼。可见这个小食品是多么诱人、多么令人回味无穷啊！但当时这些晚辈们忘记了我是从那里买的，后来我又到东北求学去了，所以，他们特地托朋友到东北去打听，结果当然是“泥牛入海”，再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广东某个地方的特产。

寒窗四载 几多甘苦

到了学校，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需要从头学习、熟悉。

大学四年，都学了些什么东西？几十年以后，有朋友这样问我。我略微思索以后是这样回答的：可以概括为二：一半是谎言，一半是废话。闻者愕然。又有人置疑：难道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吗？我又考虑以后，作了这样的修改：一分为三：40%的谎言，40%的废话，还有20%多少有些用处的学问，例如高等代数、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看图与制图（实际就是投影几何吧）。这些东西以后可能会有点用处。至于那些政治课，什么“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纯粹是吹牛、拍马、欺骗老百姓、宣扬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宣传品，也有人称之为“党化教育”，依我的看法，应该称为“愚民教育”。那些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等等，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没有一点用处的废话。有的时候，看到今天的青年们仍然耗费宝贵的青春时光去学、去背这些谎言和废话，心中就感到莫名的悲哀。

1955年的暑假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假期，同学们大都回家与父母团聚。所剩几个南方籍的同学们离家远，为了节省路费，只好留在学校度假。因此，宿舍里冷

冷清请。我的假期安排是这样：半天看书半天玩，玩的方式也不过就是看电影、话剧、郊游——

学习的地点很多，图书馆已失去了往日座无虚席的盛况，环境幽静，是学习的最佳场所；同时学习累了还可以随便翻翻杂志、画报，作为休息。谁知道这“随便翻翻”却翻出了天大的是非。有一天，我随便翻阅一下新到的杂志，翻到《长江文艺》上有一篇文章《声讨江西省文联的胡风分子——刘振辉》，大吃一惊。仔细读来，一点也不错，就是这个刘振辉，是我在江西省南昌市心远中学读书期间，也就是1949年初所发展的中共地下党员。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胡风分子？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一般人都不会声张，躲还躲不过来，难道还要去主动介入？那可真是犯傻了。何况我早已离开江西那个是非之地，远走东北，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避开一切政治风波。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信奉的是“无事不可对党言”的信条。虽然我这时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是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因此我立即向组织报告了这一重大事情。就是这次真诚的也是幼稚的汇报，使我悔恨终身。在上一篇里提到“吃一堑，长一智”的话，可是我没有“长一智”，而是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两次！够笨蛋了吧！

后来才知道：在搞运动的时候，消息传递非常迅速，可能是我的汇报材料很快就传递到江西，经过一翻运动、斗争，结果刘振辉却是如此交代的：“我拿了胡显中的介绍信去见胡风”。这样一来，胡显中当然就成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了。

秋天开学不久，公安局对我进行了突击搜查。重点是信件、照片。不久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开始，我被作为班上的重点人物，隔离反省，要我老老实实交代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

昔日的同窗好友，今天都高高地坐在用课桌围成的半圆型审

判席上；昔日用作教学的黑板上，则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8个大字。瞧这个威严气势，好像是到了真的法庭上。我则孤孤单单地坐在下面的被告席上，他们声色俱厉地要求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审讯的主持人是张秉忱，原来和我很谈得来，经常交流学习心得、相互探讨问题，有时也激烈地争论，事后仍然很要好。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把脸一变，俨然是个真正的法官。80年代以后，我们又经常来往，谈笑自如。由此，不禁感慨万端：“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我和他当年只不过是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已。真正的导演是谁？当然还是那个站在远处、高处指挥的毛泽东了。

审讯进行几次以后，没有什么进展。最后，只好送进学校内部的“集训班”里反省。在这个半监狱性质的“集训班”里，一切行动军事化，按时起床，饭后就端坐反省。大小便都必须报告，如此等等。按照今天人们的认识程度，由于对世界、对外国情况的了解，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所谓“集训班”完全是侵犯人权的，是私设公堂的犯罪行为。

虽然我和胡风没有任何来往，但是，来学校途中私自涂改档案材料的事情，生怕被发现。经过反复思考，不得不坦白了这个错误。

半年以后，看来实在搞不出什么重大问题，“胡风骨干分子”的嫌疑终于解除，但是，根据我在班上曾经散布过“胡风是左翼作家、鲁迅的得意弟子”等等“反动言论”，和私改档案等错误，做出了以下结论：“受胡风思想影响者”给予记大过处分。

放出“集训班”，已经耽误了半年时间，系领导就让我留一级，和54年级同班学习。这个事情被校长匡亚明知道了，他问我：能不能赶得上？我回答完全可以赶得上。他就决定：你回原班去学习！可以补考嘛！绕过系一级的领导，直接干预一个学生的是否留级问题，这完全符合匡亚明的工作作风。从好的方面说，

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从坏的方面来说，那就是独断专行，缺乏民主风度云云。

既然是跟班学习，就必须补考。今天我还记得有一门《国民经济计划》的课程，经过短期复习，补考时仍然得了一个“5”分（当时采用苏联的计分方法，5分为最好成绩），任课老师叫曹铭国。几十年以后，参加我的婚礼时，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并且大声对新娘夸我说：“当年他没有听过我的课，可是补考的时候仍然得了个5分，了不得呀，我的这个学生！”另一位任文侠老师的看法则更为理智。也是在几十年以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对我说：“我当时就看出了问题并且提出，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的课程安排和教学内容都有问题，需要改进。是呀，为什么不听讲，也能学习得很好？这恰好说明：课程内容太教条化了，死板！”当然，任文侠老师关于需要改进的意见，在党化教育的大环境下，也很难实现啊！

真正的问题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是服从于并服务于政治要求的，不允许随便发挥，只能按照固有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不能越雷池半步，更不允许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观点和研究心得。这样的教学方法当然使我十分反感。在课堂上就经常不听讲，桌面上摆着这堂课的讲义，自己却低头看我认为重要的参考书。为此，班长曾经多次对我提出批评，希望我能够尊重老师的劳动，我则说：听这样的照本宣科，不如自己看讲义。两个小时的课，我只要花半个小时就看完讲义。如果听课，岂不是浪费时间？要说尊重，那么，老师首先应该尊重学生的宝贵时间。为了这个问题，在鸣放初期，我就提出：应该允许自由听课。老师讲得好，听众自然会多，否则，对不起，拜拜了。实际上我也是这样做的。我的下一班有位从英国归来的剑桥毕业生叫陈良璧。他担任《资本论》的专题课，从来不写什么讲义（按照学校规定：所有的教师都应该事先写出讲义，并经系领导审阅同意才能够向学生宣

讲)，他上课时只带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据说讲课讲得忒好，他经常是这样：先朗读一段英文版的《资本论》，然后再解释其中的意义。最后，才提到我们手中经过翻译的《资本论》，说这个翻译不准确云云。我听了这些神话般的传说，从心里极为佩服，便决定去听他的课，宁可牺牲本班的课程。听了以后，觉得这位陈老师很了不起，不愧是剑桥毕业的。课余还专门去他家里请教，顺便也聊聊他在剑桥的生活。如此交往，在我的心里早就产生了羡慕心情，希望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够坐在剑桥的课堂上听大师们那精辟的讲课。后来我去英国代办处的问题被发现并批斗以后，有人就问我：你要去英国，是不是受到陈良璧的影响？其实，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如实回答，必然给陈老师带来非常不利。为了保护他，我坚决地摇头说，不是！

在学校里，我还听说北京大学经济系里有位徐毓楠教授也十分了得，学问棒极了，而且会 5 门外语。据说有一次听外国专家做报告，翻译翻不下去时，这位徐教授立即上台代替翻译翻出来。为此，1957 年春天给他写过一信，并附上一篇学术短论，表示希望毕业以后去做他的助手云云。适逢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还专门去北京面见这位仰慕已久的偶像。他正在参加批斗会，出来见我一面，并且告诉我：现在的形势下，根本不可能。这个事情当然只能到此为止了。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这个愿望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身陷“阳谋”

一年半以后，就到了那个黑色的 1957 年，伟人搞了一场“阳谋”。由于受到过“集训班”的洗礼，心灵被严重伤害，在这场运动的初期，我就写出了《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的文章。

为了慎重起见，我先把文章送给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的甘沛霖

（名字不一定准确，记得他曾经参与“四人邦”审判过程的辩护工作）教授请教。本来是希望他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对文章把把关，不要出现笑话和漏洞。谁料到，他根本就不看我的文章，而是规劝道：你是经济系的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经济学，不要去研究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何况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所应该关心的。

一席话，反而增加了我一定要把文章发表出去的决心。从此，我就像是一头野兽，一步一步地走近那个张开的大网，终于陷入了猎手所设下的陷阱里，成为他的猎物——右派分子。

一、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嗎？

胡 显 中

目前全國“鳴放”高潮中大家似乎有一个默契：都避而不談胡風問題。對二年前我國政治生活中如此重大事件，輿論界表示了如此的冷淡與漠視，可驚亦可嘆！（注一）

我認爲胡風問題必須在報紙上公開討論，如有其他重要材料亦應公布。胡風問題所以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公開討論，首先是因為當時把他們當作反革命來辦，是在全國範圍內公開進行的。當今“大鳴大放”之際，黨又提出“有錯必糾”的政策，本該在政治上按照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社會主義法的原則，還他們一個本來面目。在藝術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美學原理，對他們文藝觀點做出公正評價。其次，進行公開討論所以必要還有更爲重大意義，因為當時把他們當反革命來辦，部分地是根據他們的言論、觀點。方今黨提出在政治上廣開言路，藝術上百花齊放之時，爲消除顧慮，有必要澄清這個問題。因為“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明哲保身”雖系旧的處世哲學，但由於階級社會中政治風雲，人物沉浮幾經反復，在人們思想中必然有戒心。

我認爲：根據已經公布的材料看來，胡風等人不是反革命集團，他們是這樣一個文學上的流派：在藝術觀點上有錯誤成分，在文學活動中有日益嚴重的宗派活動。但是他們的文藝思想並不完全反動，特別是他們活動性質並不是反革命性質。爲了集中論證後一個命題，對前一問題我們暫時置而不論，或者假設他全部是反動的。（注二）

我認爲構成反革命罪，必須是企圖①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爲目的。②有了實現這一目的進行了或準備進

胡显中 1957 年写的为胡风鸣冤的文章。

纵论国是

在整风和鸣放刚开始的时候，我立即写了“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对于二年前那场全国性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质疑。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据说过去法学界有过“简单犯罪构成”之说，并且曾成为司法工作的依据。那么，今天就应该由法学界讨论这个理论。不要忘记，这个理论是苏联维辛斯基在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错误原理指导下制定和运用的。

如果我所理解的反革命犯罪构成是正确的话，那么，以此来衡量胡风等人言行又如何？我根据“三批材料”分类如下：

对我国社会的阴暗面，对“三害”泛滥（指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条主义反感，这种反感使他们的情绪恶化走向极端。……这怎么能构成反革命罪呢？

在文艺界进行宗派活动。……胡风等人的宗派活动是服务于什么目的呢？他们要击碎的“铁壁”是指什么呢？过去认为是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未免言过其实。……“动摇二十年来机械论的统治”，因为“现实主义的生机给闷死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挽救“现实主义的生机”。可见他们的活动是为了他们的艺术观点。……天下竟有这样的“反革命”，敢于向党、向全国人民公开自己的观点、信仰、主张？

至于他们所要动摇的是不是“机械论的统治”？他们所

要拯救的是不是“现实主义的生机”？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等等，那是观点的分歧，是是非和谬误的问题，其解决不必借助于监狱和枪杆（用这些也不可能解决），而应借助于讲坛和笔杆。……

我之所以认为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另一个重要根据还在于，也是他们秘密信中所写明的，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读者群众的身上。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也会这样想吗？他们敢作这样的寄望吗？……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希望是否落空，至少他们是认为自己观点正确，会得到群众拥护。在我们科学文化艺术领域里，正是需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的仁人志士，反对以领导人言词为转移、见风使舵、毫无己见的庸夫俗子，说他们是殉道者，那并不是殉反革命的道，只是殉自己文艺观点的道……

过去还曾以如下理由来确定他们是反革命：

个人历史，如胡风、阿垅、绿原等人有过历史污点（此项罪名现已证实为不实之词，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历史真相），但不能妄下断语，而应具体分析历史问题与今天宗派活动之间有无直接有机联系？

胡风等人的言论受到台湾的捧场，这也不足以为证，今天“鸣放”中有许多言论不是也受到台湾的喝彩吗？那么，他们可以休矣。

据说查出他收藏一把蒋介石赠的宝剑，更不能说明问题。暴动吗？实在是开玩笑。……

“通过作品来进行反革命活动”云云，谈起来使人寒心。当时的分析，牵强附会者有之，粗暴歪曲者有之，捕风捉影，根据“微言”引伸“大义”者有之……绝大部分立论很难使人心服，……

该文在校刊《东北人大》上公开发表之后，立即引起舆论哗然，“阶级斗争”的形势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不单《东北人大》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讨伐文章，连《长春日报》上也发表了长篇报道“应声虫——东北人民大学胡显中右派言论破产始末”（该文作者李学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在大连跳海自杀）；省报也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在会上点了我的名（在“文革”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吉林省“左家农场”去放牛，不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对当年的批判有何感想？）。

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又和同学金东郁（鲜族人）合作写了“纵论国是 兼评鸣放”的长文。如果说，前一文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具体案例发表不同意见的话，那么，这一篇则是针对整个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全面的揭露和抨击。例如说到党风不正时，是这样写的：

党只注意欣赏对自己的歌颂，而不注意听取对自己的批评（甚至不愿意听）。因而使那些纯洁的人也染上了虚伪的习气。

接着引述《战国策》上那篇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故事，然后说：

党应该接受那位大臣的教训，更应该向古代那位国君学习。广开言路，鼓励忠言直谏，贬斥阿谀小人，要教育每一个党员和党的领导者有闻过则喜的政治风度。我们的时代需要有更多死谏的忠臣。

应该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时候了，停止那种盲目乐观既欺人又自欺的歌功颂德吧！

关于政治体制问题，文章写道：

资产阶级专政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政党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都必须很好地学习前人的政治经验。何况无产阶级是人类一切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当然的继承人。我们更应该学习、消化，变成“为我之物”。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够了吗？不，很不够。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功绩是：大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和使劳动社会化，那么与此相适应，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启蒙者、民主思潮的发轫人，使人民大众普遍意识到和努力去争取作为人的一切权利。例如：普选权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伟大的产儿。从此，政治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专有物，森严的等级制度、人身隶属关系……等等的废除。总结这一切，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做的就是人性的解放。但是在我国呢？

几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指示过：由于东方特殊的自然条件，人工灌溉工程的需要，产生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自然经济闭塞的特点，是东方封建专制政体的经济基础。这一切情形也完全适合于中国。所以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以及特殊的专制政体长期存在，造成了人性的被压抑，思想被束缚、禁锢。到了近代，又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总之，我们没有自己的1789年；别人引以自豪的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我们没有；别人时代的骄子——卢梭、孟德斯鸠……我们没有。

我记得：在反驳我的大字报上有这样的文字：“我们没有1789年，但是我们有1949年；我们没有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

但是，我们有‘共同纲领’；我们没有卢梭、孟德斯鸠，但是我们有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些话的确写得很生动，很形象。但是，他们那里会预见到：若干年以后，就是这个毛泽东竟然把中国拉回到封建复辟的深渊里去了，还差一点把整个中国给毁灭掉。这篇文章的作者后来又作如何思考？待考）

文章接着写道：

从揭露的情况来看，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不能仅仅用某些党员或领导人的个人意识、品质来解释，而应该求之于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就是专政的某些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尝不可以把“三害”的根源归之于专政机器中的某些部件、零件，因为它们不合适，或者已经不合时了。

1、今后应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他本来就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权力似乎不成为问题，但是过去在许多事情上，却流于形式）。特别是应该改变人大会议的议事方法，不仅共产党，而且其他民主党派及个人都应该允许自由提出议案，或互相提出修正案，充分讨论、秘密表决。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活动，应该允许各党派组织议会党团。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决策的随意性和犯错误的可能性。

其次，改进选举办法，实行普遍的、直接的秘密投票。人民代表应该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并且必须达到 2/3 多数票才能当选。代表随时可以被选出单位撤换。

国家各级负责人员经过选举产生。但是选举时不应该是等额选举制，更不应该自上而下地提出候选人，因为那几乎是在制造“民意”，也就是取消“民意”。选举时应该由各代表团（议会党团）自由地提出候选人（不一定是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在平常的工作中用自己的行动和表率来争取选票，而不是靠作为党员的身份。

为了确保言论自由，除了法律条文规定以外，更应该做到：

物质条件的充分提供。党报可以不登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文章，但应该允许民间办报，并且一视同仁地供应纸张和印刷条件。像萧军的“文化报”在当时条件下禁止出版也许有一定的理由，而今天的条件下则应该允许其出版。

特别重要的是提供精神条件。具体说来就是消除对任何人、任何言论的精神压力。“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誓死维护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是布尔乔亚阶级在其黄金时代的豪言壮语。社会主义民主既然是世界上更高类型的民主，更应该充分尊重这一原则。最近报纸对于右派的言论进行批判，如果是充分说理的，我们完全赞同；但那些夹有痛斥、声讨的，我们不同意其方式；而那些强词夺理、穿凿附会的所谓“批评”，我们反对。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评胡适、梁漱溟、俞平伯等人，都不是工人和农民。能够彻底批判黑格尔、康德、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而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出身来说，恩格斯是大资本家，而劳动人民出身的蒲鲁东却成了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这说明什么？思想领域不是依靠划阶级、评成分来解决的，那是土改时期的办法，现在过时了，用在精神生活中就更为荒唐。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正确地指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文学上的代言人和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思想家在理论上所达到的任务和解决方法，正是这个阶级为自己利益在实践上所达到的。”所以，在思想领域里，用发动群众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认为：虽然根据中国革命史证明，现在的党中央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也难免今后不会犯错误；特别是在

今天“鸣放”问题上。因为 这完全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新的课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新的课题。党中央绝对不会犯错误吗？不见得。不但从抽象的意义来说有这个可能，而且实际上已经犯了错误。这表现在本月 8、9、10 三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上。

大家都承认：目前对右派言论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反批评范围，而具有政治压力性质。对此，《人民日报》社论说：“这种言论受到一些妨碍有什么不好呢？”是的，这么一压，公开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被压下去了，但的确有许多副作用：

把言论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两部分，对后者加以压制，这样就造成一个后果：以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者会把自己所不喜欢的言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定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打入禁宫。对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则用制造舆论的办法歧视之、排斥之，并贬为“落后分子”的冷宫。于是，整风运动把“三害”从大门赶了出去，却开了一个窗口，让其爬进来，危害我们的事业

今天我们所揭发和鞭挞的社会风气和伪君子，是一个已经死去时代幽灵的回光，是我们时代儿童时期的母斑。而“党天下”、“反现状”……云云则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士的情绪。这种情绪乃是对我国政治制度某些不合适、不合时的环节所做出的反映。知识界对于时代所特有的敏感，使他们尖锐地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这些言论应该引起明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真的思考和检讨，而不应该引起误解和歧视。对于认识过程中有“夸大化”、“绝对化”的部分，也应该善意地批评和解释，而不应该招致“莫须有”的罪名。

以上就是两个大学生在 50 年代对社会不良现象认真思考得出的结论。今天，这些话已经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常识了，不用说大学生，只要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对于目前社会弊端丛生、道德沦丧、党风败坏、民风不古等等，都能够说出个 1、2、3 来。可是在当时，说出这些话来的人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受到残酷的处分。

写到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我所读过的书中最有价值的一本，即意大利 16 世纪初著名思想家兼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作者一生坎坷，虽然只活了 58 岁，但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无与伦比的丰富和精彩。《君主论》即其代表作之一，该书在他死后 5 年（1532 年）才公开出版发行。刚一出版，立刻风靡一时。由于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影响力，50 年代被禁。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才恢复名誉，并进而畅销全球。20 世纪 80 年代被西方舆论界共同尊奉为与《圣经》、《资本论》等书齐名的、影响人类历史 10 部伟大著作之一；《纽约时报》则撰文认为：《君主论》是人类具有永恒价值的三部曲之首（其他两部为：《孙子兵法》《智慧书》）。该书的作者则被尊称为“政治学之父”、“国家学说之父”。

《君主论》是一本专门写给君王们看的奇书，作者积累平生经验，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如果要对比的话，可以和我国古代的《韩非子》相媲美。从时间上来说，要比《韩非子》晚出大约 1800 年，但其影响力却是《韩非子》所无法比拟的。据说法国亨利四世被杀时，人们发现他贴身带着的竟然就是这本已经染上鲜血的《君主论》；赫赫有名的路易十四，对该书情有独钟，每晚都必须研习此书，否则就难以入睡；拿破仑对该书更是百读不厌，胜利的联军在清理滑铁卢战场时，从缴获的物品中就发现这本被拿破仑写满批注的《君主论》；希特勒的床头也经常摆放着这本书，以备翻阅……，总而言之，几乎所有的统治者无不重视从这本书

中学习和吸取智慧。

在这里，我所要引用的就是该书里一段非常有价值的话：

君主必须竭尽全力，预防可能发生的祸患，只要预见到苗头，就很容易清除它。如果等到祸患临头，甚至病入膏肓，那就无可救药了。好像医生看病一样，在患病初期诊断困难而治疗容易，如果没有检查出来也就无法治疗，等时间拖到容易诊断的时候，治疗起来就困难多了。国家大事也是如此，如果能对潜伏着的祸患明察秋毫（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做到），就能有迅速挽回的对策。如果没有及时察觉，让祸患发展到妇孺皆知的地步，往往就无法挽回了。（该书第1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这段话可以说是《君主论》里最精彩、最深刻的内容之一。一个人有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诊断难；后期则相反，诊断容易，治疗难。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当这个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即使有些弊端，也容易克服；可惜的是人们并不认真对待，听任其发展、恶化，到了晚期，社会的“癌细胞”全面扩散，已是无可救药了。今天许多国内外人士都看清了中国问题的实质在那里（诊断容易）但是，却无回天之力了（治疗难）。对于一个晚期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华佗再世、扁鹊重生，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恐怕就是这种情况了吧？可惜呀可惜！

*

*

*

文章发表以后，批判的大字报如雪片一样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我的床头。这些可爱的同学们啊！我只能借用捷克诗人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话来说：“啊，人们要警惕啊！我爱你们！”几

十年以后，这些同学也都一个个清醒过来，发现当年被欺骗、被利用的真相以后，会作何种感想？别人我不清楚，只知道当年的副校长佟冬，他后来被调到省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时，恰逢文革时期，被揪斗、坐“喷气式”……当我回到学校，暂时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晨跑步时，经常遇到这位老校长。有一次，他非常动情地对我说：“当年我主持整你们这些右派，后来我也被整时，就感到对不起你们了。”这真是肺腑之言啊！看来，一切被整过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有道是：“整人者，人恒整之”我记得老诗人、文学家夏衍有打油诗云：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应该承认：文革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毛泽东把一切坏事都做绝了，物极必反，迫使所有被整的人觉醒了，认清其真面目，并抛弃对他的迷信，从而走向清醒。

再来追述当年的事情。对于这些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词：

信步回廊，冷眼笑看野草闲花；
急趋会场，热肠怒挥舌剑唇枪。
既是答复，权作战表。

这几句小词，未曾想竟然被有些同学记住了。大约是 2001 年吧，有位在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市）工作的、原中文系的同学王树森带着其子特地来长春找我。其子王宁在加拿大读博士，正在写毕业论文，需要收集关于当年反右派运动的某些材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关于我的资料。这对父子千里迢迢来长春，几经辗转才找到我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由其子背诵我当年那首小词。这样一来，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大大地缩短了。我听起来，真是非常惊讶，又十分兴奋：事隔 40 多年之后，竟然还有人能够背得出我写的那几句东西，而且不是这位同学本人，竟是他的下一代。

能不感到异常兴奋吗？更为稀奇的是：当我拿出全部资料，供他选用时，王宁选了一些他认为有用的资料，准备告辞时，又突发奇想，利用我家的电脑上网一查，竟然发现，他所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就有我的《孙中山经济思想》这本书，当时就把这本书留下来。我的一本 10 多万字、薄薄的小书，竟然被摆放在异国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知道这个消息，能不令人高兴吗？

*

*

*

在本节的最后，还应该提到那些受我牵连的无辜者。当辩论初期，有许多同学公开表示支持我的观点，后期则有些人认为，应该允许我本人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当然，这些好心人无一例外都被打成了右派，其中包括共青团市委派来的联络员谷长春，此人后来当然也被“改正”了，并且仕途一帆风顺，官至副省级。而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和我共同写作“纵论国是 兼评鸣放”一文的同学金东郁。他平时和我观点接近，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在运动初期，因为要赶一篇文章（《吉林日报》社的记者要求次日上午就写出我在会上的发言稿，以便发表。），我才请他帮忙参加写作“纵论国是，兼评鸣放”。

在学生食堂的饭桌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写到晚上 12 点才完成（他写前两段，但有许多激烈的话是我加进去的）。他后来当然也被划为右派，在辽宁省某地劳动教养。平反以后在辽宁省委党校办刊物，并于 1989 年出版了合著的《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奥秘》和许多文章，最后取得正高职称。

以上都是因为同情我而被划为右派，似乎“罪有应得”，耐人寻味的是，在批判、斗争我的过程中，表现得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坚决、语言最尖刻的人物中，有不少人也被打成右派。例如法律系的讲师王惠岩、马列部的讲师侯放，在当时都是被学校指

派来加强批判火力的骨干力量。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体味胜利的喜悦，就落得和我同样的命运。还有一位记者，就是那位在《长春日报》上发表长篇报道“‘应声虫’——东北人民大学胡显中右派言论破产始末”的李学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而且在大连跳海自杀。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共产党资深干部李锐悼念田家英的两句诗：“水暖先知犹遭劫，只因佛法大无边。”好一个大无边的“佛法”啊！



胡显中和金郁东（左）1989年在沈阳。

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看来，在吉林大学是不可能获得公正对待的，于是，我只好一走了之。在离开之前，又贴出了“最后一言”的大字报。写些什么早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是不应该忘记的。据说，有位物理系的女同学叫邓荣玲，竟然在我的大字报上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几个字。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字是送出发谋刺秦始皇的壮士荆轲的。按照这几个字的意思，我岂不就成了她心目中的勇士吗？对于我来说，这个称号当然是不敢当的美誉，但对于当局来说，则恐怕是不能容忍的罪过了。所以，她当然被打成右派分子，据说在被处分以后又因尿毒症而不治身亡。这又是一个被我所牵连的牺牲者，可叹！仅仅因为写了几个字，就把小命葬送了。

离开长春，在北京先后走访了高教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都吃了闭门羹。客气一点的说：你应该回原单位解决问题。横蛮一点的则斥为“无理取闹”，不予接待，令我马上走开。

就在我脚踏街头，求告无望之时，把心一横，决定挺而走险——去到英国驻中国代办处。

在走这一步之前，不是没有经过思想斗争的。长期以来，所接受的都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准确地说是“党化教育”。说什么：应该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是党培养了我，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应该感恩戴德……云云。

关于爱国，最好的答复可以引用最近在网上读到台湾龙应台女士的文章。题目是“相信——不相信”。她写道：“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曾经相信过爱国，

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龙应台说得太好了！

还可以听听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说法：“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如果要批评别人不爱国，那么，中共首先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1924年春天，中苏两国外交谈判的核心内容就是外蒙古问题。按照爱国的原则，共产党应该支持国民党的立场，要求苏联军队从外蒙古撤走；可是当时的中共竟然站在苏联一边，宣传外蒙古应该享有民族自决权。中共的宣传使孙中山先生大为不满。最后外蒙于1946年独立，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使中国失去了156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又如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打算强行收回被苏联所控制的中东铁路。举国舆论一致声援；可是中国共产党却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军队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因此，国民党严厉谴责中共是“卖国贼”、是“卢布党”。中共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其心目中，国民党所代表的国家并不是自己所理想的国家，所以不值得去爱、去效忠。同样的道理，1957年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一党专制、极权统治下的暴虐国家，还值得我去热爱和效忠吗？

一个国家，一个党，如果希望自己的人民和党员都来热爱她，首先应该问一问：自己的形象如何？是否值得人民或党员去热爱？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民应享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等）那么，她还值得人民去热爱吗？如果在这个党内，只有党魁说了算，其他普通党员都只不过是供党魁驱使的喽罗、走卒、炮灰，那么这个党还值得党员去热爱吗？

再来说党恩问题：我上大学是党供养的吗？党从哪里拿这么多的钱来供我上大学？是毛泽东从他那湖南韶山老家里拿出来

的钱吗？党只不过是**通过税收或其他形式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提取“民脂民膏”，在首先供党魁及其亲信们全方位“各取所需”**以外，用剩余部分来培养一批批将来为其效劳的忠实信徒而已。在各级学校里都有这样的宣传，目的无非就是要求青年学生们感恩戴德、歌功颂德。真正应该感恩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值得我们去感恩。也就是说：人民和国家不能划等号。在这里，不妨重温爱因斯坦的名言：“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说得多好啊！今天，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德国政府大楼上，就镌刻着这句名言。看来，哪个国家、哪个政府是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不能仅靠宣言，而应该看其实际行动如何？恩格斯说过：“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宣言和纲领更有价值”。既然国家和人民不能划等号，党就更不能和人民划等号了。

我还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无祖国”，他还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由于反动势力的不断迫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不得不辗转逃亡于欧洲各国，颠沛流离，终日奔波。如果按照“祖国”的概念，那马克思和恩格斯岂不是经常“背叛祖国”吗？我决心一搏，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在英国驻中国代办处的门前遇到守卫的警察：他问我干什么？由于没有经验，回答支吾，当然不许进入。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又来了一位中年男子，也要进去，同样被挡驾。于是我和他攀谈起来。听口音断定他是广东人，便改用广东话和他交流。他叫邱文生，我自报是武汉大学学生李克坚，至于来这里的目的当然用不着说了。后来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硬是让那个警察放我们进去了。经过传达（一个中国的老头）我被允许进入院内，绕过庭院便到了会客室。稍等一会儿，接待我的是三等秘书伊文斯。我说明来意后，得到如下资料：英国各地风光的照片集和杂志、申请入境的表格……最后的回答是：你可以向外交部提出申请，然后再到我们这里办理手续云云。这个老外真会开玩笑：我是被

迫害才要求出国的，你叫我去外交部申请，岂不是往枪口上撞？

无功而返，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南昌，在姐姐家里暂时住下，听候发落。8月末，收到学校的通知：立即回校，并且寄来了旅费。我当时真是太天真了，以为学校会分配给我一个岗位，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有个三弟年纪尚小，大约 10 岁吧，在上小学。由于父母早亡，我又正在学习期间，只好暂时由大姐抚养着。现在我大学毕业了，理所当然应该让我接过这个任务。经过准备，我带着弟弟回到长春。

刚住下，就被党委书记陈静波找去谈话：你不能带个弟弟。我说：为什么？我用自己的生活费（当时已经划定为极右派，不给职务，不给工资，只给生活费每月 30 元吧。），兄弟二人节约一点也够用了。他又说：宿舍里不能带家属。我说我们兄弟二人共用一张床。说来说去，还是不允许，一定要把弟弟送回去。我



作者与到访的三弟在吉林大学招待所前留影。

又说没有路费。陈说：学校可以借钱给你。我说不放心。陈说可以让你亲自送走。几经交涉，最后确定：三天之内把弟弟送走。

临别之时，我带他在校园里逛了一会儿，最后才不得不把以上的消息告诉他。当我艰难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哽咽了，最后忍不住和他抱头痛哭。哭过以后，决定带他上街买点日用品，也算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尽了最后一点心思。今天，回忆起这段伤心痛史，不得不强忍着眼泪往下打字。最后还是禁不住流下热泪。

古往今来，多少天才作家的生花妙笔也写不尽人间的生离死别。

火车的鸣叫，好似我内心的波涛。车轮和轨道的撞击声，时时叩击着我那痛苦的心。看着熟睡的小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还不可能知道这一幕悲剧的实质是什么、原因何在？他早就盼望着我带他离开南昌，到外地去闯荡世界。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他的失望、他的疑惑……像鞭子一样不断地抽打着我的心。

从南昌回到学校，第二天就开始审查我去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奇怪了，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在批斗我的大会上，陈静波是这样说的：胡显中把我们的公安人员看得太无能了，他们不是白吃干饭的。最后，我不得不交代一切。

过了许多年以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大约是有人去印度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吧，通过这则消息，我才明白：原来只有大使馆才有资格为受迫害者提供政治庇护，而当时的英国代办处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这是其一。其二是，即使大使馆有这个权力，他们也不会随便轻易使用，要看这个人是否有价值，为了某一个人是否值得和驻在国闹翻？而这些知识，当时我都不具备。总而言之，幼稚、天真！

人生是单行道，而不是双向车道，没有回头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能一次通行。生活的教训是深刻的，更是痛苦的，当然也是宝贵的。

不久就召开全校批斗大会。以前的会叫“辩论会”，后来则升级为“批判会”，地点都是在校部大楼的大礼堂（现在的图书馆大楼，而这一次是“批斗大会”地点就在“鸣放宫”，名称不同，当然气氛也不一样。我清楚地记得，在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横



这座建筑物是作者最后一次被批斗的地方，原来是日本人建的大庙，1957年被称为“鸣放宫”，80年代成为大礼堂，用于放映电影。



作者当年被批斗的地方——吉林大学校部大楼的大礼堂，现为图书馆大楼的图书馆。

幅写着“声讨右派分子胡显中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行”，在大会开始不久，就有人递条子：要求让反革命分子胡显中上台亮相。于是我只好乖乖地照办。那个时候不像后来的文革期间，还允许我坐着接受他们的批斗，但这样地坐着也是“如坐针毡”啊！

在发言的人当中，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个人（名字忘记了）发言说：“胡显中是小有歪才”，下面就做了说明：他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才干，但是却是用在歪门邪道上，所以说是“小有歪才”，再就是校长匡亚明最后的总结发言，他首先数落我在北京去英国代办处时使用了“化名”。他说：如果是好汉就应该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为什么不敢亮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呢？当然是心里有鬼嘛！后来我才知道，他曾经做过地下工作，我不知道他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都用“真名实姓”？当环境不允许一个人使用“真名实姓”时，还要坚持使用“真名实姓”，岂不是去送死吗？我们到底是应该批评使用“化名”的人，还是应该抨击迫使人们使用“化名”的环境呢？

批斗大会以后，我已是老鼠过街、人人侧目、臭名远扬了，此后，吉林大学历届的学生几乎都知道：1957年出了个右派、反革命、叛国投敌分子胡显中。这三顶大帽子和反面教员的身份一直陪伴着我走过了漫长的23年时间，以至于几十年以后，当我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到陌生人，他听说我的名字立即大为惊讶，他之所以惊讶，首先是惊讶于我这个人竟然还活着，真是奇迹啊！

这个人姓郭，是经济系60年以后的毕业生。那天我去省出版局办事，在和对方交谈中亮出自己的名字，在另一处办公的这位郭先生立刻走过来和我对视很久，才半信半疑地问我：你就是胡显中吗？这样我们又交谈许久。据他说：几乎每届新生开学，都要经过政治学习，事先打预防针，内容不外是：要注意站稳政治立场，要听党的话……云云，千万不要像胡显中那样……



东北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1957 年毕业生和老师合照。前排右起：校党委书记陈静波、副校长刘静、校长匡亚明、副校长佟东、系主任关梦觉（民盟中央常委）。后排右一为李贤祖，右二为作者，右五为谢永新。中排左一为李骞，左四为金东郁（右派）、左五为张秉忱。



歧路，歧路，铁窗生涯初度

1957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4时左右，我刚下班回到宿舍，学校保卫处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的问题已经移交保卫处来管，看来已经正式列入敌我矛盾范围了。这个结果虽然早就应该预料到，但是真的来临又有些不祥的预感。边走边想，很快就到了保卫处。有两名便衣人员早已在坐，立即站起来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到局里谈谈。”随即跟着上了他们的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开进了安局的大门。从此，“衙门一入深似海”，23年再也没有出来过。

在便衣人员的引导下，七弯八拐，终于来到一间办公室。他们先是喝令我：“举起手来！”从前只是在电影里听到过这样的声音，现在却亲自听到了，而且理智告诉我，这声音就是命令自己的。啊！这就是被捕了。他们开始搜身，并且命令我：把裤带解下来，把现金交出来……所有程序进行完毕之后，命令我跟着走到一间小屋前，用铁锁打开铁门后，命令说：“进去！”我提着裤子迈进了小房间，铁门砰的一声关上。这个时候我才猛然醒悟，突然说：你们不是说要谈谈吗？回答是：“下班了，明天再谈吧！”当沉重的皮鞋声渐渐远去以后，小屋里才有人说话，是招呼我的：“坐下，别老站着呀！”东北地区11月的天气，4点多钟，外面的天色开始暗下来了。我又是处身在一个小屋里，视线一时不很清楚。慢慢地才看清，原来小屋里已经有两个人，一个老的，一个中年人。他们开始安慰我：不要着急上火，事情不会坏到哪里去，也不必有什么负担……，最后还问我：“吃过饭了没有？”我说“还谈什么吃饭？”他们同声说“没有吃饭，可

以要，不要白不要。”我说：“现在怎么还能吃得下饭？”他们又说“不吃也得要。”就这样，那个中年人开始向卫兵要求：“报告班长：这个新来的还没有吃饭。”那个卫兵说：“他没有吃饭，关你什么事？他不吃不饿嘛！”这个时候才觉得肚子有些饥饿感，于是就接过话头说：“同志，我是新来的，还没有……”不等我说完，卫兵大声斥责说：“谁跟你是同志！”他二人才告诉我，不许叫“同志”，应该叫：“报告班长”。

“报——报，报告”刚开始非常不习惯叫“报告班长”。回顾8年来，对人习惯称“老师”或“同志”，那里会称呼什么班长，更何须要“报告”？这一套现在必须去适应！终于喊出了“报告班长”这四个字。

饭是送来了，可是没法下咽。高粱米饭，硬得很，还是凉的。所谓的菜仅仅是一块咸菜（苳蓝疙瘩）。我看一眼就饱了，一点食欲都没有，一口也没有吃。一看我不吃，他们二人立即分而食之，风卷残云一般，顷刻就消灭了一盒饭。再问他们，才知道：每天两顿饭：上午8点，下午3点。可是3点开饭到这时也就是二个小时吧，怎么又能吃下这么多？他们回答：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大家开始攀谈起来，各人谈自己的“案子”。忽然他们问：“你的行李呢？”这才想起来需要被子和褥子等等。于是又开口“报告班长”，回答是：“今天都什么时候了？明天再说吧，克服一宿嘛！”怎么克服？班长可不管了。

还好，他们二人都很热情，每人分出一个褥子，就够我用的了。就这样过了一晚。要说他们的卧具，卫生就没法讲了，散发出令人不愉快的气味，我只好不脱衣服，和衣而卧，倒也勉强地凑合过了。第二天是星期日，更谈不到送行李的事情，这样，一直等到第四天，星期二，才送来我的被和褥，而我已经凑合睡了好几天了。

睡觉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仍然没法解决。饭太硬，我要求：

可不可以给点粥喝？回答是“你以为这是在你家里呀，想吃啥就有啥？”这样几天，实在饿得不行了才勉强吃一点。当然所剩下的，都由他们二人“消灭”掉。直到 10 多天以后，由于饥饿，也由于口腔逐渐习惯了这样硬的食物，慢慢地，也能够全部吃掉，还有些未饱的感觉。

其次是大便问题。由于吃的是高粱米饭，大便困难。但是，“放茅（茅？）”（集体上厕所的时间，犯人称为“放茅”）必须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完成，否则，那么多个小房间，一个一个地放，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放完？所以，刚蹲下还没有什么动静呢，外面班长就大声喊了：“快点”。再不就用钥匙使劲地敲门。越是如此催促折腾，越是解不出来。心理上的苦恼转变为反感，极度反感。但是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字：“忍”。从此，这个字就伴随我度过了 20 多个春秋。

除了一个“忍”字以外，我还有那么一点幻想：以为关押些日子也许可能放回去。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还存在这样的幻想呢？因为我记得早在 1955 年肃反的时候，学校经济系有位张汝楫老师⁴因为有“反动言论”再加上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因而被斗了好久，最后又关押起来。但是过了几个月，却释放出来，仍然在系里担任教学工作。当局不是这样说吗：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也许对我关押些日子就放了吧，这个幻想直等转移到大监舍里才打消。

在这个小囚室里生活了一个多月，提审了 5 次，内容无非是把在学校里交代的事情再说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出入。只有一次是预审员特地问我：你还写了什么东西？比如匿名信之类？我回答绝对没有。他又问：“是你写的‘范曾不走，项羽不亡’吧？”

⁴ 张汝楫老师，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50 年响应中共号召，并说服化学家唐敖庆一同回国。回国以后，一直在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从事教学工作，后来唐敖庆荣任校长，而张却锒铛入狱。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范曾是何许人也，当然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或信。问过以后也就作罢，但是我却记住了“范曾”这个名字。

后来有机会读书时，读到《古文观止》中苏东坡的“范曾论”才知道他是项羽的谋士，后来因为意见不合离他而去。重要的是我在苏东坡这篇文章中读到这样的名言：“合则留，不合则去”此言真是深得我心哉！由此推断：当时必定还有一个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或匿名信，引用了范曾最后离开项羽而去的故事，来说明中共反右派大失人心的危险后果。

“合则留，不合则去”本来应该成为任何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准则。最近我收到从海外寄来的《黑色文库》第12集陈奉孝写的《梦断未名湖》一书，才知道他也是在被划为右派以后，千方百计地企图外逃，因而被捕判刑15年。为什么仅仅是不愿意在你这个国家里生活，就要被判刑呢？中共一贯对外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就算1949年以前是这样，但是以后难道就不可再选择吗？如果情况和感情都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不能重新选择呢？男女之间在恋爱和结婚初期，没有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没有不是如胶似漆，如糖似蜜的。但是当双方感情破裂以后，不是也可以离婚、可以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吗？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就必须从一而终，不许另行选择呢？这个逻辑实在太荒唐了！这难道不是强迫“婚姻”吗？

一个多月以后，大概是因为预审已经结束了，便把我转移到
大监舍里。在这里又是另外一翻景象：上下二层，每层10个号子，围成一圈，故又称为“圈楼”。每个号子大约20多平方米，容纳10多人，有时挤20个犯人。看守站在中央的台上，上下20个号子里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如此巧妙的设计出自何人之手？答曰：日本人。毛泽东说要砸碎旧的国家

机器，可这个日本人造的监狱仍然被保留下来，直到几十年以后，我回到长春，每每乘车经过人民广场时都习惯性地远远地向这里一瞥，看到一切依旧存在。我真的好想把它拍照保留下来！因为那里是我曾经蹲过 4 个月的地方。直到 20 世纪末，由于经商的需要，它才改建成又一座高楼，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在“圈楼”里，因为人多，不能没有规矩。第一条规矩就是谁最后来的就睡在靠近便池的地方，我当然也不例外。就这样睡在便池旁边 10 多个日夜。直到有了后来者才逐渐挪移，到距离便池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第二条规矩就是每个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专用的代号。我记得自己的代号是 573。这说明：这里至少关押着近 600 名犯人。如果看守来提人，只要喊他的代号，就有人大声回答：在这里！在这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用不着为“放矛”问题而苦恼了，因为便池就在室内，随时都可以上厕所。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每天洗漱用水、乃至喝的水来自何处？不是别处，就是取自便池后方的出水口。也就是说：我们所用和所喝的水就是从距离大小便不到 20 公分的地方取来的。这样对待犯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本来是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办法，这个时候中共竟然全盘继承下来，用于对待在押的政治犯。这难道不是虐待吗？考虑到这样的来水渠道，我宁可不洗脸，也不洗手。就这样，在这里生活了近 3 个月，没有洗过脸和手。据说：在南非的监狱里长期关押的曼德拉曾经控告当局虐待他，证据是：好几天都没有洗换衬衫。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今天中共当局对待政治犯的待遇又应该称为什么呢？只能被认为是：超级虐待！

在这里时，伙食已经改为一干一稀，晚上喝粥。想当初，我曾经要求喝粥，可现在每天的晚餐就是这样的稀粥。不到睡觉时已经腹内空空，饥肠辘辘、叽里咕噜地响个不停。就这样伴着饥饿而睡的生活，度过了将近 3 个月。只有 1958 年元旦和春节两

天吃了两顿干饭，其中一顿是大米饭。我们就是这样度过新年和春节的。

由于吃不饱，严重的饥饿感，迫使我们都希望早日投入劳改。目的仅仅是为了吃饱饭而已。

三十六计，走为上！

1958年2月中旬，也就是春节过后的第三天吧，一大批未决犯集中送往长春市郊区的铁北改劳支队（对外称为新生机器厂），投入劳动改造。本来按照规定：未决犯是不能投入劳动的。理由很明显：既然这个人有没有罪，还没有确定，怎么能够让他参加只有犯人才可以从事的劳动呢？

但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这样：在老毛的反右派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什么事情都可以而且应该打破常规，不能按照老规矩办事。在这个刚成立的“新生机器厂”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就是这个事实，使我们这些还没有正式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送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

在新建成的场房里，还没有干透的油漆散发出强烈的刺鼻气味。犯人所住的监舍还没有完工，因此我们就临时住在大礼堂里。一律的上下铺，人挨着人，齐刷刷地睡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木版床上。时间是2月份，也就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季节。通常人们在家里都有采暖设备，但是我们这些人却只能依靠自己和同伴们的体温来相互取暖。什么叫残忍？这就是！尤其是天刚亮，四门大开，八方来风，一夜里所积蓄的一点点热量迅速散发掉了，剩下的只有寒冷，极度的寒冷，彻骨的寒冷！这样我们不得不迅速起床，匆忙穿好衣服。而早饭已经被送到原来还睡着人的地方。立即分饭、吃饭，不快不行，因为本来就不算太热乎的饭菜，在迅速冷却。如果动作迟缓，那就只好越来越凉了。大约不到10分钟，全部结束。一声集合的命令，我们又迅速地向外走，排队，报数，齐步走。还不到7点，我们已经被分配到劳动岗位上开始

一天繁重的苦役生涯。

恶劣的伙食、超强的劳动、过分紧张的节奏……这样的生涯，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我能够活着出去吗？不能，绝对不可能。因此，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冒险一跃。于是在还没有正式判决的时候，已经萌生了逃跑的念头。为此，在上交现金的时候（为了防备犯人逃跑，必须上交所有的现金，给你一纸收条。），留下了不多不少的36元钱。所谓“36计，走为上”是也。这36元钱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完全可以乘火车去北京。当然，这些钱应该仔细地藏好，千万不能被发现。为此，我把这36元钱藏在内裤的一个小口袋里，原来是准备外出旅行时防备小偷光顾的，想不到现在却用在这方面了。

为了选择逃跑的时机和路线，不得不仔细地观察，观察环境，每个时间段的活动规律……。我高兴地发现：只有在开饭的时候，人们的警惕性才大大地降低。这个时刻，人们最关心的只有吃饭这件事情了。其他一切事情，即使是天塌下来也没有人会注意的。在这个时间逃跑，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路线问题。外面是大门，有武装警卫持枪把守。进入大门，还有二门。这个二门只有一个普通的便衣人员看守。如果出了这个二门，似乎就好办了。问题是如何走出二门？必须寻找机会。

当我正在筹谋出逃的时候，6月10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来这里宣判。最先被宣判的那个人是因历史问题而判处无期徒刑的，第二个是10年有期徒刑，第三个就轮到我了。按照我心中的盘算：这是一个刑期递减的规律，第三个应该是低于10年的刑期了。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我被判处无期徒刑。脑袋嗡的一下，像要炸开一样，顿时眼前漆黑一片。稍后，我定定神，才踟躇而行，慢慢地走回到车间里，半天一言不发，心里却似翻江倒海一般。

为什么判得这样重？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对于任何罪行都有

明确的量刑标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人治社会里，对于同一个罪行却有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按照我的“罪行”定性为“反革命叛国罪”，但是量刑多少则看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反右派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鲍庭干也被打成右派，司法界大为震动。由此，宁左毋右的思想大行其道。所以，到了反右派斗争高潮的1958年6月，我被判处无期徒刑就不值得奇怪了。

思前想后，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难道说，我将要在监狱里度过终生？这个结局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为此，我不得不加快逃跑计划的实行。进监狱的时候，便衣全部收缴上去了（当然是为了防止逃跑），因此无法伪装。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计划都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猛然发现，还保存着一件穿得很旧的风衣。这件风衣本来是用来包裹行李的，现在却寄托着我的全部希望，全靠这个东西做文章了。为了能够穿这件风衣，必须要选择一个刮风下雨的日子。而为了麻痹看守人员，我还必须装扮成女性。为了这个计划的稳妥实现，我乘机剪下了一缕小马驹的马尾（经常有老乡送菜的马车来，有时拉车的马还带一只小马驹，这就为我提供了机会。）用来贴到前额上，再戴上风衣的帽子。当时我的体态比较丰满，化装成女士还是蛮像的。另外还应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而最好的时机莫过于开饭时间。这个计划反反复复想了几十次，为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就在判决书下达的第七天，正是细雨霏霏的大好日子。中午11点半左右，大家已是饥肠辘辘，全部心思都用在等待开饭那个时刻，可以让自己的肚子暂时有些饱的感觉。我战战兢兢地实行早已决定的计划。更有意思的是，当我迈向二门的时候，恰好有一个干部推着一辆小推车，车上装满了木拌子（木材加工以后剩余的边角料，用来烧火，或引火的。），正在吃力地往外推。我大

喜过望。心中暗暗地默念着：这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紧走几步赶上他，不失时机地伸手帮他推小车。这样，在他看来我不过是一个热心助人的路人。而便衣看守则认为：我和他是一家的，也许就是夫妻吧！

就在通过二门的时候，我的心狂跳不止，是激动，还是喜悦？说不清。反正顺利地通过了，而且在逐渐接近大门，如果不出意外，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门前的马路上，享受那自由的滋味了。

唉！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一个意外事件使得我的全功尽弃，以失败而告终。

原来，有位老看守从外面匆匆而入，他是赶来接班的。一眼就认出了我，惊异地看着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好哇！你小子，干得好漂亮呀！竟然出了二门，差一点就要迈出大门啦！”马上招呼别人一起，七手八脚把我捆了个结结实实，押送回监舍，戴上脚镣和手铐，并立即关进了小号（禁闭室）。由于这件事情，这位看守立了一功。这是后话。

在小号里度过了几天，就被移送到长春监狱。为什么要移送到这个地方来呢？因为我已经判处了无期徒刑，又逃跑，这就叫重刑犯。而劳改队里只适合关押 10 年以下的短期犯人，长期犯人、重刑犯则应该转移到有重兵把守、防备严密的监狱里。这个监狱是日本人修建的，坚固异常，设计巧妙。

在学校里，我经常接触外系的同学，例如中文系、法律系、历史系……。就在 1956 年暑假，我曾经和法律系同学一道，参观过这个地方。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监舍里窗明几净，犯人的伙食也十分讲究营养，还有零花钱，劳动也是 8 小时，下班以后可以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还可以下棋、唱歌……。总之，给人印象是，这里最讲究人道主义。（后来我亲身体会了监狱里的一切，才明白了真相：原来这一切表面现象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卫生状况是临时清扫过才达到的，伙食则是因为有参观者才临时加餐的……）可是，当时唯一没有去的地方就是禁闭室即小号。而在次恰恰就被关押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号里，也可以说是弥补上次的空白吧，更可以对监狱有个全面的了解，不至于被假象所欺骗和蒙蔽。在小号里和上次所看到的完全两样，却和最初进看守所的生活差不多，也是轮流“放矛”，也是喝粥。区别在于，管理特别严厉：白天不允许打盹，只许端端正正地坐着，据说是应该反省自己的罪行。

在小号里，我认识了不久就要执行枪决的死刑犯，还有国民党少将军官等等。那个死刑犯同样很乐观，他经常说：我什么好东西没吃过？什么女人没玩过？活到今天也算知足了。大约 10 多天以后，召开公判大会，把他提出去。临走时还没有忘记回头一笑：“来世再见！”通过广播喇叭，我们听到关于他的罪行：有三条血债的历史反革命，而且不认罪服法，经常翻案，污蔑管教干部……。不久听到远处几声枪响，他和另外几个人同时去阴曹地府报到去了。再说那位姓张的国民党少将谈兴很健，他还喜欢讲些过去上海滩上的故事，什么拆白党呀、骷髅党之类。我们二人听得十分投入，往往忘了自己的身份，有时不小心议论几句，而且声音高了一点，就会招来一顿批评（在交谈时必须压低声音，近乎耳语。否则，看守就要警告你“老老实实反省自己的问题，不许乱说乱动”）。

在小号里有的是时间，怎么打发时间就成为最大的课题。而最好的话题就是精神会餐。过去吃过些什么东西，自己家乡有什么特产、风味小吃，怎么做的，……如此说说笑笑，很快又是一天过去。再有就是梦中的奇遇和虚幻的幸福，虽然醒来却是一片黑暗，但我很喜欢做这样的梦。南唐后主李煜不是在他的名作《浪淘沙》里写过这样的句子“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吗？我也曾经有打油诗云：“如果夜夜做好梦，只是半日在牢笼”。人

需要自我安抚，自我寻找快乐，不能总和自己过不去，否则精神岂不早就崩溃了，还能活着走出监狱的大门吗？更等不到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那一天。许多优秀的难友们，就是过于执着，过于较真，心理压力太大，缺乏卧薪尝胆的胸怀以及韬光养晦、能屈能伸的精神和“韧”性，因而早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11月某日，原劳改队来人，先把我的脚镣卸掉，然后把我接回铁北支队。回顾在这里生活了将近5个月，从盛夏到初冬，真是尝够了监狱严管的滋味。几天以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来人宣判：鉴于原判刑期过重，撤销原判；改判有期徒刑10年。对于逃跑一事，就予以追究了。他们的逻辑可能是这样：因为判刑过重，所以造成逃跑，这倒也合理。这说明：他们的政治高烧也已开始退热了，能够比较接近实际地思考问题和处理案件了。当然，即使如此，也仍然没有超越毛泽东专政时代的思想藩篱。

再次出逃未遂

从监狱转移回来以后，对我的看管似乎有所放松，暂时没有分配劳动。休息了几天以后，从铁北大队调出一大批犯人往杉松岗煤矿，支援大炼钢铁事业。在调出的名单中就有我在内。为了方便转移，必须把原来保存的私人衣服和物品发还自己携带。当我打开自己的箱子，看到好几套便衣，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穿的新衣。这个时候心里又活动了：有了便衣岂不是天赐良机？今天不跑，更待何时？于是又打算起来。这时已是初冬天气，需要穿得暖和些。因此贴身穿了毛衣和绒线衣，再加一套新制服，外面则是新发的囚服。

又到了开饭时间，我再次冒险了。当我走进干部所用的厕所里，关上门（只有干部使用的厕所有门）迅速脱去外面的囚服，再出来，急匆匆迈向二门。这次我多了一样东西：这是我利用劳动机会，随便找一块小矽钢片，剪裁、上油漆，并躲在被窝里写好“东北人民大学”几个红字的校徽。近看当然是破绽百出，但远观则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全靠这枚“校徽”顺利地混出了二门和大门，直奔车站。买好了去北京的票，就等火车一响，我就可以说声“拜拜”了。

但是，我太盲目乐观了，也太缺乏经验了。怎么能在车站里等呢？岂不是坐以待擒吗？（这个教训我以后会用得着的，后面再说）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抓回。后来才知道：我脱在厕所里的囚服很快就被做清洁工的犯人发现，并及时报告了管教。一看囚服的内侧写有犯人的名字，很快就确定是我的囚服。大队立即封锁所有的路口，但是为时已晚，我早已通过，并奔向车站了。他

们又立即派人赶赴车站，把我逮个正着。

把我押回以后，立即上绑绳，并送小号。但是当时小号还差一点尚未竣工，于是只好暂时留在某一间监舍里。由于已经严严实实地捆绑着，也就不必害怕我再有什么行动了。在这里睡觉的是上夜班的犯人，白天正在休息。由于生物钟的支配，白天本来就不是睡觉的最佳时间，再加上来了我这么一个逃跑被抓回的“要犯”，自然引起这些人的兴趣和好奇。都趴在床上问长问短。哪个车间的？叫什么名字？什么犯？为什么逃跑？跑到哪里被抓获的？……从交谈中相互便熟悉起来了。到了开晚饭的时间，他们还主动报告班长说：这个同犯（按：监规规定：犯人之间互称“同犯”，不同于“同案犯”）还没有吃饭哩！班长（其实就是个看守而已）虽然口头上说：谁叫他逃跑的？可是不大一会儿，还是由伙房送来了一个窝窝头和一勺汤菜。菜饭到齐，问题也来了：人被捆绑着，如何用餐？他们又请示班长。班长说，这个我没办法。前科（“前科”有两个意思，其一是指从前的犯罪记录；其二是前院，即管教科。在囚犯们的心目中，管教科就好像是犯人的上帝一样。）捆的，谁还敢怎么的？他们又央求道：那就请示前科吧，总不能不吃饭吧？班长却批评道：你们少管闲事，睡你的觉吧！转身出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过来一位“同犯”，边走边说：我来做做好事吧！怪可怜的。他拿过汤菜，一勺一勺地喂，再拿过窝窝头送到我的嘴边，让我咬着吃。这样一顿饭让我吃得十分感激，几乎要掉下眼泪。完了我问他：你贵姓？那个车间的？……他说：我姓蓝，叫蓝洪彦，机修车间的。就在我们攀谈中，不知不觉哨声响了，到了晚上查房的时间。按照规定，在这个时间，班长挨个监舍清点人数。而犯人则应该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铺位上或坐或卧，不许乱串。他才说：以后咱们再唠吧，我要上床去了。

从此，我记住了蓝洪彦这个名字。

直到晚上，才把我送进刚刚完工的小号里。身上的绳子当然要解下来，但代替它的却是脚镣。这样，我一边吃力地把刚才送来的被子打开，一边寻找破布，抓紧时间做一对“镣模”。（对内包裹并保护着胫骨和脚踝，外面最好用耐磨的皮革之类的材料，以免很快就磨破。）因为有上次戴脚镣的经验，所以做这个东西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做好“镣模”，仔细地戴上，颇有一番满意的样子。自我保护是任何动物的本能，何况人乎？

在关押几天以后，就是提审。这可是个关键的时刻。前科来的干部一开头就介绍说：根据我们的统计，凡是逃跑的犯人，大都是小偷、盗窃之类，因为他们出去就有办法生活——伸手就来钱。而其他类型的犯人没有敢于逃跑的，因为出去没法搞到钱，也就没有生活来源。然后单刀直入地问我：“你跑出去有钱吗？怎样生活？打算到哪里去？”

我说：“到江西老家地方再投案，因为在南方犯人都是吃大米，不会便秘。”

“你胡说，好不容易跑出去了，又自己去投案？”

“那你认为我会到哪里去呢？”

如此反复交锋好几个回合，没有任何进展。他不满意我的回答，但又不允许“引供”或“诱供”。从前，我多次相信了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谎言，多次自己跳进陷阱，想拔都拔不出来。现在变得聪明起来了。从我“犯罪”的具体情节来看，我打算到哪里去，已是明明白白的，可就是不说；要说就让你来说吧！可你们又不敢说，双方僵持着，不欢而终。

如果当时我不能说，那么现在完全可以公开地说：我打算逃出去以后立即奔赴北京，还是去英国驻华代办处，决心向他们要求：无论如何都要请他们帮助我出国谋生；如果不答应，政府和劳改队一定会把我折腾死的。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你不爱国吗？当然，任何人都应该热爱

自己的祖国。但是，其前提应该是：这个祖国首先必须热爱自己的人民，相信自己的人民，并且给自己的人民以必要的最起码的人权。如果这个“祖国”连他的人民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如果这个“祖国”不能保证自己的老百姓有说话的权利，那么，还有必要去热爱她吗？还有必要为之而奋斗牺牲吗？还有必要去为她而献身、而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吗？不必要也不可能！

“祖国”是一个历史概念，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同盟国国内的人民宁可看到自己的祖国失败，也不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列宁还号召德、奥、意等国的士兵放下武器，或掉转枪口。又例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难道也应该热爱这个所谓的“祖国”吗？还有就是 16 年前，苏联瓦解的时候，老百姓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冷漠。……这一桩桩、一件件铁的事实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一个真理：爱只有用爱来交换，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只能用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尊重、关怀来交换。

著名的政治家、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富兰克林说得好：“那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当一个人没有用手投票、选择或罢免国家领导人权利的时候，就只好用脚来选择了。正因为如此，早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就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在这个庄严文件第 13 条第 2 款写道：“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又在第 14 条规定：“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看来，选择离开一个国家，即使是自己的母国，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如果不是用爱和尊重，而是用机枪和刺刀，那就不可能获得所想要的一切，恰恰相反，所获得的不是发自内心的爱和忠诚，而只能是表面上的服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这种仇恨还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直到永远。例如 前几年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外交官陈用林

先生要求外国给予政治庇护时，某大使训斥他说：中国待你不薄，为什么还要叛逃？陈先生回答说：我的父亲就是在“文革”中被害的。这个案例说明：陈先生是个好儿子，孝子，为父报仇，可敬可佩！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为了发动群众，大力宣传什么“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把所谓的地主阶级压迫的事迹一件件记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现在查明，有许多案例是适应政治需要而凭空捏造出来的），而在他们执政的几十年中，迫害几百万无辜的知识分子，还饿死了几千万善良的老百姓……种种罪行，罄竹难书，却要求中国人民“向前看”，什么“宜粗不宜细”，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这可能吗？这公平吗？这些政治谎言能够起多大的作用？真的能够麻痹中国老百姓吗？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相信这些说教。

在多次的审讯中，我都是坚持那套说法。其实，他们心里也同样清楚，我出逃的真实目的何在，但是又不允许他们代替我来说。而我又下定决心，就是不说真话，看你拿我如何？后来我还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谈真话，首先要看对方是不是有诚意听真话，如果对方根本就没有听真话的诚意和胸怀雅量，那就没有必要对其说真话，这样的政府同样没有资格听真话，我们也只好用假话来敷衍它了。

如果我把这一切真实目的全部交代出来，那会有什么后果，不言自明。就这样僵持下去，最后他们黔驴技穷，只能大声训斥我一顿而已（声音越大说明真理越少，需要用声音的分贝量来弥补）。几个月后，按照逃跑罪给我加刑三年。还需要再加叙一笔：当初在干部使用的厕所里发现我那件棉袄并立即报告的犯人同时被减刑一年。

在小号关押的几个月里，正是寒冬时节，外面滴水成冰，而我还要戴着几十斤重的脚镣。晚上睡醒时，常常感到脚下冰凉、腿部不断抽筋。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专政。列宁

十分坦率地指出：“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按照列宁的理论，这个字眼只应该用来对待敌人，但是在毛泽东的手里，却无限地扩大了运用范围，用来对待自己的人民，甚至年轻的学生……

1959年的春天，终于被放出来参加劳动了。由于长期戴脚镣，一旦卸下来，突然感到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这个道理同样可以运用于锻炼上，例如乒乓球运动员在练习的时候就要在腿部绑上沉重的沙袋。一旦正式比赛时，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是不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的？不知道。

参加劳动最早在喷漆车间。这里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满车间弥漫着各种漆的呛人气味，令人喘不过气来。虽然有口罩，下班以后鼻子周围全是五颜六色的油漆；咳出的痰里也是如此。那几个月里，我呼吸进肺部有多少油漆，已很难估计了。

想再度逃跑吧？已不可能了。他们的防范意识特别强，各种防备设施也逐步到位。例如：二门已经换上武装人员，干部们出入都需要出示证件。四周的大墙也都留有2米宽的隔离带（经常翻松的土，如果有人逃跑，就可以从脚迹判断出逃的方向，几个人……等信息，了如指掌）。还有，经常翻检全体犯人的行李，特别是每逢年节的前几天，更要进行例行的检查。检查什么？第一是刀、剪之类可以用来行凶的东西，其次是便衣和现金等不允许犯人自己保存的物件。在检查的时候，通常是管教带领几名积极分子，由这些积极分子动手翻检。我们劳动了一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监舍，希望休息休息。但是，却发现自己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白色的被子被踩了许多脚印，帽子和袜子搞到一起了……如此等等。真是难堪极了。但还得忍气吞声、默默地收拾、归拢。一边收拾，一边想：如此下去，我还能逃跑吗？很难！那就得在这里苦熬下去了。

就在极度苦闷中，一位难友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最近，大队

有可能成立“犯人文艺组”。这倒是个希望，我必须抓紧时间表现一下自己的文字水平，好调到那里去。怎么表现？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个剧本送上去。提起写剧本，从何着手？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呀。不管如何，时间紧迫，不容犹疑、观望。说干就干，马上动手。利用下班休息的短暂时间，竟然在三天内写出了个剧本。题目早已忘记了，内容还记得，就是有个犯人名字就叫“陶成孟”（谐音“逃成梦”），多次逃跑未成，现在回心转意，决心老老实实在地改造自己……云云。这是我所写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剧本。

这样做的目的：一来展示自己的写作才能，二来也是向他们做的一个表态。交上去以后，竟没有回音，我的心凉到底了。难道我就要在这个车间永远干下去吗？我还能够熬得下去吗？我茫然。

黑 律 师

在焦急的等待中，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调我到“设计室”劳动。设计室原来有四个人，二人具有专业技术，本来就是大学的工科出身，现在又是从事设计的；另二人为补助人员，即晒图纸的，其一即将出狱，看来我就是替补这位的。

这个工种比较卫生，也算是轻劳动。每天利用阳光把他二人描绘的图纸晒出多份；阴天则利用氨水来熏，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当然，氨水有些难闻的异味，但是哪里有尽善尽美的岗位？这个岗位应该说是不错的了，我感到很知足。另外，我和原来的那位（好像是姓李吧？）本来就很熟悉，也还谈得来。在劳动的时候，有说有笑，谈天说地。这样的日子还算可以吧。如果不是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也许我还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制图、绘图的知识，将来接他们的班，成为设计师也未可知？

在上篇回忆里谈到：在我因逃跑而被捆绑、无法吃饭时，有位蓝宏彦同犯来喂我饭菜，令我十分感动。现在他来找我帮忙写个东西，写什么？上诉书。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也是个两难的选择。我深知：监狱当局最忌讳的事情就是上诉。上诉就意味着犯人不认罪，不承认自己有罪。那么，抓他岂不就成了冤案了？上诉就是对公、检、法系统的公开挑战和叫板。这个行为当然是监狱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为了杜绝这类事件，监狱当局总是千方百计地说服、恫吓、威胁……所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要求每个犯人老老实实、安心改造，这样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里，犯人应该有

自我辩护的权利，不服判决时，还应该有权上诉的权利，也有聘请律师的权利；任何人也都有为他人辩护的权利……等等，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毛泽东极权专制的年代里，这一切都谈不上。什么权利？没有！老百姓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国家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不言而喻，那不就是专制的国家吗？不就是暴虐的政府吗？

在铁北劳改队里，在 2000 多犯人中，大学生也不少。但是像我这样，原来判处无期徒刑又加上逃跑，经过上诉而被改判为 10 年徒刑的实为罕见。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几乎都知道我这个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我有什么回天之术，有扭转乾坤的本领，因此找我请求帮忙写上诉材料的人很多。但是考虑到上面所说的情况，深谙此理，为避免惹火烧身，对于这类要求一律回绝：请原谅，对不起！

但是今天来找我的不是别人，而是对我有过一饭之恩的人——蓝宏彦。我能够拒绝吗？不能！不能！韩信当年受人一顿饭之恩，后来还重重的酬谢了，所谓“一饭之德必报”就是出自这个历史典故。今天我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

没有理由拒绝，虽然明知要冒风险，还是痛快地答应下来。但是，我同时要求他：不要用我的原稿，务必重新抄写一篇。这样，当局就不可能看出我的笔迹，他倒是答应了。谁料想：这件事情还是被发现了，并且举一反三，认为我在监狱里竟然当起了黑律师。这还了得？

在设计室大约干了 2 个多月吧，被宣布去“集训班”学习。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更不清楚“集训班”是什么性质，学习什么？等到进了“集训班”，才明白过来：原来就是严管班，是从严管束的对象。严厉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没有闲暇时间，起床就得学习、反省问题。中午也没有休息时间，还不允许打盹儿，一直到晚上 10 点才许睡觉。

那么，为什么进这个班呢？我还是不知道。学习一段时间以后，要我们交代问题，什么逃跑思想呀，余罪呀（就是法院尚未掌握的罪行）……等等。轮到我的时候，我感到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管教姓关，说话特别严厉。他直截了当地说：“你这个胡显中，还真看不出来呀，真有两下子。你还当上了黑律师了。”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当然明白了。但是，始终不明白的是，他们又是怎样知道的？我反复地回想，什么原因？我们之间传递文稿时使用了一本字典，也许这本字典可能引起他人的注意，或者蓝宏彦根本就没有另外再抄写，而是用我原来的手写稿直接交上去了？事已至此，只好实话实说了。但是他们并不罢休，还要追问更多的人和事，而我的确没有为其他人写过上诉材料。双方对不上茬，于是，被关押小号反省。

这已是第三次被关押小号了，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戴脚镣，自由度当然要大些。

所谓“小号”就是一间大约三平方米的房间，住着 2-3 个犯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门上有一个 20 公分见方的小窗，那是用来送饭和送水的，当然也是我们唯一的透气通道。除了开饭、“放矛”时间以外，平时根本没有人来管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消磨时间，我可以通过窗口和相邻小号的人聊天，聊什么呢？最多的是“精神会餐”。有的时候，他还教我几出京剧。今天我会唱的几段京剧（如“空城计”“铡美案”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另外，我还有大量的时间来构思小诗。这些作品当然绝对不允许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所以，我只能保留零星的记忆。我记得有这么几句：

青春，在铁窗中消磨
热血，在高墙内冷却
真理，在刺刀下屈服

荒谬，用谎言作酒杯
盛满了真理的眼泪
高声庆贺……

在小号里接触过几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个是 60 多岁的老头，耳聋眼花，大字不认识几个。他什么错误也没犯，就是在学习的时候说错了话。当时枪毙了一名犯人，名字叫刘什么奇（忘记了中间那个字），当天晚上学习时，大家都要表态，拥护政府正确处决刘某某……而这个老头却说：枪毙刘少奇我们都非常拥护。这一下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怎么能“污蔑”呢？管教们自己也十分清楚，根本就是无意的。但是，如果不予惩处的话，人家会责怪说：目无国家领导人的尊严，等等。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呀？于是，把他关押小号，以示警戒吧！后来据说像他这样说错话而关押小号的人还有好几个。还有一个是因为天气太冷，经常去锅炉房烤火，管教批评还不听，顶嘴……这当然就是不服管教，也就是反改造的表现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难以一一尽表。

经过几个月的审查，没有发现我和其他犯人发生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放出小号。那已经是 6 月份的天气了。在小号里根本就谈不上讲卫生，浑身上下肮脏透了。于是我便在水池里洗个彻底。由于水温太低，又得了感冒、肺炎……

大病一场以后，把我分配到大队文艺组。这个结果本来就是我当时所希望和努力争取的。看来，当初写的那个剧本还是起了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工夫。

在文艺组干什么？文艺组的第一项工作是筹备展览。那个时候强调正面教育，所以经常有展览。最初是国际形势展览，后来又有以打击重新犯罪为内容的展览。办展览首先需要有笔杆子，先做出计划，然后由美工犯人制作图画，再由笔杆子写出解说词。

当时有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张慕渠、周巨民，还有一个姓许的鲜族人），还有一个电工（李某某）、一个木工，有一个是专门负责写作的（迟象军），但是快要到期出监，也许我就是来接替他的。此外，我还担任解说任务。

说起解说任务，最初并没有我，而是从各个车间里临时调来的另外四个人。后来其中一个犯了错误，被关小号。大家就向主管翁干事推荐我。这个翁干事大摇其头，连说不行，他是个南方人。可是大家还是继续建议，并且说：他的口音很标准的，请你试一试看吧！就这样我被临时找来“试一试”，而且被认可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别人看来，当着许多参观者担任解说，是一件十分风光和体面的事情。岂不知其中的甘苦：说过几遍以后，就感到嗓子发干。但是后面还接着来人，你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解说词，就好像念经一样，非常枯燥乏味。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对付办法，就是尽量拉长声调来延长时间，同时偷工减料，把一些可有可无的内容删去，别人也无法发现。

以上任务并不重要，重要而且有意义的是——

第二项任务是保管图书。图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出借给各个车间的，这些书大都适合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人阅读。还有就是大量有价值的好书，不外借，只允许干部来看看。而这些书正是我所最喜欢的精神食粮。因此，几年下来，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文艺和文学发展史方面的书籍，还读了许多古典诗词、散文……。这样说吧：相当于读了几年大学的中文系。当然，没有老师，全靠自学而已。但和年轻的大学生比较起来，我的年龄大，领悟能力比较强，因而收获应该比他们多得多⁵。忘记了是谁说的：最好

⁵ 举个例子说明问题，辛弃疾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如果没有切身体验，很难领会词中的悲凉心境和无奈。

的课堂一是在学校，二是在监狱里。

想当年我考大学所报的专业一是文学，二是历史，三是新闻。结果阴差阳错，却进了经济系。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从税务局工作岗位上报考的，和我原来的工作性质相接近吧？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正好弥补我当年的遗憾。在我所阅读的书中，收获最大、印象最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选读本。在这本书里，我几乎是含着泪水读完充满作者肺腑之言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在这两篇文章里，司马迁借鉴古人的事迹，大发感慨地说：“昔西伯拘繇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臧足，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段话里，司马迁总结了历史上许多有大成就者的成功经验，得出结论：凡是成大事业者，必有灾难、痛苦、厄运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对于其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接着又说：虽然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刑罚和耻辱，本来想一死了之。但是再一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此，他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去死，而应该有所作为以后再死，才有意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漏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后来我有机会阅读历史书籍，发现在这段话里，司马迁有两点不准确的地方：其一是：左邱明是先著书，后失明；其二是：吕不韦是先著书，后迁蜀。这里的时间先后说明他所阐明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

虽然如此，但并没有削弱这段话的伟大意义和深刻的启蒙作用。他之所以没有马上去死，就是因为他有所追求、有所期待，有所作为。正是这个伟大的抱负和理想，激励着、鞭策着他去完成光辉而不朽的事业。今天，迫害司马迁的汉武帝刘彻早已成为一堆粪土了，而司马迁的人格光辉和他的史学巨著却永远地照耀

着、启发着无数后辈。鲁迅先生给予《史记》的评价是“史家的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这部史学巨著面前，暴君刘彻算个什么东西！

读了司马迁，再联想的我自己。忘记是哪位思想家也说过：“厄运对于一个弱者来说是陷阱，而对于一个强者来说则是机遇。”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能不能成为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样的人物？就看自己的努力了。从此更加发奋读书，贪婪地吸取各种知识，充实、再充实自己的头脑，以备将来，等待时机。当然，我未必能够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但是作为一个标杆，应该成为我追赶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前进的动力。即使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成果，但我毕竟努力了，也可以死而无憾了。

当然，这要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太劳累，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如果像我后来到农村的劳动，那可就没有时间看书了。可惜的是，这样的岗位也为时不长。1962年以后，实行粮食定量制度，按照劳动强度来确定粮食定量。文艺组都是轻劳动，所以粮食定量不高，也就不够吃。怎么办？只好解散，分别安排到各个车间里，吃的粮食定量高些。如果有临时任务时再集合在一起。这样，我的“美差”就不得不结束了。

在这里还可以补叙一笔：在文艺组举办展览的时候，每次都要由管教科负责干部来亲自检查，并且要先听听我们的解说。然后“指示”那些应该改正。在来检查的干部中，有个高个子的干部专门对我说：你还认得我麽？我说不认识。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我叫刘XX（忘记了这位的大名），并且照例开导和鼓励了我一番。就是这位刘干事，在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并对我提供了某些方便，这是后话。

我为管教当枪手

离开了文艺组就来到塑料厂的成型车间。这个车间是制造酚醛塑料的，主要产品是胶合板、仪表外壳，也生产部分民间日用品，例如纽扣、瓶盖之类。所谓“成型”就是从上一个车间（制药车间）领取原料，利用液压、加热等工艺进行加工，产出成品。

在 13 年多的劳改生涯里，经历过几十个管教。他们的名字早已淡忘了，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有一个管教的名字和形象却深深地保存在记忆里。

他叫陈树范，当年也就是 20 来岁，初中毕业以后进了公安学校。毕业分配到长春铁北劳改大队（对外的名称叫新生塑料厂）当管教。时间大约是 60 年代初期吧！（我记得在一首应景的诗里有“春秋五载成虚度”之句，那应该是 1962 年）我在成型车间乙班劳动。我所在的乙班几乎都是现行反革命。甲班为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土匪、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等；丙班则为刑事犯，有贪污、强奸流氓、盗窃、缙窃等。我们的劳动分三班倒，每个星期一倒班。当然，白班（上午 8 点到下午 4 点）最好，一切生活都很正常，睡眠有保证。最害怕的就是早班（半夜 12 点到早晨 8 点）。这个时间基本上是普通人的睡眠时间，却要强打起精神，集中注意力来劳动。而白天（中午 12 点到晚上 10 点半）本来是人们的活动时间，我们却要强迫自己睡眠。开始都很不习惯，睡不好，劳动时却不允许走神。可以说是“阴阳颠倒”，有违人性。但是，在刺刀的看管下，不得不劳动。什么叫强迫劳动？这就是一例。

平反以后，看了许多关于老毛的材料。这个老毛也是个“阴

阳颠倒”的人。普通人正在睡觉时，他来精神了。而人家起床工作时，他又去休息了。还有记载：有一次，刘少奇刚吃了安眠药打算休息，忽然老毛办公室来电话，要开会。刘只好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赴会。可见在老毛手下工作，即使像刘少奇那样的大人物也有些被强迫的味道，其中的甘苦，只有刘本人清楚了。

那年夏天，全场开展大竞赛。比产量、比质量、比原材料节约，劳动极其紧张。我的劳动是给一个技术工（好像是广东人）当助手，为他准备原料（通常被称为“药”，是一种黑色的粉末），每次称完了“药”，我都要去水池洗手，这当然要耽误一些时间。不久就被反映到这位陈管教那里。在总结成绩时，我的上级（就是那位技术工）产量上不去，比赛中成绩下降了。人们找原因自然找我的头上，认为是我耽误了他的操作。在全班犯人的大会上，陈管教点了我的名，并且批评我说：“你这个胡显中，还是个大大学生，你都读些什么书啊？”俗话说：“父打子不羞，官打民不羞”。就是说：官员打老百姓，就好像父亲打儿子一样，很正常，不必害羞。但是在我当时却受不了，认为是给我过不去。当场顶撞他说：“这和读什么书没有关系，再说我读的书多了，说了你也不懂。”后面一句虽然是小声嘟囔，但人家还是听清了。这句话太刺激了，使这位陈管教下不来台。他立即拉下脸来，“那你就说说看，你到底读的什么书。”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声讨我，要求我站出来。矛盾激化了，我的情绪也非常激动起来。“站出来就站出来，怎么的？”这是明显的叫板，岂有不吃亏的？

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终于升级，变成了批斗会。这是我进监狱以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气焰十分了得。对方的话也非常刺激，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次批斗会上，那位陈管教说：“你是大大学生，我只不过是个中专生。但是，俗话说：“狗尿苔不继，长在金銮殿上”，现在就管得着你这个大大学生了。怎么样？你有能耐别到这里来耶，谁叫你犯罪？……”他说这些话的神态和语调，

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可以说是终身难忘。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只得从心里默默地念叨：列宁曾经引用俄罗斯民间谚语说：鹰有的时候飞得比鸡还要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在当时，多少有点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吧！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当时还是年少气盛，太高傲自负，乃至出言不慎。斗到后来我也不得不认输，检讨错误。斗了个把小时吧，管教宣布“停止劳动，反省”。

通过这次交手，这位陈管教也对我有了一定的印象。以后每次走进车间，总要问问“劳动怎么样了？能不能完成任务？”有的时候，他还特地站在我的“压力”（即机器名称，是用液压传动使产品成型的机器）旁，指指点点。看起来，他还是想加强接触和沟通，以消除我心中的敌意。

不久，开展反修大学习。下班以后还要读报。本来读报是积极分子或者班组长的“光荣”任务，可是，要读得抑扬顿挫，弛张有度，并且读出感情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并不取决于改造的好与不好、积极与否。有一次，一位组长读得非常吃力，磕磕巴巴的。陈管教断然制止，并且说：“胡显中，你来念！”

本来，无论是开会或者别人读报时，我总喜欢神游万里、天马行空，忽然听到这一声喊，一时还没有反映过来，有些发愣。这个时候，有人提醒说“叫你啦”，我才如梦初醒，回过神来时，别人已经把报纸递过来了。这才开腔念下去，当然念得还算可以吧。事后有的人讨好时也说：“到底是大学生，没白当大学生”之类。我心中当然明白，如果再批斗我，这些人仍然会一马当先、勇往直前的。有些人的性格就是如此。

从此以后，每次读报就成了我的“专利”了，虽然我不是什么积极分子或小组长。不仅如此，有的时候，大休日开全车间的犯人大会，如果会前要等待什么人或什么事时，为了避免枯等的尴尬，主持人往往让先读报，别的班的管教也叫我来读。

陈管教消除敌意的下一个步骤是调整我的劳动岗位，由体力劳动（叫“压力工”）改为半体力劳动（检查员，即检查产品质量的）。本来担任检查的应该是对大部分产品性质和质量标准有所了解的内行。他们原来也都是在“压力工”的岗位上，干得比较好的人才能够胜任这个岗位。而我则是一个在“压力”岗位上都没有干好的人，这有点破例了。他对我也是如此说的，希望我好好干，改变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争取当上积极分子，更进一步争取减刑……总之，劝勉有加，寄予厚望。他那里料到，这一照顾措施却使我害怕、不情愿。为什么？做轻劳动还不好？难道还要去做那重劳动？原因何在？盖在于“吃饭问题”。

那个时候，正值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实行按照劳动量大小确定每人每月粮食消耗量的制度。这个车间里绝大多数都是使用压力机器的，劳动量很大，因此，粮食定量是每月42斤，每天1斤4两。让自己预定。通常是这样：早饭5两，午饭6两，晚饭3两，简称为：563。除了一点汤菜，没有其他的副食品，仅仅依靠这些粮食，很难维持一天的劳动消耗。因此普遍感到不足，特别是到了晚上，刚才吃的几两粥已经消化了，饥肠辘辘。就连做梦都是关于吃东西的，或是快要吃饭却又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吃不到嘴里……；或是看到别人吃什么东西，自己馋得直流口水，一直盼到起床、出工，吃早饭，肚子才开始运转。

为了填充自己的肚子，各人有自己的办法：或者要求家人送点主、副食品以弥补不足；或者自己想办法，有的到车间外面寻找野菜，洗洗用开水烫一下就吃。有人误食了一种叫灰菜的东西，结果肿脸；还有乱采乱吃了有毒的蘑菇，因而中毒的……，这些事情我没做过。但有一次，车间里集体购买甜菜渣子（甜菜榨糖以后剩下的东西，本来是喂猪的）我也买了几斤来吃，结果导致拉肚子。剩余的我也不要了，可是竟然还有人要去食用。买甜菜

渣子也是要钱的，钱从何来？请看后面专章叙述：雪中送炭好大姐。

以上简单地勾勒了几幅画面，可见当时饥饿到了什么程度。

当压力工每月定量 42 斤还不够吃，而检查员的岗位是轻劳动，每月定量只有 36 斤（每天 1 斤 2 两），就更不够了。今天的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以为：仅仅差 2 两粮难道就有如此重要吗？岂不知那个年代，一个米粒都是十分珍贵的。每当中午开饭时，压力工通常都是 6 两，两个窝窝头（3 两一个），而我只能订 4 两，一个窝窝头。看起来他们手拿的 3 两窝窝头和我手里的 4 两大小差不多，但是人家是两个，我只有一个，几口就吃没了，只能说吃个半饱。“犯人”犯人，吃饭最亲了；爹亲娘亲不如饭亲。少吃 2 两粮，对于一个正是 30 来岁的壮年人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从做检查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向陈管教要求，还是回到“压力”上去干吧，这回一定好好干，卖力气干，干出个样子来，让大家对我来个“刮目相看”云云。两个月以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压力”的岗位。起初是推“瓶盖”。因为瓶盖体积小，加热时间短，所以产量的定额也高，要求动作快，消耗体力当然也就大。一个班下来，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仅仅为了那 2 两粮，值得吗？在当时，完全值！“民以食为天”嘛！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判断当时的事情，此一时，彼一时啊！

看到我真是下力气干了，可能这个陈管教有些恻隐之心。三天以后，班长把我调到另一个机器上，干一种加热时间比较长的模型。时间比较从容一些了。可就是那三天的超强劳动，可以说终生难忘。

又过了些时候，刚一上班（我清楚地记得是后半夜班），班长（也是犯人，但是负责统领全班几十个犯人，就算是领头的犯人吧）来到我的机器旁，叫我停止劳动，由别人代替。他说“管教找你”。我以为又犯了什么错误，战战兢兢地迈到了管教室的

门口，按照规矩，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这位陈管教态度似乎也温和了许多，开腔就问：“最近思想改造得怎么样了？”如此不着边际的问话使我摸不着头脑，又有点发愣。对方看出来我有些紧张，就叫我不害怕，可以随便谈谈：最近又看了什么书，读报有什么收获，特别是对“九评”（就是当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著名论战文章，共计9篇）的心得……。

原来他是搞迂回战术，绕了一大圈，终于绕到主题。他正式提出问题来：你认为苏修的主要错误在那里？当前古巴导弹危机的根源何在？这个危机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的，所以谈话进行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吧。他看我有些口干，精力也有所下降，就说：先谈到这里，回去喝点水，吃了午饭（我们夜班的午饭是早晨4-5点钟吃）再来谈。今天你可以休息，不用劳动，好好想问题，想好了再叫你来。

这是刮的什么风？我搞不懂。从来就没有谈思想、学习、时事而免除劳动的先例。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休息一天却是实实在在的。在繁重的劳动下，休息一天就是最大的实惠！

在休息的时候，许多人又都投来异样的眼光；有的还凑过来关切地问：又犯什么错误啦？看来，他们以为我又犯了什么错误，又在反省呢！

吃过午饭以后，却没有再找我，也没有人分配我的劳动。这样我白白地拣了半天的便宜。也还算值得。

又过了些日子，这位陈管教再次命令班长来找我谈话。这次谈话气氛当然缓和得多了。他单刀直入地说：有几道题，你给做一下。我一看，还是前几天所谈的内容，只是增加了最后一道题：“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公安工作？如何改进对犯人的思想改造？”他说：“这个题目你就不要做了，做好前面4道题就行了。怎么样？”我当然是点头答应。他又问：“今天能做完吗？”

我痛快地回答：“没问题。”临走，他又叮嘱：“我叫人给你安排一间房，不许别人进。以后别人问你，就说写检举材料。听懂了吗？”我频频点头。

这时，我更明白了：原来他要我做枪手，替他回答政治学习的测试卷。在大陆经常搞这样的测试活动，但卷子发下去了，谁做的？就没有人管了。可见大陆搞形式主义之一般。（请注意：我的枪手生涯还长着哩，这只是个开头而已，以后再表。）

从那以后，我的劳动基本都是比较轻、比较容易做、容易完成任务的模型。不要以为凡是小的模型都容易做。越是小模型，成型的时间短，产量就越高，要求动作更快，更容易产生疲劳感。而大模型数量少，但是对体力的要求高。所以两头都不好做。好做的是模型体积小，但是产品成型时间并不短的项目。哪个模型好做，哪个模型不好做，班长心中一清二楚。这样，谁能够分配到好做的模型，全取决于你和这个班长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密切的，他会安排一份既好做，又省力气的模型；关系疏远的，那就对不起了，你去做那个最吃力又难于做好的模型吧。如此说来，班长的权力很大了。当然，班长不仅仅需要业务上是内行，而且改造表现也必须是积极分子。所谓的积极分子，就是：劳动上积极肯干，思想上靠近政府。那么，何谓“靠近政府”呢？就是经常向管教干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情况（也就是经常打小报告，或者说叫告密。）。因此，判断并最后确定谁是积极分子，当然管教最有发言权。

还应该提一下我那个班的班长也就是“带班的”，叫祁有财，原来是一个土匪集团（通俗的名称叫“辘子”）的大柜，也就是一把手。二柜为二把手，炮头为三把手，也就是先锋，每有战争，他应该冲锋在前，当然死亡的概率也最高。其余就是些小喽罗了。这个祁有财既然能够统帅上百号人马，当然有待人接物方面的丰富经验。他来担任“带班的”自然是得心应手。当陈管教批斗我

的时候，他对我也很厉害，说话常带挖苦、讽刺，可是当同一个陈管教对我改变态度以后，他也随着对我和善起来。在分配“模型”（即劳动岗位）时，也有所照顾。这一点只能心领神会，难以言传。

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我还记得，唐朝的刘禹锡在他的《漏室铭》里开头就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也可以仿照一下：“官不在大，有权则灵”，也就是直接管得着。小小的管教，连个科级也不够（上面有管教科长，还有车间干事，可见管教只不过是个最起码的小干部而已，但是，几十名犯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就操纵在这个小小的管教干部的手里。你不能不服从，即使你从心眼里百分之百地瞧不起他。

这位管教不久就因病住院，后来又听说不治而亡。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也不知道应该恨，还是同情？在我所经历过的许多管教当中，对比起来，这位陈管教还算是比较有点人性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给了我比较轻松的劳动岗位，而是在批斗我以后，不断地为消除敌意所做的努力。这一点和那些把坏事做到底，不留余地的人对比，就算是有些人情味吧？

现在回忆当年这些往事，当初的我也确是年轻气盛，目中无人，并且因此而吃了不少亏。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

肃反肃反，越肃越反

1962 年来到成型车间。这个车间生产酚醛塑料制成品。今天才知道这种劳动是有毒的，当时也没有什么保健措施，只能是听天由命吧！到了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高级知识分子检查身体时才发现，我的白细胞数量太少，正常人应该是 4000—10000 个，而我仅为 3000 上下。医生告诉我：白细胞就好比国家的边防军，如果有外敌入侵，马上行动起来，进行歼灭。如果白细胞数量太少，一旦细菌入侵，你的抵抗力就显得不够用了。经过几年的服药治疗，仍然没有明显好转。回忆起来，就是在监狱里的喷漆车间和这个酚醛塑料车间，以及后来的聚氯乙烯车间长期劳动所造成的恶果。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历史自然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在这几年中，除了艰苦的劳动和低劣的伙食，还有一件最不堪的事情，就是周围的环境。一到劳改队，真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土匪、贪污犯、流氓、小偷等等，几乎都是社会的渣滓。生活在这些人当中，从心眼里就瞧不起他们，但是表面上还要和他们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更为可气的是，有些人却趾高气扬，欺侮像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犯。理由是：“我们是人民内部矛盾（简称“内矛”），而你们这些反革命，和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他们的想法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在监狱方面，的确是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担任小组长、记录员之类带有管理性质的岗位，大都是刑事犯，也就是所谓“内矛”，此其一；其二是，每月给犯人的零花钱也有相当的区别：他们一般是 1.5—2 元，而我们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 1—1.2 元；到了“文革”期间，零

花钱一律取消。理由是：这是刘少奇搞的修正主义，收买人心的大阴谋云云。其三，如果发生纠纷，管教干部通常会先批评像我这样的反革命犯，通常的训词就是“不许你反改造”。

正是因为对所谓“两类矛盾”划分有切身的感受，我开始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进行反思和质疑。其实，在他发表“两类矛盾”的文章不久，就错误地处理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乱打一气。

我当年所思考的成果终于在几十年后也就是 1995 年所发表的文章“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十大关系——学习邓小平理论心得”里面体现出来，我写道：“关于确定专政对象的主次、轻重方面，过去我们有些轻重倒置的倾向，应该从严打击的恰恰放松了；而有些本来就属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应该采取教育、说服的办法来解决的问题，却又神经过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动不动就实行专政，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马克思语）。针对这种偏向及其造成的苦果，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示：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处罚……，但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要多杀几个，才能表现我们的决心。……（这篇文章被吉林省省委党校主办的杂志《长白学刊》1995 年第一期第一篇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并同时发了本人照片。）

在大陆写文章，必须攀上一个大人物——权贵人物，才有可能发表。所以，这篇文章也不得不挂上邓小平的名字。今天看来，这种批判当然是非常不够的。后来，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我又说：为什么毛泽东把小偷之类的犯罪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呢？因为，小偷之类的犯罪，只能伤害普通老百姓，而不可能去中南海偷盗，不会伤害到他和他们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就可以网开一面，从宽处理了。而所谓的“反革命”那是针对他们的切身利益——统治权，要动摇他们的宝座。当然就是最大的敌人了，一

定要从严、从重处理了。当时在座的有个叫张劲夫的编辑（附注：这个张某还是通过我的考察和同意才从长春市委党校调入我所在的《经济纵横》编辑部）马上反驳说：你的看法太偏激了，把毛主席说得太坏了。我又纠正他说：现在没有什么毛主席了，只有江主席，官衔不是铁交椅，不会永远归某一个人的。结果大家不欢而散。为什么他如此卖力气批评我呢？因为当时在座的还有上级领导人——李长庆，其目的不言自明了。

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1964年，省公安厅来了一位姓刘的科长，好像是蹲点吧！他几乎找过所有的大学生谈话，当然也找到我。在和我谈话时，一开始便问我，经过几年的改造有什么收获？我反问他，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他笑了，说：当然要听真话，并且保证三不：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我才大着胆子说了四个字：“毫无所获”他又问：“听了什么报告最受感动？”“对不起，我一听报告就打盹或者思想溜号，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心里想的是，我在大学听过多少教授的课，怎么能够有耐心去听那些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什么干部瞎摆呼？这些人连现成的稿子都念不好，经常念白字，例如：那个时候和苏联修正主义论战，报上经常出现“核讹诈”三个字，有的报告人竟然念成“核化诈”，又如“柬埔寨”念成“东埔寨”之类。开始还引起一阵轰笑，后来被命令：不许笑，笑什么？）最后，我斗胆说：“肃反肃反，越肃越反，我原来只是对现实小有不满，现在把我抓起来，我却反而会满意，这不是说瞎话吗？你们能够相信吗？”我说这些话，倒不是相信他们的什么“三不”承诺，而是受一本俄罗斯小说的影响（书名早忘记了），那本小说写的是，12月党人在革命无望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纲领全部“坦白”，为的是把自己的思想保留在合法的官方档案里，以便流传后世。后来他们倒是实践了“三不”的承诺。但是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又来找我了解这位刘科长放了什么毒？我当然应该反过来

保护他，没有说出我们谈话的关键内容，当然也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不久，车间里的教育干事高淼也找我谈话，还是那一套。不过他最后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想通了，真正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了，就跟我说，表示你改造和进步达到了什么程度。好吗？这个高淼，看来在劳改队里是个比较开明的干部，他不搞强迫命令那一套，而是以耐心谈心的办法来套别人的话，他似乎懂得古人“攻心为上”的道理。可惜的是，他所维护的宗旨恰恰是和暴戾手段相配套的一种制度，一个体系，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及这个阶层。这就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所在。

关于改造的效果问题，最近读了许多有关的文章，可以作为例证：《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在该书第 235 页谈到作者劳改 10 年的感想时，有这样的话：“首先，人是不能被改造的，……坏人经过监狱可能变得更坏。”

又例如：丁东先生在他的《反思郭沫若》一书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分子改造之所以形成悲剧，是因为其整体趋势是把独立者改造成了附庸者，把思考者改造成了盲从者，把批判者改造成了检讨者、阿谀者。陈寅恪之所以难能可贵就是因为他坚持自我，实际上是保持尊严，抵制改造，实际上是抵制堕落。”（该书 第 243 页 作家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所谓“思想改造”的实质是什么？根据我的研究，可以这样说：为了保持现代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毛泽东还发明了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办法：“思想改造”。改造什么？回答很明确：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次，既然曰“改造”，自然有一个谁改造谁的问题。那当然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改造党外人士；在党内，则是高级、领导党员改造一般、普通党员；在最高核心层内部，则是党魁即党的领袖改造其他成员。说到最后，就是用党魁的思想来改造普通党员和老百

姓的思想。所以当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口号：把全中国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说得明白一些，就是要求全体中国人都来做毛泽东的思想奴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按他的爱憎来爱憎，随他的喜怒而喜怒。

同时，改造又是无止境的，所以要“活到老、改造到老”，也就是要求全体中国人都做毛泽东终身的思想奴隶。这，就是所谓“思想改造”的实质和最终目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毛泽东说：要一边倒，倒向苏联，于是全国人民都来学习老大哥，不断地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后来毛泽东又说：要反修，于是全国都来批“赫秃子”，并且要把“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清除出去、彻底打倒。总而言之，他老人家放一个屁，全国人民上起党国要员，下至普通百姓，都要闻风而动、全力以赴。毛泽东享受到了从前皇权制度下多少皇帝老儿无与伦比的威望和权力，这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在经济生产也就是在物质上毛泽东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现在又在精神方面也实现了完全的、高度的大一统。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杨宪益先生在 1988 年所写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两句：“十年风雨摧乔木，一统江山剩党魁”。总而言之，偌大的中国，东西南北中，一切的一切，从物质到精神，全部纳入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

那末，到底思想可不可以被改造呢？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所谓的“改造思想”云云，其实质就是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极权统治而发明出来的一种精神奴役的手段而已。请听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如何说的吧：“你们赞美大自然赏心悦目、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是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就没有看到自己老祖宗的告诫呢？事实上，所谓

“思想改造”，其结果不过是培养出无数惯于说假话、空话、套话、大话的投机分子而已。当然，其中也有许多人是被迫如此的，否则就过不了关。

后来有个管教干部悄悄地告诉我：有一次，管教科长（好像是姓金吧）在全体干部大会上说：像胡显中这样的犯人，敢于向我们说真话，说明他相信我们的政策，说明他有改造的勇气和决心。对于这样的犯人，没有改造好，那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做到家……。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对我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善，和气一点了。

不管什么情况，反正是：他有千方百计，我有一定之规。他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却无法束缚我的思想。相反，由于他们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使我看清了、看透了、看穿了一切，早已把他们加在我头脑里的思想枷锁争脱了，获得了充分的精神自由。可以魂飞天外、神游四海，如天马行空，驰骋万里。

在这里，还要说说我是如何应付那些所谓的“报告”的。每次开大会，都有一个干部做报告，而我们则席地而坐。因为天气冷，不时有人咳嗽，而咳嗽也会传染，影响许多人相继咳嗽起来，这本来是人的生理现象，是不可控制的必然。可是这个报告人竟然大为恼火。大声斥责道：你们想要干什么？怎么这么没有秩序！不许咳嗽！看谁再敢咳嗽？如此一吓，还真的产生了效果，没有人再敢咳嗽了。耐人寻味的是，不到 10 分钟，他自己竟咳嗽起来，而且毫不掩饰，也不压低一点音量，可见这些干部都是什么水平了。听这些东西在台上胡说八道，浪费时间，不如“废物利用”一下，或构思自己的什么诗作，或记忆刚才阅读过的精彩文字，或默诵某篇佳作，某首好诗。有许多优秀诗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句一句地背熟了，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当时我都能全部背诵下来。我把这事当成一种精神享受。有一种挑战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心情。

“文革”期间，报纸上披露了周扬被打倒的消息，这真使我大为开心。在心里幸灾乐祸地想：你也会有今天呀！想当年，这个周扬是何等的风光，红极一时，成为老毛在文化界的奴隶总管。可是，曾几何时，却落得如此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吧？可是后来看到关于胡风先生本人的回忆文字，他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这位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竟然对曾经加害于自己的对手今天落马的遭遇表示很不理解，不以为然。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豁达的思想境界！读着这一段回忆文字，心中顿时感到有些惭愧。

再后来，刘少奇被打倒，更使我思绪万千。终于把这些感慨凝聚成一首小诗：

感 时

功成身便退， 贤哉张子房！
淮阴功震主， 合当死未央。
文种不听劝， 难逃剑下亡；
明哲陶朱公， 泛舟游四方。
兔死狗当烹， 鸟尽良弓藏。
自古皆然尔， 利尽交自亡。
灯下常览古， 感时复嗟伤。
掩卷追往事， 挑灯唱“大江”⁶

⁶ 本诗作于“文革”期间。所谓“大江”就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权力与时间的较量

这一篇使用的题目，是借用六四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的一幅标语：“你们有权力，我们有时间”。这幅标语的立意太好了，太准确了。那些权力的把持者们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他们总有寿终正寝、或被赶下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而学生们的优势和资本就在于：我们拥有时间和未来，我们可以等待，可以观望，可以坐等今天的权力把持者下台的那一天。这真是一句最为经典、也最生动的台词。所以特地借用来作为这一篇的题目。

在我的难友中，最值得回忆的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右派分子聂浩。大家都称呼他为活字典，名不虚传呀！无论谁问他一个什么字，他可以给你讲上半天。他的为人非常低调，不好张扬，默默地劳动，不言不语，可心里却大有文章。

在唐诗 300 首里，有一首朱庆余的《宫中词》，其中有这么两句：“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之间尚且要互相戒备，提防告密者。在专政机关的监狱里，就更是如此。就好比宫廷里的宫女们之间，也要相互戒备，害怕告密。所以，犯人间大都是说些平平淡淡的话，诸如天气如何之类，而不能披露心事。只有个别靠得住的人，才敢于敞开心扉。当然也是要极其秘密地交流，而且必须是三言两语，切忌长时间地说悄悄话。在可以敞开心扉、推心置腹交谈的少数人中，聂浩可以算一个。

忘记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他先说：“我们这样下去，何日是尽头？”我则说：“我们有没有前途，就看我们有没有寿命。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健康地活下去，就没有什么

前途。如果我们能够健康地活，活个几十年，儿子总比老子活得更长久，到了那个时候国内的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他却说：“他会指定接班人呀！”我又说：“赫鲁晓夫不也是斯大林所选的接班人吗？结果怎么样？一句话，我们的优势和希望就在于：我们还年轻，还有时间等待，我们一定能熬得过他。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寿命。而寿命又取决于健康；健康则取决于心情。如果经常乐观、豁达，心情好，就会长寿，就有前途。”以上对话，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下，无疑是非常机密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怀着这样的心情，乐观地活下来的。我完全清醒地、很自觉地，用漫长的时间为武器，和老毛的独裁权力进行一场历史上空前残酷的较量。因此，我必须乐观地、高高兴兴地活下去。

最近读了一则消息：2006年8月5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议内容是纪念“文革”40周年，同时也为了缅怀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卡仲耘。她被红卫兵残忍地打死，这件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发生在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在这个会上发言的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李普是新华社的老社长，何燕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杂志副总编辑，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最耐人深思的是谢韬的发言。他说：“希望大家长寿，因为只有长寿才能够看到许多全本。我们已经看到了蒋介石的全本，又看到了毛泽东的全本、斯大林和苏联10月革命的全本，我们还要争取再看一个全本。”谢韬所希望看到“另一个全本”，是什么全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玩味吗？

到了“文革”期间，所有的书都不允许看，只许读毛泽东的书，就连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也不能看，他们的理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捷径。如果读其他人的书，就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怎么办？

只要想办法，办法就会有的，就学毛泽东选集吧！不过，我

有自己独特的学习目的。

记得有位戏剧评论家说过：100个观众的眼中就会有100个哈姆雷特。再拿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作品《红楼梦》来说吧，鲁迅先生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

同样一部毛泽东选集，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蒋介石读老毛的书是为了吸取失败的教训，以便东山再起；美国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则是为了便于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顽固派则是为了如何确保“红色保江山的永固”……，那么我学习老毛的书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在有朝一日能够再拿起笔来，好认真地而不是敷衍的，深入地而不是肤浅的批判他，批倒他，把他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但这个事情不能公开地说，只能够悄悄地做。我在阅读毛书的时候，预备一支红蓝笔。凡是相互矛盾的地方，就用蓝色标明，并注明互见那一页；凡是毛的意见和马克思、列宁不同的地方，就用红笔划线。不管怎么划，千万不可划问号（那就表示你怀疑其正确性，不得了！）。后来，在农村改造期间，我被折磨得几乎要呜呼哀哉，自顾不暇，这套书终于弄丢了，非常可惜。但是我还是记得许多问题。例如：毛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是他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不就是矛盾吗？所以造反派双方都可以从毛书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语录，作为精神武器，大打派仗；而这位伟人恐怕正坐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喝着茶水、抽着“大中华”，怡然自得地看热闹哩！就像古罗马的奴隶主观赏奴隶们斗得头破血流一样的开心、取乐。

又例如毛说：党指挥枪，而不能由枪指挥党（按：军队国家化是一切现代化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举目世界上只有为数

不多的几个专制集权国家还在搞什么党指挥枪。“军队由党绝对领导”是支持专制集权制度的一大支柱。)。而同时他又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说，有枪便是草头王，当然也可以创建一个党、一个政权。那么，到底是先有党还是先有枪？这个问题好像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无解，没有标准答案。

还有许多奇怪的理论。例如：被文艺界和思想界奉为圭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白纸黑字这样写着：“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曾经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现在把老毛这段妙论抄录在这里，目的无非是请全世界的文化人来共同欣赏一下：马克思主义竟然包括了什么现实主义，甚至还包括了原子论、电子论。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包了。其实，我们只知道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精确概括：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唯物辩证法三大部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全部内容。而根本就不可能包括什么现实主义呀，什么原子论、电子论呀……，他这样说，到底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以上几条是今天能够记忆起来的，此外，还有许多理论问题，已经在平反以后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并且发表了。例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问题等等。

老毛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个话说了几十年，也用这个话作为棍子和刀子，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残忍地折磨了几十年；中国的老百姓也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习惯性地这样说，据说这个话还是出自列宁的著作。可是一查列宁的原著，才真相大白：列宁是在1920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这个问题。他在讲话中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并且“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

接着他才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就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列宁选集》4卷370-371页）。“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念了20多年，10亿人民深受其苦，直到今天仍然心有余悸。现在才发现，原来这不是列宁的原话，恰恰相反，这是列宁批评过的话。可见老毛歪曲和捏造的手段了，对于这种歪曲列宁原话的手段，我在1995年所发表的“正确处理新时期的10大关系”长文的第二节“政治与经济”中作了揭露（该文刊载于《长白学刊》1995年1月号之首篇，并附发本人照片）。当然，和在大陆发表的其他文章一样，语气不能不很委婉。我是这样写的：“把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错误定义硬栽到列宁头上，或者是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曲解。误解也好，曲解也罢，其结果则相同：长期以来，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错误地认为，政治真的就是，而且仅仅是阶级斗争。到了极左的年代，政治更成为打人的棍子、整人的权术、坑人的陷阱……，为害之烈，为祸之惨，国人有目共睹，无不切齿。”最后我还写道：让我们永远抛弃“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个错误的公式吧，让我们牢记列宁在1920年的著名教训：“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可惜的是，最后这段话被编辑删去了。

又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老毛一贯认为：知识分子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说，现在知识分子必须改换门庭去投靠新主即无产阶级。这个大前提就错了。错在哪里？

我于1989年在香港《明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毛泽东思想应该列为四项基本原则吗”，1998年在台湾《东亚季刊》所发表的“四十年前一奇冤”内容都是批评老毛这个错误理论的。现仅引用后者部分内容如下：

1954年反胡风，1957年大抓右派，直到文革，发展到登峰

造极。文革期间，真是达到了“顶峰”。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矛头所向，无不是针对知识分子。为什么毛泽东总要与知识分子过不去呢？原因有二：

一、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就是有知识。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原罪”。

几千年专制制度下，皇帝是需要知识分子的。他们有的是靠血统关系承袭帝位，需要知识分子为其写家谱，论证承命于天的合理合法性；有的是靠“马上得天下”，但深知不能完全靠“马上治天下”，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其帮忙、帮闲，甚至帮凶。所谓帮忙，一是为帝王出谋划策，作为智囊人物，二是向老百姓宣抚，弘扬帝德，以收民心。所谓帮闲，封建帝王及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后妃们在热衷于声色犬马以外，有时也想附庸风雅，搞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可惜帝王后妃们才情有限（像李煜那样的皇帝兼具艺术家天赋者，实不多见）这就需要有一批舞文弄墨的人吟风弄月，给他们调剂一下生活，活跃一下空气。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不也曾应诏为玄宗和贵妃娘娘写过《清平调》吗？总之，封建帝王需要知识分子。所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还不断培养、选拔一批文人在其周围供驱使。但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有些文化人偏偏不愿帮忙、帮闲，更不愿去帮凶，相反，却倾向人民，有时甚至和帝王们唱反调，不唱赞歌唱怨声，不写颂词写檄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具有独立人格、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是很多的。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就是其一，诏书迭下仍拒不接受，写过《陈情表》的李密也算一个。文化人因其有知识，如果有异志，对封建帝王的威胁比一般人大得多。（老子）就说得十分露骨：“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如果都是一堆混混噩噩的行尸走肉，那统治起来多么方便和容易！

台湾的柏扬先生在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说：“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可谓

深得历代统治术的真谛。出于巩固统治宝座的目的，历代帝王都奉行愚民政策。孔子就曾献计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今中外，奉行愚民政策的例子不胜枚举：外国的希特勒说：“知识会败坏我的青年。”无独有偶，毛泽东也说过：“书读得越多越蠢”，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奇怪的是，毛本人手不释卷、好学不倦是国人皆知的，为什么他自己要读得越多越好，而且提倡他周围的人、高级干部要多读书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凡统治者都有一个奢望：不仅控制和垄断全国的物质财富，而且要控制和垄断全部的精神财富，由他或他们少数人来思考、定方向，其他的老百姓只要“由之”就行了。所以，就流行这样的口号：“毛主席挥巨手，我们奋勇前进。”

但是，愚民政策未必总有效。有些老百姓硬是通过读书摆脱了愚昧状态，获得知识，同时也就获得了思考的能力，从而打破了统治阶级对知识和思考的垄断权，同时又拒绝为皇帝效劳。于是，对知识分子的围攻、迫害、捕杀便是统治阶级最后的铤手鐮。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直到明清两朝盛行的文字狱，都是对文化人的摧残。

毛泽东在位 27 年，对文化人一次次的迫害，直到大革文化命那场浩劫，正是秦始皇所开始的，对知识分子迫害暴行的继续，是焚书坑儒的现代版。无怪大陆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生前说：“比秦始皇还厉害”。毛本人也曾经不无得意地说：比秦始皇要厉害一百倍。请看一位曾长期追随毛泽东左右、身居中共中央要职、目前仍然健在的李锐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作中写道：“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

二，知识分子是异己势力，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劳动者，而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毛泽东的又一名言。原来依附的资产阶级不存在了，要改而

依附于工人阶级，这种政换门庭、投靠新主，前提条件就是要脱胎换骨。办法呢？就要触及灵魂闹革命，要天天斗、月月斗……七斗八斗，“七八年再来一回”等等。结果为何？海内外人士有目共睹，记忆犹新。笔者在1993年撰文“论中国当前人才危机”中谈到：大批优秀人才被迫出国，流向海外，为他国服务。据法国《欧洲时报》报导：旅居美国的华人，在40年代末只有10万人，到70年代猛升到120万人，其中学者专家就达十万多，被世界公认的一流科技人才就有3万多，占美国一流科技人才的四分之一以上。笔者在文章中引用孟子中一段话：“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鹞也。”

为了文章便于通过审查顺利发表，省略了下面最尖锐的一句：“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的意思是：夏桀与殷纣两个昏君，把千千万万善良的老百姓驱赶到革命势力的代表——商汤王和周武王那边去了。50至70年代的毛泽东，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吗？

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劳动者队伍以外，归入剥削阶级的阵营，我不知道是哪家的理论。但是，可以断言，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请看马克思是怎样写的：

“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演员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对自己的企业主来说，是生产工人。”

再听听列宁的意见：“对于专家，我们不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奴仆，而是文化工作者”

最后，让我们来请教一下大陆现代化事业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邓说：“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者，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嘛！”

总之，从马克思、列宁直到邓小平，都把知识分子看成自己人，一家人；而毛泽东的毛与皮的“高论”却是一个例外，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例外，一个遗害甚烈的谬论。

孟子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三思：“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路人；君视臣如牛马，臣视君为仇寇。”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把知识分子看成自己人，一家人，知识分子当然就以主人翁的精神干事业，贡献才智。毛泽东时时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力量，处处防范，知识分子将如何回报这位曾经君临中国，长达廿多年的大人物呢？历史和生活实践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回答。

* * * *

70年代末期，位于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有了更为生动的回答。这个时候，有感而写下了这样几句：

感 时

（1979年末，曙光在前）

千秋功过谁评说？大浪淘尽史臣笔。
华堂方成檄文飞，尸骨未寒民怨急。
杜郎雄文万古传⁷，秦皇美梦百代讥。
喜看今日百花园，方信民心不可欺。

⁷（杜牧的《阿房宫赋》）

当了三个小时的“外交部长”

1965年，监狱当局又进行调整：把所有的反革命犯都集中到聚氯乙烯车间，据说是为了方便改造。聚氯乙烯车间生产的是塑料凉鞋，我被分配到乙班劳动。产品就是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每个生产者都有代号，嵌入模具里，生产出来的凉鞋就有你的代号在鞋底上。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就不难追查责任者。

和其他车间一样，这里也有一种刺鼻的气味，显然对身体有害。不过这个时候已经考虑这一点，并且发给一点保健品：每个月可以吃到2斤猪肉、1斤白糖、半斤豆油。白糖和豆油直接分发到个人，猪肉则交由大伙房煮熟以后分给个人。在烹饪时有车间里的代表在场监督，做好了全部挑回车间里处理。我计算了一下，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些东西也就是值3元钱左右吧，也就是说每天的保健费用是1毛钱。和我们身体所受的损害比起来，区区1毛钱的保健品，实在是得不偿失。但是，如果不给你呢？不是也得忍受吗？什么叫专政？强迫劳动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而且还有很多犯人都希望到这个车间来劳动，这就叫“物质利益”吧，竟然可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在这里，值得描述一下分猪肉时的场景，那真是如古代的“大祭”活动。全班几十个人都拿出自己的饭盆（或菜盆）摆在一起。再由大家比较信任、办事比较公正的人（通常是小组长或带班的）来掌勺，把一大桶猪肉和肉汤都分到所有的盆里。然后还要请大家再看看，哪个多了，哪个少了，再匀乎匀乎。到最后，大家都没有意见了，这才让每人拿走自己去享用。瞧！这样的场景不像古人所说的：如承大祭？多么郑重，多么认真，多么一丝不苟！

为什么要如此郑重其事？

据说在别的班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掌勺人给自己的盆里可能多分了一点（请注意，仅仅是“一点”而已），分完了以后，有个人马上制止大家拿盆的手，并且非常激动地说：先别拿！然后端起那位掌勺人的盆，和自己的盆往管教室走去。后来的事情大家也能够猜到：管教出来，批评了那个掌勺人几句，然后把他们两个人的盆倒到一起，再重新分给他二人。这么一折腾，热气腾腾的猪肉早已经变凉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吃的时候作何感想？为了几块甚至是一块、半块猪肉竟然撕破脸皮，诉诸管教来裁决，这样做值得吗？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人们的心理变态和扭曲，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降低到一般动物的境界，真是太可悲了，太可怕了，也太可叹了！

所谓“凉鞋”事件

在“文革”高潮中，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所谓“凉鞋”事件。红卫兵造反派竟然在凉鞋鞋底的花纹上发现了一个“毛”字，这可不得了、了不得，把伟大领袖踩在脚底下，还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吗？那还了得？设计模型的工程师是劳动教养后就业的“分子”，好像姓纪吧！每天晚上都要被拉到人民广场上去接受批斗，结果当然被斗得鼻青脸肿，我们估计肯定要杀头。几十年以后，我和同事们谈起当时那件事情，有的同事立即证实说：大街上一切行人都要被检查，如果穿这种鞋子，就要受到严厉训斥，还勒令把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回家去，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线。

巧得很！模型设计出来以后必须先交设计室制图、描图，然后才加工成品。而在设计室的描图、制图者就是在前面提到过，和我一起晒图的同伴，现在业务能力提高了，可以担任制图、描

图的任务了(瞧我这个臭记性,忘了他的姓名,好像是姓李吧?)。他当然也被关押小号反省、交代问题 2 个多月。放出来以后,我见到他。问起那件事情时,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个事情,提起来就是千斤,撂地下就只有 4 两。”好一个千斤与四两的比喻。仔细想来,许多事情难道不都是如此吗?什么反革命?什么右派分子?就看你怎么看问题了。从老毛的立场看,严重得很,该杀该关;可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来,却不值一提,小事一件而已。好!好一个千斤与四两。我经常回想起他这句话,太有价值了!

果然,后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个姓纪的“分子”仍然搞他的凉鞋设计,只不过现在要仔细许多了。再就是把全部的成品从仓库里取出来,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纹削去一小块,看不出“毛”字了。还有就是所有居民只要持有那种凉鞋,一律可以旧换新。今天看来,这完全是一场闹剧,甚至可以说是恶作剧。停工、停产的损失谁来买单?当然是国家和全中国的老百姓了!

演戏演出了丑闻

在停产的初期,管教们也不知道要停多久。为了活跃精神生活,他们决定排演革命样板戏。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智取威虎山》,并且把全车间的文化人调动起来。我由于嗓音不亮又没有舞台经验,只安排一个配角——就是打着红旗上山时走在前头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台词只有一句:“报告 203,前面是三叉路口。”这样的角色也有好处:可以滥竽充数,没有多少台词要背。不像现在,主角和配角的报酬相差得悬殊。不论是主角或配角,待遇仅仅是晚上吃一餐加班饭,如此而已。此外,可以免除终日枯坐在那里读报纸,或听那些说了多少遍、永远正确、但永远没

有任何价值的废话。

当恢复生产的命令下来以后，已经进行的演戏活动当然无法停止。这样我们当然可以免除劳动任务，整天排练，直到冬天才正式演出。

就在革命样板戏演出的时候，发生了许多秽闻。几个月以后，该算总帐了。当时正是“文革”高潮中，社会上有各种批斗活动。监狱里自然也不能例外。当初的几个主要演员大都被点名站出来，接受批斗。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扮演 203 首长即少剑波的郑宝银（原来是空军的大尉，因为强奸犯罪判处 15 年；又因为这个事情被带上脚镣，时间长了，再加上他的心脏病复发而死。真是一个风流鬼啊！），扮演小常宝的——什么名字忘记了，反正是一个长得并不漂亮的小伙子，只是嗓音好，扮相也还可以。还有好几个，由于没有太深的印象，名字也就忘记了。反正在台上站了一排，不但要低头、弯腰，还要在脖子上挂一块大大的胶合板，上面写着“流氓犯郑宝银”，再用红笔在名字上打一个大叉。这还不算，更为残忍的是，用来挂胶合板的不是普通的绳子，而是细钢丝。胶合板的全部重量就集中于这根细钢丝，再传达到他的脖子上，什么滋味可想而知了。还有个别人因为过去有私人恩怨，这时乘机报复，上去来回拉这根细钢丝。这实际就是用细钢丝来回切割他的脖子。简直太残忍、太粗暴了，也表示这个人太卑鄙了。

当时正值盛夏，只见他们个个汗流浹背，怪可怜的；可是再一想，这也可以说是为当初的“一时潇洒”而付出的代价吧！

经过批斗，他们都各自交了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同性恋”。我不知道西方的同性恋者有没有性活动，是不是互相满足对方的性要求。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可以说是监狱里的必然产物，监狱里称之为“鸡奸”。据说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军队里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事情。孔子说得好：

“食、色，性也。”吃喝和性是所有动物都有的内在要求，是生理的必然，也是一种天性。人为地压抑这种天性是不人道的，性压抑必然产生性饥渴，性饥渴就有可能产生性爆发，为了性的发泄，不分对象（也就是将男人当作女人，据说还有以牲口为发泄对象的），必然伴随着混乱和无序。我记得有一次管教狠狠地教训这种人说：“连牲口都知道分公母，你还不如牲口！”在这里应该为这些人说句公道话：牲口有选择交配的自由，而他们缺乏的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必然导致乱搞嘛！

当然，历史上也有个别性变态的皇帝，虽然拥有三宫六院“粉黛三千”，还不满足。有的专门去到青楼玩妓女（如宋徽宗），有的则专门玩小男孩。旧版的《辞源》里就专门有“断袖”词条，把这种癖好的人称为“断袖之癖”或“断袖之徒”。现在新版的《辞源》和《辞海》都删掉了这个具有旧时代色彩的词。

“外交部长”胡显中

在开过第一轮批斗会以后，下一个目标是谁？该轮到我和我的同伴们了。在“文革”期间，盛行背诵语录。有的文盲，或者小学文化水平的犯人都能够顺利地背得出许多语录（因为他们几乎手不释卷地读和背诵，水到自然渠成）。而许多大学生却相反，背起来非常吃力，磕磕巴巴的。这种反差当然令监狱当局非常恼火。每当开会时，经常是这样：先叫一个有文化的站起来背某一段语录。一般而言都会选择比较不认真的人来背，当然背不出，或背不好。然后再叫某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起来背，他却背得非常顺利。马上有了对比，于是就下结论：看来是感情问题，是对伟大领袖的爱不热爱的问题……云云。我也曾经多次被点名站起来背语录，也曾经因为背得不流利而被奚落过。从此可以看出：监狱当局早就对这些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犯人很不满，但是又没有

什么重大的把柄，仅仅凭这一点，似乎还做不出什么大文章来。他们在等待机会，杀这些人一个下马威！

机会终于来了。

甲班有个犯人称李玉满，因为是个刺头，人见人恨，给他取名为“李不满”，什么事情都要闹腾，和谁也合不来。管教讨厌他，犯人更视其为坏蛋。恰好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关押小号，在管教提审时，问他还有那些错误，不知道他那根神经出了毛病，竟然胡说什么：我要组织反革命集团。听到这个回答，大概连管教心里也觉得好笑。但也将计就计吧，就顺水推舟地进一步问：你这个反革命集团叫什么名字？都有那些人参加？……一一道来之后，还要求他写下来。

按照监狱里通常的做法，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类案件，首先应该把所有涉案人员全部关押起来，分别看管，逐个审问，务期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根本就没有把他当真。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白白错过大好良机。于是召开全车间犯人大会，在会上让李玉满自己亲口坦白交代问题。

叫李玉满写，他可以写；但是面对着一百多号同犯的眼睛，要他自己念这个名单，他可没有这个勇气。等了半天，就是不敢念出声来。管教只好指定另一个犯人念。不念也罢，一念名单，全体犯人都瞠目结舌：

“国防部长某某某”（这个名字忘记了，是一个彪形大汉，体育学院的学生）台下一片呼声：“某某某站出来示众！于是，乖乖地站出来，低头认罪的样子。

“财经部长徐某某”（也忘记了名字，只记得他姓徐，是甲班的记录员）台下又是一片呼声：“徐某某站出来示众！”徐某也只好照样站出来。

余下的还有：驻苏大使闻苑蒲（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生）；驻美大使裘舜华（吉林邮电学院学生，因为闹罢课而被打成

为现行反革命；他专门阅读老毛著作的英文版，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学习外语。所以就被派到美国去当什么“大使”了。）

其间还出现一幕插曲：有个袁什么，被任命为什么部长，但他坚决不承认，也不站出来，而是口口声声地哀求：白管教（主持会场的是甲班的白管教），你是了解我的，我决没有参加他的什么组织……可是大家不答应，呼声越来越高，要他老老实实，抗拒改造死路一条云云。最后，还是这个白管教说了一句：叫你站出来，你就站出来再说。服从命令！他这才乖乖地站出来，同样低头、弯腰。

忽然，念到我的名字：“外交部长胡显中”。简直是岂有此理！我什么时候和这个李玉满勾搭上了？见鬼！但是在那个形势下，即使有 1000 张口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了，别找麻烦，乖乖地站起来，走到前台低头、弯腰如仪。

名单念完时，台上也站满了一排。所幸的是，没有给我们挂什么牌子，这又区别于那些流氓犯。下面就开始让大家发言批判。

在那些发言中，我今天回忆起来，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发言者姓何，原是长春市税务局的干部，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妻子发现，找到那个情妇大闹一场；那个女人羞愧难当，便上吊自杀了。由于人命关天，所以判处无期徒刑。由于表现好，每年评积极分子总有他。排演《智取威虎山》时，他扮演老乡李永奇，用京剧界的术语来说，属于“净”的行当，通俗的说法叫“黑头”。该角色有很长一段唱词，就是“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他唱得有声有色。不过我特别欣赏的却是这么一段唱词：“我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为什么？因为这几句唱词正代表了我的心声啊！

在全车间的犯人当中，他的威信很高。他的发言也非常有特色：“这些个什么大学生呀，狗屁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依我看来就是吃屎分子！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何以

见得呢？就拿我们大家都非常热爱的毛主席像章来说吧，我们为了得到一枚像章都高兴得很，反复地看，反复地欣赏，恭恭敬敬地、高高兴兴地别在自己的胸前，显得十分荣耀。可是这些个大学生，眼皮都不卡一下，根本就没有瞧得起。再拿背诵语录来说吧，没有什么文化的人都能背得瓜瓜的，而他们一个个都背不出来，可他们背什么古典诗词呀，却来了精神。什么李白呀、杜甫呀，一个个都十分喜爱。这是什么问题？我看就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他们根本就不热爱，一点都不热爱。没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大学生，简直就是反改造分子。”听了这一大段数落，从心眼里佩服他的口才，他说得也很对！就是没有感情嘛，如果说有什么感情，那只有—种感情，就是憎恨！鄙夷！只是这个姓何的也太愚蠢了，做了封建帝王的忠实奴才！

大会开了好久，我—想：这样下去实在太难受了，我必须自救，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大声报告管教：我要反戈—击，检举揭发！这个白管教平时和我没打过什么交道，也不了解。这次，就看他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了。果然，白管教让我发言了。说什么呢？我知道些什么？又能揭发些什么？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怎么揭发？于是，只好临时现编几句，上纲上线，批判—通。最后表态：坚决拥护政府对李玉满从严惩处，拔掉我们改造道路上的绊脚石！

白管教当即表态说：胡显中的揭发很好，可以坐下了，回去吧！我如获大赦—样回到原坐处。回想起来，这次当了三个小时的什么“外交部长”，却站了三个小时。冤不冤？好在及时表态，少站了几十分钟。

以后这个李玉满也放出来了，只是不敢再抬头看我们这些“部长们”，而是低头、匆匆而过。

为什么搞这出恶作剧？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李玉满的为人，也根本就不相信他的所谓“坦白”，更不相信关于这些“部长”的

鬼话。但这样做的真实目的何在？无非是为了敲打敲打，触动一下这些人的灵魂，刺激这些人的神经，促使这些人认真改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罢了。但是，这样搞真的能够达到目的吗？

只要是真理，不需要什么政治压力，人们一定会自觉地学习、信服，因此也就可以流传千古。例如：孔子已经死了 2000 多年，但是他的《论语》及其他言论仍然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对于全世界的伟大贡献。他的语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被挂在联合国的大厅里，为世界人民所信奉、所遵从。中国承办 2008 年奥运会的口号，仍然要从孔子的语录里寻找、选择，这一切说明：真理不需要武力支持；相反，需要武力支持的肯定不是真理，很可能是谎言。例如当年被吹嘘得天花乱坠，什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什么“精神原子弹”……不是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吗？今天，除了还保留一块空招牌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被人们记住的？

林彪一号通令下的火转移

3月31日，这个日子在我的生命史上具有多重意义：1951年的这一天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开除，1956年的这一天被东北人民大学“集训班”宽大释放，1970年的这一天，距离我刑满还有半年时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入“倒计时”。就在这一天，全体犯人再一次集合转移，向何处去？后来才知道，这是“林副统帅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所有的牛鬼蛇神统统下放到农村去，准备打仗。

头天晚上睡觉之前，管教还布置了明天的学习内容，要求大家做好记录：发言要有详细的记录云云，于是，我们安心睡觉。谁知道当天还没亮的时候，一声哨响，全体起床，立即捆绑行李，准备出发。这就叫军事化：秘密决策，行动迅速。一个小时以后，伙房送来了早饭，另外还有每人七个窝窝头（这些窝窝头就是我们在路上吃的干粮）。然后是集合，上车，大概中午时分，大队人马就到达长春车站。我们被指定在站台上某处席地而坐。等待，等待……一律不许动！否则，就要开枪！（四周都布满了警卫，一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看来，他们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人看待，因为人不但需要吃、喝，还需要拉、撒。如果说不吃不喝还可以忍耐几个小时，那么，不拉、不撒却忍耐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几次请示管教都不允许动弹，实在别不住了，就只好自然而然地尿了裤子（时间是1970年3月31日下午3时左右），地下一片汪洋。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允许分批去厕所。也可以这样说：我救了他们。在北方早春的气温条件下，我的棉裤就这样用自己的体温慢慢捂干，直

到吉林省最大的劳改基地——镇赉县四方坨子，开始了最后一段、也是最艰苦的农村劳改生活。

镇赉县四方坨子是吉林省西北方向紧靠黑龙江的一个小镇。（请注意：“紧靠黑龙江”这几个字非常重要，以后就会知道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从前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后来由于无数劳改犯人的汗水浇灌，慢慢地有些生机。生产出许多粮食，供应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压力。

在这个镇上设有劳改大队，也就是总场；下面还有 10 个支队，也就是分场。每个分场大约有 2000-3000 名犯人，这样算下来，总共就有 2-3 万名犯人。所以说这里是吉林省最大的劳改基地。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例如饮马河、杉松岗……等等。

当我们这些人到来时，四周警卫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们刚一下小火车（为什么是小火车？从长春发车只能直达一个叫“坦途”的地方，然后再转乘小火车开到四方坨子镇。）就被分别押上马车。马车慢慢地行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如果心情好的话，完全应该好好欣赏这样的大好美景。可惜，这样好的大草原不是为了旅游观光，而是为了关押劳改犯。为什么？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任何犯人想要逃跑都不可能。即使你跑出了铁丝网，难道你还能跑出这个大草原吗？

一路上，心里一直在猜想：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那里又会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劳动？我还能够熬过这几个月的“倒计时”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差一点就没有活着走出这个大草原。

我和百余名犯人被分配到第一分场。到了农村，就有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几乎所有的茅坑里都看不到手纸，那么，人们用什么东西解决大便问题呢？说起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用高粱秆儿刮。上厕所时，人们随手掐一根高粱秆（当地称呼为秫秸），

3-4 寸长，用牙一咬，劈成两半，用来刮屁股。他们的肛门为什么就这么结实呢？奇怪！所以，农村的厕所里看不到手纸，却有许许多多长短不一的高粱杆儿，这真叫人“大开眼界”了！

住的方面更为拥挤，这倒没关系，不就是几个月嘛，好熬！吃的还可以，我们还打趣地说：农村总是吃新粮，比城里强。再来看劳动，那可就不得了，简直就的苦役：从早到晚，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息（还要学习，所谓学习，无非就是批判白天劳动不好的人，逼他承认错误，并保证明天好好干之类。）。

4 月分的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我们的劳动是脱坯。这种“坯”就是当地的主要建筑材料。脱坯劳动可以细分为：和泥、抬泥、抹模子……等几项。哪样活都需要大力气，还要一定的技术。我既没有力气，更没有技术。最后，只得被派做抬泥的。这个活需要肩膀上有一定的力度，还需要腿脚快。否则，供应不上人家抹模子的进度，耽误了生产，一切责任都落到你的头上。几个回合下来，早上吃的那些东西早已经消化掉了，已是饥肠辘辘。但是，离午饭时间还早哩！只有坚持、再坚持。半天下来，肩膀早已是红肿，痛疼不已。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到了这个时候，真是欲哭无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啊！还有几个月就到期，难道这几个月都熬不过去了吗？

由于头一天的天气太热，而抬泥是重劳动，为了轻装，就把棉衣、棉裤都脱了，只穿单衣和单裤出工。老天爷太捉弄人了：这天却下起雨来。既然下雨，就不能脱坯了。大家在一个被弃置的小房框里，席地而坐进行学习，并讨论劳动中如何分工等等。小风刮来，凉飕飕的。仅穿一条单裤的我，因此受了风寒，晚上右膝盖疼痛。第二天报告管教想请假。管教一看：不红不肿，请什么假？反而被训斥了一顿，还得出工劳动。

一到现场，膝盖实在痛得很。勉强劳动，走起来就不可能快，很快就影响了抹模子的劳动进度。管教又过来狠狠地批评了一

顿，并且警告我：老老实实，别耍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最后通牒”了。

和我共同抬泥的，也是从铁北劳改队转来的年轻人，也很瘦小。好像是地主家庭出身吧，他看出我的痛苦和无奈，鼓励我说：你还差几个月了，咬咬牙也要干下去呀！告诉你吧：我连碗茬子都跪过（可以想象：双膝跪在碗茬子上是什么滋味？人道何在？人对人为什么如此残忍？折磨？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所造下的罪恶。），什么苦没吃过？没有办法啊，只有咬牙干吧！

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硬是咬牙干了一天。晚上这个难受啊，真是刻骨铭心的痛，当然，也是刻骨铭心的恨！

第二天，我实在抗不住了，要求调换岗位。管教问：你能干什么？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答案来。和泥吧？连泥都叉不动。抹模子吧？不用说劳动，就是在地下蹲好几个小时也受不了。

这个时候，我深深地感悟到的是：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真是没法比。10多年来，从事工业劳动，差不多都还可以胜任。而一到农村就无法生存。这个区别正是两种生产力的差异所在。农业生产全靠手工作业，靠体力；而工业化生产，则利用机械为动力。

到了这个时候，还想什么工业化和农业生产区别这样的理论问题，真是不识时务！眼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熬下去？

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换劳动仍然不行，管教说，你这么大的个子，又没有什么病，怎么就干不了呢？别人也有的是大学生，还有教授什么的，都能干，为什么你就干不了？显然，这是思想问题，也就是反改造问题！好，今天就不用你干了！来人！把这个反改造的分子捆起来！

一声令下，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捆个严严实实，动弹不得。

过了大约个把小时，管教过来问：这个滋味怎么样？比劳动更好受吗？我只得认错告饶：我一定好好干！于是叫人来松开绳子。刚一松开的时候，浑身麻木，没有一点知觉。又过来两个人，

分别提起我的两条胳膊，用力抖动。这一来更是锥心似的痛，我要求他们：别这样，别这样。他们说：不这样，你的胳膊就会残废了，这完全是为了你好。仔细想一想，也是这个道理：长时间不过血，器官岂不就要坏死了吗？所以必须马上强制性地加速血液的流通，这样才可以挽救胳膊。只是那个滋味实在难受极了。这是我第一次被如此捆绑（在铁北劳改队逃跑被抓回来时也捆过，但那是象征性的捆，而不是结结实实地捆。），以后还有记不清的好几次，都是这样难受，也都是这样受了过来。当然，不可能不留下后遗症：直到今天，我的左臂仍然时有伤痛，往上举不高，往后弯也不行。特别是在洗澡时，无法自己搓背部；乘工交车时如果没有座位就只能用右手扶栏杆，左手则无力扶。

到了5月，下水田里耙地。当时的水温还很低，但是，犯人们一律下到齐腰深的水里，来回耙，用双脚把土地耙平。据说在正式的农场里，农业工人都是穿着水靴劳动的。而我们既没有什么水靴，即使有也不允许穿用，也不允许穿什么鞋。田地里难免有各种杂物，如玻璃碴子，小铁钉等等，那就全靠每个人的运气了，一天下来，双脚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还有，出水面时被风一吹，简直就如刀割一样，钻心地痛。一句话，完全和牲口一样地被驱使。

到了铲地的时候，由于没有什么经验，经常落在后面。犯人劳动和普通人不一样，前后都有卫兵看守，因此犯人间的不允许太远。落在后面的人必然要被批评、训斥，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夏天，气温高，出汗多，因此对水的需要总应该满足吧？有一名犯人专门挑水供应。他挑的水当然是生水、凉水，另外有一瓶暖壶盛开水专门给管教干部喝的，这个暖壶就泡在我们喝的水桶中。这样，我们喝的就是涮暖壶壳的水，大家也习以为常。这还不算，就连这样的水也不是充分供应，而是按人头分，一人一

舀子。可是到了我的时候，管教干部以我的劳动成果只有别人的1/2或者更少为理由，发话说：“只能给他半舀子”。为了活命，我只能接受这半舀子水，和着屈辱的泪水，一同咽进自己似乎冒火的喉咙里。有时，在开午饭的时候，也会上演这样一幕。我只能领到半个窝窝头和半盘汤菜。管教有时还会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叫“按劳取酬”。我的天！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到这四个字的。“按劳取酬”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但那是指劳动报酬而言，不能应用于生活必需品的范畴。这个管教竟然随意乱用，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一定会拍案而起，愤怒地骂道：“我下的是龙种，孵出来的却是跳蚤！”

人们经常教育孩子：讲卫生，饭前和便后要洗手。可是这个要求在这里根本就办不到。中午开饭时间一到，齐奔向饭车，活像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小孩。记录员上去给大家分窝窝头，他洗手了吗？在这半天时间里，他拉了、撒了吗？谁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谁也顾不上这些了。吃饭就是一切，是天大的事情，谁还管什么卫生不卫生呢！

人们常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似的罪。”可是受罪受到最后，就只好把命交出来了。受罪的极限就是生命的终结——死亡，我大概离这个极限已经不远了。由于多次被折腾、摧残，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大大地下降了，体重还不到40公斤，而且下肢严重浮肿，上身却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劳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跟随着出工走路的问题，也就是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尤其是看到自己胳膊上青筋突显，下肢却肿得皮肤发亮，我强烈地预感到来日不多了，不由得潸然泪下。难道我就这样死在监狱里吗？那我真是死不瞑目啊！

终于有一天收工后，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了。勉强地爬到上铺，打算拿自己的餐具准备打饭时，一阵昏迷后，发生了什么事

情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告诉我：我一个仰面翻倒摔下，好在当时排队打饭的人多，我的身体就重重地砸到他们身上。他们把我送到卫生所，打了一支什么针，说是没什么毛病就抬回来了。

当我醒过来后，发现他们正在批斗同组的犯人黄某人（名字忘记了）。我因为不可抑制地咳嗽了一声，他们立即把我拽起来，加入被批斗的行列中。听过他们的发言以后才明白所以然。原来这个老黄从前是个医生，懂得一点诊断的常识；当他看到我当时的症状，就翻开眼皮看我的瞳孔，然后说：这回可是真的。也即是说：以前几次都是装病，而这次才是真的有病。

但是，大家却认为：他是在为我打掩护。因此转过来又批斗他。所以，他只好大声抗辩说：因为我恨他这个反改造分子，就诅咒他，希望他快死算了。接着还转过脸来对着我恶狠狠地骂道：你为什么不早死？死了也不至于坑害别人。

就这样连环批斗，一直到深夜。究竟为什么？其实平日我和老黄之间并没有任何来往，他也不可能为我辩护。仅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做了一个医生所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情，说了一句实话，就遭到如此批斗，还有什么公道和正义可言呢？人呀人呀，为什么如此？相煎何急？无疑，这还是老毛那个阶级斗争的理论所造成的恶果。正如一位老干部李普在 2006 年 8 月 5 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卡仲耘逝世 40 周年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说：这笔账不算在毛泽东头上，算在谁头上？多少皇帝，没有出现这种事，为什么到你毛泽东领导的时候就出现这个事呢？不算在你头上算在谁头上？

经过这次批斗以后，这个姓黄的见了我就好像仇人一样，用眼睛瞪着我。人和人的关系闹到这个地步，真是可叹，亦复可悲！

到了 6 月的某一天，是大礼拜（在劳改农场里，无所谓星期、礼拜，从来就没有休息日。只有到了农活干得差不多了时候，才允许休息一天或半天，是为大礼拜。），下午 3 点开饭，小米饭、

牛肉炒洋葱。这样的伙食也是来农场才第一次见到过。但是我没有一点食欲，一口都没动。

犯人犯人，对于饭最亲，“爹亲娘亲不如饭亲”。到了连饭都不感兴趣时，那就离死亡不远了，至少是命悬一线！

他们可能也预感到这一点。经过请示管教，把我那份饭菜均分给本小组的 10 多个人。饭后，记录员（也是犯人，但却是管教在监舍里的唯一代表，所以有事必须先请示他，他可以当半个家）爬到上铺看我（这也是他第一次这样客气地对我），并且问我：你想吃点什么？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勉强地摇摇头（我还是在想：如果有些藕粉吃多好啊，回忆小时候闹病时，父母经常给我冲这样的美味吃，但是目前根本就是幻想）。虽然如此，我还是感到一丝希望，希望他能够如实的汇报给管教。

谢天谢地！第二天出工时，这位记录员叫我站出来，并且说：回去吧，不要出工了。以后你吃过早饭就去卫生所看病，打针。回来后想睡觉就睡，不想睡了，愿意干点活就咯刺（用小刀削）秫秸（高粱杆），数量不计。吃饭时能吃多少就打多少，但不许多要吃不了再给别人。懂吗？我当然频频点头称是。

从这以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按照记录员的吩咐，每天按时起床，但是不出工。早饭过后去卫生所打针。在打针时，那位护士非常同情我，他给我打了一支葡萄糖，里面加了一支 vb12，并且告诉我：对别人别说这个，只说是打葡萄糖。因为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能够活着出去。第二次我就问他贵姓？他拒绝回答“别问这个，你好好保重就是了。”奇怪了，从我走进监狱的大门那一天起，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好心人。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真是“天不灭曹”，给我一个活命的机会？

到了这个时候，我每顿饭只能吃一小块窝窝头，半碗汤菜。走路如随风摆柳，一步三摇。别人看了，都在背地里预测：“活不过秋天”。据说“女怕戴花，男怕穿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女人就怕肿头，而男人则怕肿腿、肿脚。而我恰恰就是这样：肚脐以上骨瘦如柴，以下则浮肿，大腿和脚肿得好像馒头，一按一个坑，医生称之为“消瘦性浮肿”。按照“男怕穿靴”的说法，我是必死无疑了。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到了就业队里遇见在这里共同改造的犯人，都十分惊讶：你还没有……，下面的话被咽回去了，不用说我也明白。看来，我之所以没有死，完全是出于偶然因素。按照必然性来说，是不可能活着出来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同时在这里改造的几个难友，论身体条件都比我好得多，论改造表现也都比我强，没有受到像我那样多的批斗，可是都先后死在里面。例如李文，唐山铁道学院学生，高度近视，为此经常闹出许多笑话。身体是上等的，劳动表现也属于上游犯人。在我离开那里以后不久，据说头天晚上开会批斗他，第二天早晨叫他起床，却没有动静，掀开被子一看，已经咽气了。再如李书义，和我相处得也很好。在我离开那里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一病不起。像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的犯人还有许多，因为我不太熟悉，难以尽述。苍天呀！这哪里是改造人？分明是摧残人、把好好的活人硬是折磨至死！这是谁之罪？

恶毒攻击罪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只要熬过4个多月，我就可以活着出去了。没想到又有了变化：从这个分场调出一部分犯人转到八分场去。俗话说：好孩子没有往庙上舍的。往外调都是些劳动最差的，或调皮捣蛋的，其中当然有我。

转移到八分场以后，由于我的体力太差，况且又快要到期了，分派我做“看灯的”。什么叫“看灯”？就是打更的（更字念“精”音）。

那么，打更的为什么又称呼为“看灯”的？据说这里还有一段由来：很早以前，没有电灯，只用油灯。晚上有时候刮大风，把油灯吹灭了怎么办？岂不是混乱了吗？所以需要派一个犯人专门看守这个油灯，以免被吹灭。后来用上电灯，但“看灯”的名称仍然沿袭下来。其实，就是负责做杂务的，也叫后勤。当大家都出工以后，清扫宿舍，准备热水，供应大家回来喝和洗。可是我的体力已经无法挑水，只能够扫扫地而已，所以还要另派一个人替我挑水。这个人就是剃头的，兼挑水。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晚上，不能睡觉，应该坐在门口，一来防止逃跑，二来等待时间到了，招呼大家起床。

这个工作本来是最好的美差，不用费力，也不必劳动。这样下去，我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活着出去。可是我当时的体力太差，整天昏昏沉沉的，到了晚上更是哈欠不止，难免打瞌睡。有一次，竟然被巡逻的发现，报告到值班的看守，把我训斥了一顿。后来干脆把我撤了，让我转入病号室。对于病号，首先是减少粮食定量。所以除非特别重的疾病，一般的病人都不愿意加入到这个行

列里来。但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只需要很少一点食物就可以“苟延残喘”了。

在病号室，又由于腿部被刮破了一个小小口子，由于当地没有起码的医药条件，以至于逐渐扩大，形成溃烂，最后疮口的直径达到5-6公分。那正是夏天，可能在午睡时，不注意，苍蝇飞来产卵，因而出现了许多蛆虫。看到它们在我的伤口爬行，心里恶心死了。偶尔发下来一点盐，本来是作为拌黄瓜、当作晚饭的菜用的，我却用来化成水，忍着疼痛，硬是一点一点地清洗并消毒伤口。就这样挺下去，最后，不能不影响到行动，走路时一瘸一瘸的。

到了秋天，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管教下令：不管什么病，一律出工劳动，这样不得不跟随着也出工。到了工地，我去向带队的吴队长请假。他问：你那个伤口有多大呀？本来我用手比画一下也就可以了，或者说有多大，也行。可是鬼使神差，我竟然用手指向他胸前那个大像章，并且说：有那么大。这个带队的吴队长本来是工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没听出什么问题，可是稍远处有个张管教却听出问题来了。他马上走过来说：你再说一句！我自知失言了，立即自责说：我错了。他还不依不饶，伸手就是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接着又是一脚踢到我的背部，再以后就不省人事了。怎么回到监舍里的，一概不清楚。当我恢复神志时，已经被关押在小号里，而且戴着背铐。什么叫背铐？就是用手铐把犯人的双手分别从上和从下两个方向扭转到身后再铐上，这个刑罚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秦琼背剑”。在如此酷刑下，谁也动弹不得，只有等死。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种酷刑，这个人一定不得好死！

后来又有人向我打听什么叫“秦琼背剑”？我就让他自己亲自体验一下：把他的左手从腰部反拧到背后，再把他的右手从肩部反拧到后面，这样一来，两只手仍然有相当的距离，无法靠近，

再用手铐把双手铐住。如果读了这样的介绍还不清楚，读者朋友们不妨自己亲自演习一下，到底是什么滋味。

请看看：毛泽东时代是如何折磨人的？

当全世界的科学家、思想家都在研究如何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更体面、更完美的時候，在中国却有这样的“人”，竟然在研究如何折磨人、摧残人。马克思说过：“专政制度的特点就是轻视人，糟践人，使别人不成其为人。”说得太对了。

事情已经过去 30 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段惨痛的历史，心情仍然不能平静，气愤填膺、怒火满腔，气得我的手直哆嗦，无法再打字。只好暂时中断写作，冷静下来才再度开始。

* * *

在小号里，昏昏沉沉地，只有一息尚存而已，也不知道白天还是夜晚。一直等到有人来给我打开铐子，才看清楚外面已是黑夜了。除了早饭，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吃过任何食物，顿时感到又饿又痛，想当初，那真是生不如死，而且求死不得啊！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天，才有所恢复，才可以考虑今后的问题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了。10 多天以后，再次召开犯人大會，批斗我的“恶毒攻击罪”。为了显示威严，在会场上，他们再度给我戴上了背铐。可气的是，有人为了表现积极，竟然丧尽天良地用手去提起那手铐，并且不断地抖动。这个时候，早已被手铐磨烂了的双手的腕部锥心似的痛。

如此者三。又过了一个多月，终于放我出来劳动。这个时候，我还能做什么呢？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完全变了形，弯腰、驼背，步履蹒跚。虽然我只有 38 岁，却如同 83 岁的龙钟老人。

据我自己的估计，恐怕要加刑。如果加，至少是 5 年。这 5 年能不能安全度过，活着出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展望前程，

茫茫无序！

真应了那句古语：“天无绝人之路”，还有一句话，“吉人天相”。不久，八分场解散，犯人们又一次转移，我被转移到5分场。到了5分场，情况有些变化：管教对我谈话也比较温和，从不提起加刑的事情，劳动也是轻劳动。更主要的是这里有卫生所，可以每天去上药，我腿部的伤口日见好转。这样我的体力也有所恢复，劳动的力气自然略微增加了。

正当我仔细盘算着，如何度过加刑5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为我开脱。这时，“文革”已近尾声，人们的头脑不再发热，普遍开始降温。尤其要感谢的是一位姓刘的干事，他们原来是吉林省农业大学毕业的，下放到当地劳改队工作，正好他负责整理我的材料。他对我的问题做了另外的解释：一种可能是恶毒攻击，另外也有可能是病痛所造成的神智错乱，说错了话。于是在延期关压5个多月以后，于1971年4月6日按照“宽大处理”的精神，获得释放。但是仍然带“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留场就业。

从1957年11月2日到1971年4月6日，我艰难地度过了13年零5个月又4天（也就是从25岁到39岁，正是人生过程中的黄金时代）。但是和其他的右派比较起来，应该承认我还算幸运的。因为我毕竟活着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而且亲眼看到了此后20多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变化。而有许多难友，包括非常出色、非常有才华的朋友却没有看到这一天，他们过早地离开人世，含恨而终，这些人真是死不瞑目啊！

后来我打听到，当时负责处理我案件的那位刘干事叫刘荣宽。70年代末期，我回到母校——吉林大学办理“改正”手续时，特地打电话给他，问他需要什么书籍？他提出：如果方便的话，希望得到几本法律方面的书籍。这个要求我当时就满足了他。再

后来，他也调来省公安厅工作。我特地去拜访过他，一来表示感谢；二来希望我能够为他做点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可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报答的机会。前不久，听说他竟然过早地去世了，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啊！可惜呀！请世人永远记住这位好人的名字：刘荣宽。

“马车副司机”生涯

1971年4月6日晚上召开全体犯人大会。在会上除了其他几个案例以外，就轮到我了。管教科长宣布：“反革命犯胡显中在超期服刑期间，表现较好；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劳动。因此，免于起诉加刑，从宽处理，予以释放；戴反革命帽子，留场就业，监督劳动。”在此之前，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是不是会加刑。听到这样的宣告，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下地，总算能够活着出去了。随即由管教干部带领到监舍收拾行李，走出监狱的大门，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当时正值早春天气，早春的夜晚，这空气太令人陶醉了。

当我迈进就业分子们所住的宿舍时，高兴的心情立刻一扫而光。这是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房子，对面炕，人挨着人，住着20多个人。人均占有面积也就是一个多平方米吧。而且按照惯例，后来者当然睡在最不好的位置；以后随着人员的流动再逐步换到比较好的位置（就像刚进看守所时睡在最靠近厕所或马桶的地方一样）。当时给我预留的就是烟筒下大约60公分宽的地方，东北地区的4月分，还在烧炕取暖，从烟筒缝隙滴下来的液体要用小瓶接住，经常倒脏水的事情当然就落在我的头上。后来我还知道，我的左邻是一个老病号，晚上经常咳嗽、吐痰，会不会有传染性？没有人回答，也回答不了。可是，再转过头来一想，毕竟比监狱里犯人所占的面积要略微大一点。如此想来也就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了。

因此，这一夜，我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组长借给我10元饭票，让我去食堂吃饭。13年来，这是第一次走进食堂，可以

任意选购饭菜。不过，饭菜的品种也就是那么几样：小米粥、窝窝头、咸菜……，可以自主选择的仅仅是数量的多少而已。刚吃完饭，就被分配劳动：跟车。什么叫“跟车”？

在农场里，马车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然，还有汽车和拖拉机等，但是那仅仅是用于重要人物和重要任务上。驾御马车的叫车夫，文明一点的，就叫“御手”。车夫又叫“赶车的”，好听一点的，叫“车老板”。车夫需要一个助手，就是“跟车的”。具体的任务是：首先是协助“车老板”套车（四匹马当中，车老板牵辕马和里套，所谓“里套”就是最左边那匹马，它的重要性仅次于辕马，因为全靠它听从口令、决定前进的方向。），而“跟车的”则应该牵“中套”和“外套”。所谓“外套”并非我们所穿的外衣，而是最外面那匹马。它的重要性仅仅次于“里套”。把马牵过来，如果熟练的就可以自己套，但是新手就只好等着“老板”来套了。套好了车出发时二人的座位也有规定：“老板”应该坐在车的左前方。这个地方最便于观察并驾御四匹马，使它们的动作协调。而“跟车的”则坐在车的右后方。这个位置也是有讲究的：一来可以很容易地跳下车来处理突发事件，如果马“毛”了（“毛”就是因为马受了惊吓而狂奔，发生了这个情况，后果非常可怕，也许车毁人亡。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也要受伤；车当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也可以最快地跳下来，避免受伤。其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右方观察“外套”行走是否正常。往往有一种情况：外面的缰绳弄到外套马的右后腿里面，这样走下去，时间久了，马腿必然被绳索磨破。这可是一个说小也小，说大也可以大的事故。所以，“跟车的”的任务之一就是及时发现，及时把缰绳调整到马腿的外面。当然，“跟车的”座位并不是固定的，尤其是在负载的时候，由于前后轻重不同，需要用“跟车的”这100多斤分量来达到平衡，比如，如果整车的重量太过靠后了，车老板就会要求“跟车的”往前一点坐，以便

实现平衡。但是，不管在前在后，原则上“跟车的”总是坐在车的右侧。

从这一天开始，我就从事“跟车的”劳动。为了取乐，我戏称为“马车副司机”。“马车副司机”是我出狱以后所得到的第一个劳动岗位。既然是副司机，首先就是应该和上级、“马车正司机”即“车老板”搞好关系。有一次，在装柴禾（就是地里的庄稼秸秆，在农场这些东西都成了能源，可以烧火取暖、烹饪。）的时候，一位姓兰的老板对我吐露了心声。他说：我可以让你多干一小时，也可以让你少干一个小时，成果都一样。他说的是实话。技术就在于如何装这个车，是实实在在地装？还是表面上虚抛地装？两者可以相差半车柴禾。

其次，就是要不断地学习。有许多东西应该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例如：马脖子上套着的东西叫什么？叫套包，作用是避免磨坏了马脖子。套包前面的，叫“夹板”，就是夹住马脖子，让它乖乖地向前拉……。总之，马的身上足足有 20 多样东西，都有特定的名称。当我一样一样地问车老板时，他惊讶地看着我，还奇怪地问我：难道你是外国人吗？在他看来，凡是中国人就应该都知道这些东西的名称。

还有一个学问就是如何发令：驾！就是命令它前进；御！就是命令它停止。看起来，所谓“驾御”就是命令马前进或停止的口令，或者说是本领或技术。后来扩大运用范围，对于处理或摆平一切事情，都可以用“驾御”二字来概括了。还有，向左转，叫“我、我、我”；向右转叫什么来着？啊，想起来了，叫“悦！悦！悦！”

在劳改农场里，就业分子的生命价值几何？有这么一次事故可以说明问题。有一次，我们的马“毛”了。因为是牲口，它的性格和脾气很难琢磨。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看见了什么异常的东西，就会突然狂奔起来。这次也是如此，马从庄稼地里一路狂奔，

这个时候可难为了“车老板”。他必须紧紧跟随着跑，以免发生更难以预测的后果（比如撞伤了干部或其他重要的人等）。可是，两条腿的人如何能够跑过四条腿的马？况且它还是正在劲头上，谁能够跑得过它？我作为跟车的，只要跟着跑就可以了，至于跑到什么地方，实在无法要求了。那一次，马拖着车子一直跑了半个多小时，大概马也跑累了，才气喘嘘嘘地停了下来。幸亏没有跑进场部，如果跑进了场部，后果不堪设想。事后管教干部来了，问清楚事情经过，最后还问道：马有没有受伤？回答说没有。干部说：这就好，就可以放心了。说罢，扬长而去。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工人有没有受伤的？

几十年后，我读了《论语》。读到“乡党”一章里如下的对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说明在孔子的心目中，最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这才是拿人当人看待，关心人、爱人，这也是孔子学说“仁”的核心价值所在。读到这里，忽然掩卷沉思：当年在农场里，管教干部却相反，只问马，不问人。在他的心目中，马是和其他生产工具一样的有价值的，而作为“就业分子”来说，却没有价值。是伤是死，都无所谓。这就如马克思所说的：“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在我几年当“马车副司机”的经历中，所见所闻，有许多“就业分子”受伤以后，其痛苦无以复加。有一个人的鼻子被马踢了，鼻子严重塌陷，很难看。还有一个，差一点就被掀掉了天灵盖，算他命大。再说我自己吧！被马踢断了肋骨，至今胸部的透视片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得出阴影；还有一回被马踩伤了脚趾，鲜血直流，在宿舍里休息几天，竟然不给工伤待遇，不发工资。理由是：为什么它不踩别人呢？这样说，真是毫无人性。可是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这一切都是十分合理的。老毛不是教导过吗？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然这是对别人的要求，

而老毛自己倒是非常怕死的。要不然，1971年秋天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和林彪玩“捉迷藏”的游戏呢？忽而杭州，忽而上海，忽而又一路回北京？又据说，当他临终时还问医生：我还有没有救了？可见老毛本人是多么怕死！但却要求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跟车的”这种劳动的特点是：装装、卸卸，除了装和卸以外，就是坐在车后，随着车“旅游”。因而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我首先观察、研究我的上级——车老板。我曾经和好几位车老板共同劳动过。在比较中发现：他们各有所长。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爱护马。据说“马通人性”你对它好，它自然也就对你好。还有就是驾御马的方法，也各有千秋。有的车老板本事高强，大鞭一甩，劈啪作响，再看那几匹马，齐刷刷竖起耳朵，听候号令。只要他一声“驾”又是齐刷刷地齐步走。听声音也真是好极了！按照当地的说法，这就叫“抖了齐了”，就是能够把四匹马训练得“令行禁止”。这就是好老板。而有的人却不是这样，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四匹马调理明白，这就不算合格的车老板。我还记得，有个姓李的车老板年轻气盛，性子急，有一回不知道怎么搞的，马就是不听他的口令。用鞭子打也不解决问题（鞭子只能打它的身体，而不允许打头部，以免打伤马眼睛。对于马和所有动物来说，眼睛都是最宝贵的，据说打瞎一只眼睛，损失500元，按照当时我们的工资，大约需要10多个月才能赚来这500元。而仅仅打身上，有厚厚的马皮保护，基本上不构成什么伤痛。）情急之下，他拿出最后也是最狠毒的手段来：用铁制的马嚼子从里套马的吻部勒进去，再使劲地拉紧嚼子。这一招真狠，也真灵，马被制服了，但是满口淌血。我顿时感到太残忍了，便替马讲情起来，说：算了吧，它已经服了。这才罢手。事后，收工的时候，饲养员发现马口中带血，找到他，他不得不承认用嚼子的事情。当管教知道以后，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且宣

布停止劳动反省。

由御马进而想到“御人”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能够驾御几十个人，就可以担任什么组长，如果你能够驾御几万人，当然就可以当县长了。能够驾御几百万人，无疑就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或总统了。于是，我得出结论：什么叫政治？无非就是“御人术”，驾御人的本领或诀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或者说是一个长期被豪言壮语、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所掩盖的秘密！

当我重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研究起政治来。什么叫政治？老毛经常引用列宁的话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又附带地引用同一个列宁的话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长期以来，人习惯于只会鹦鹉学舌，千百遍地重复以上两段语录。却没有人仔细分辨一下：这两句语录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那么，在还没有产生阶级或者已经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应该没有政治了。而按照后面那句话，只要有人类，就应该有经济活动，也就会有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难道这不是矛盾所在吗？当然，与后一个定义相印证的还有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的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人民大众的事情，管理人民大众的事就是政治。如果说“阶级斗争”的定义太狭窄，那么，孙先生的这个定义似乎又太宽泛了。人民大众的事情多得很，例如公共食堂、大众浴池……岂不是都成了政治？这些人难道都成了政治家了？

最后，请看马克思是如何说的吧：“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人作为基础的科学。”这就对了！政治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如何驾御人的学问，也就是驾御人的诀窍。为了印证这个定义的准确性，我们还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根据。根据大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的言论编辑而成的《管子》一书里就有许多这样

的议论。其第一篇的篇名就叫“牧民”，内容就是如何驾御老百姓的学问。如“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好恶。”在这里，作者把驾御、引导、号召人民的最佳办法说得非常清楚。在《管子》的另一篇“权修”里，作者又说：“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到了汉代，地方官被称为“州牧”（例如《三国演义》里的刘邦就曾经做过豫州牧，还兼领徐州牧），老百姓就像牛、马一样地被长官“牧”，即管理着。可见所谓政治，说得露骨一点，其实就是如何驾御老百姓的学问。如此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秘的。神秘的外衣是政治家们为了欺骗人民而故意罩上去的障眼法。

明白了政治的本质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需要什么手段来驾御老百姓呢？先来看看驾御马需要什么手段。大概而言不外两大类：其一是夹板、套包、笼头、缰绳……其作用在于引导马按照御手的意图或奔驰、或负重、或拉车，或进或退，或左或右，或快或慢。如果马不听这些呢？还有另外一类，就是鞭子。鞭子握在御手的手里，不时在空中摇晃，还时不时地打个响“啪！啪！”清脆的声音实在好听，但是在马听来恐怕更多的是感到威胁、警告。如果不听命令，往往抽几下，就算是小小的惩罚吧。如果鞭子还不起作用，那还有最后一手，就是使用嚼子。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再烈性的马，经得起鞭子抽，但却经不起嚼子勒，御手勒几下，马就不得不老实了。总而言之，不外这两手：软的和硬的。同样的道理，驾御人也不外这两手。列宁说：“政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国家政权机构”。这套政权机构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教育、文化、规章制度。其作用是规范人民的行为举止。如果这些手段不起作用，那还有另外一套：监狱、法庭、军队……，总的来看，也就是两手：软的和硬的，不管政治家如何巧舌如簧，巧立名目，都不过是这两种手段的交替使用。老毛就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也是这两套手段吗？而最早把

这一切坦率地表露出来的，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他写道：“无捶策之威、衔辔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他的意思是：没有过硬的手段，再高明的御手也无法驾驭御马，同样，再高明的政治家也无法统治老百姓。

今天，我能够成为 2000 多年前大思想家韩非的同调，总算没有白蹲 10 多年的监狱。

在这几年“跟车的”劳动中，接触过许多“车老板”。他们性情各异，本领参差不齐，他们的名字大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个姓杨的老板却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他原来是生产队长，劳动是把好手。可就是嘴里喜欢说三道四，总好和大队书记顶着来。比如：当干部讨论 60 年生产计划时提出社员的收入要使分值达到 7 角或 8 角钱，他却下面说怪话：“七角七、八角一，干部吹牛皮。”干部讨论如何实现《纲要》的目标时，他又说：“赶长江、跨黄河，干部吹牛当唱歌……”如此等等，起先是生产队长被撤职，最后则戴上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送进了监狱。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不管你思想上怎么想，千万不能说反对的话，不能挡人家的道、不能唱反调。所以，在就业队里，他经常是这样：“嘿，嘿，嘿……”。平时他对人都是敬而远之，只是看到我是个读书人，还算老实，就对我敞开心怀，说起自己的经历和人生教训，并且告诫我：“千万不能唱反调！”

偷看机密文件

在就业期间发生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书。

现在的中、青年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就业”二字，大都心向往之；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在当地，“就业”是一种非常卑贱的身分。从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的口里，从当地的老乡的口里，用鄙夷的神态和不屑的口吻说“就业的”，就是指我们这些人。还有称呼“二劳改”者，即只比劳改犯好那么一点点，类似印度的“不可接触者”（即四个种姓之外的贱民）；还有一次，有个很幽默的小伙子自称是“就业犯”，这个名词非常切贴：表面看是就业了，实际上还是“犯”。应该承认：“就业犯”是个最经典的称呼，比其他称呼都更恰当。

虽然别人这样看待我们，但是我们也有一种自得其乐的办法，那就是把“就业”二字的音调改变一下，变成了“舅爷”，比你们大两辈，多么合算？看来这完全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是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一点“阿Q”精神，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

这年的秋天，也就是当“马车副司机”几个月后，我被调去参加总场修水利工程的劳动，因为工地比较远，中午不能回来吃饭，就在附近一个变电站搭伙。中午饭后有一段短时间休息，如果天气好，就在外面晒太阳；如果天气不好，就在室内随便休息。有这么一天，在室内休息的时候，忽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分《参考消息》，也顾不得一上午的疲劳，更不管下午还有繁重的劳动任务，尤其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就业的”，竟然把报纸拿起来看，只看了一小会儿（什么内容早忘记了），就开始劳动。我根本就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可有人注意到了，并且放在心上，

及时汇报到管教干部的耳朵里。到了晚上，管教干部要我检讨：为什么要去偷看“机密文件”？知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偷看的目的是又是什么？是不是想要窃取情报？……我断然否认。结果越说越僵，最后被责令反省，晚上开大会批斗我的违纪行为，也就是反改造的罪行。他严厉地对我说：“你以为释放了就可以无法无天，就可以目无法纪了。告诉你，不要忘记：头上还戴着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

晚上的批斗会气氛十分紧张，发言的大都无限上纲：“你是想从报纸上知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什么时候来进攻，你好及时配合，来一个里应外合。对吧？”“你在窥测方向，想要寻找突破点，颠覆政府。……”总之，如果他们所说的“罪行”能够成立，完全可以把枪毙一百次。当然，我自己的心中还是有数的，再怎么上纲上线，也做不出什么大文章，不过是给我一点颜色看看而已。就这样双方僵持着，最后只好宣布：停止劳动反省。

这一招还真厉害，也确实太损了。虽然我自己知道问题不大，但是，我们是实行日工资制，按实际劳动的天数领取报酬，停止劳动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三天两天问题不大，如果十天半个月，那么下个月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问题了。我不得不自己找一个下台阶的办法。怎么下台阶？总不能承认他们所说的那些“罪行”吧？。苦思冥想，忽然灵机一动，有了！

第二天，我向管教干部交代：我的真实目的是想看一看林副统帅的身体是不是还健康，因为很久没有看到林副统帅的消息了，我非常关心他，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的最亲密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不等我说完，这位干部大声喝令，住嘴！不许再说了。并且叮嘱：对这个问题，以后也不许乱说，“乱说了要扒你的皮，听到没有？”我只能点头称是。最后他丢下一句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话：“算了，明天出工吧！”

当时我的确不知道更多的情况，只是从广播新闻中，猜出了

一点什么，至少是全国人民每天都要祝福他永远健康的那位接班人身体不太健康了，是不是政治上失宠了？或者生病了？绝对没有想到其他方面。当时只不过是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以求得有个台阶下而已。

大约几个月之后，“上面”指令收缴所有“林副统帅”的画像、签名，不许保留。事情就进一步明朗化了。又过了不久，有一位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可教子弟”（也就是“就业的”的子女。据说，毛泽东说过：他们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所以简称“可教子弟”。）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即他们刚刚听了传达文件，内容就是关于 9.13 事件。介绍完毕之后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许告诉任何人。又过了几天，另一位也是就业的，告诉了我同样的秘密消息。事情至此，真相大白了。回想起来，当时我是无意中触到了一个在当时还是绝对的秘密，也就触及了对方的软肋，可以说是“歪打正着”，躲过了一场灾难吧！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同样是就业的，为什么那位能够去听文件传达，而我却不能呢？区别就在于：他是没戴帽的，称为农业工人，简称“农工”；而我是戴帽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公民权，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听传达的文件。在就业队里，大家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在同一个宿舍睡觉，同样的劳动，但是待遇就有所区别：在经济上，他们的报酬要略高于我们，每天多 2~3 毛钱，一个月下来就要多 4-6 元。这些钱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当时我们微薄的收入中却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生活方面，他们每个月的细粮票是 20 斤，而我们是 10 斤。此外在政治待遇方面，有些会议只允许他们参加。……有了这许多区别对待，所以，争取“摘帽”也是许多人积极劳动的一个内在动力。当然为了摘帽，不能仅仅靠积极劳动，更重要的是要经常打小报告，也就是告密。把那些不利于改造、不好好劳动的人和事及时报告给管教，表示忠于政府。这种小人历朝历代都有，但是都为人所不齿。只有到

了中共统治下，才成为一个最光辉的行当、最吃香的专业。因为共产党更需要这种人，为他扫清道路，排除异己分子。

我们在就业队不仅政治上受歧视，在经济上还要受剥削。受谁的剥削？举几个例子：每个农场都有两个食堂：干部吃的小食堂，就业分子就餐的大食堂。每当小食堂杀猪发现是痘猪，就说：“给大食堂送去。”回忆起来，那些年我吃了多少痘猪肉？无法统计。那么，为什么我没有得什么有关的病症？这真是天老爷保佑。可如果大食堂杀猪，就要把猪肝、猪心、猪腰、里脊、后道等等好的部位送到小食堂，供干部们享用（如何计价，不得而知）。再例如：冬天派车去水库拉鱼，鱼运到了，最先由小食堂上去挑选，其次是干部家属，再其次是就业的家属，又其次则是大食堂，最后送到犯人的大厨房。如此顺序下来，就业的和犯人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鱼，就可想而知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价格竟然一样，而不是优质优价。还有：总场有电影放映员，经常到各个分场来放电影。哪个分场招待得好，就多去几次；招待不好则相反，不去或少去。因此每到一个分场，都要争相招待。那么，在哪里招待呢？放完了电影，干部食堂早下班了。那就只有到我们大食堂了，有的时候还有几个干部陪同。这样3-5个人，一顿吃喝，完了把嘴一抹走人，这个花费当然打进我们的伙食成本里，我们的菜饭价格能不高吗？

80年代末期，我认识了一位在同一栋楼房办公的、省统计局的一位处长，姓潘。他当年就在那个地方工作。当然，他是干部，而我是“就业犯”。“我们两个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台词），当然，现在是同事，相处得还不错，经常在一起谈心。谈起那里的几个干部都非常清楚。我们“就业犯”的顶头上司叫刘敬彬，是个胖子。他管我们，却经常在我们的食堂里招待朋友，当然也是吃完把嘴一抹就走人的那种。难怪我们的伙食那么贵，原来，我们的血汗钱都被干部吸去了一大半。

劳改犯滚回去！

从粮库到油坊

在修水利的工地上干了几个月，冬天来临。户外作业无法进行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又被分配到各个小单位。最初被派到粮库，他们看我是个高个子，以为扛麻袋没问题。

第二天就发生了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大家出工干活，什么活？就是扛麻袋。他们没想到，我竟然拒绝，理由竟然是“扛不动”！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健康人竟然会扛不动麻袋！要知道：一袋大米大约 200 斤。我的天！我的身体重量是多少？充其量也不过 120 斤左右吧。能扛超过自己体重的人，应该算个大力士了吧？可是他们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个重量一般人都可以扛得起，偏偏我不扛，这是个抗拒改造的问题，简直就是罢工！所以，仓库的于保管员把我找去谈话：你这么高的个，为什么就扛不动麻袋呢？我说：扛不动就是扛不动，难道还需要说出个什么理由吗？由于没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他一听就火了，并且开始骂娘“我——我——操你妈！你给老子干不干？”

如果是在几年以前，刚刚出狱的时候，外面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也许我会选择忍气吞声，但是现在不行了。出来好几年了，对于社会上的事情也多少知道一些。我不能忍受这个野蛮分子的侮辱，但是又不好用同样的骂来回击，想了片刻之后，终于开口了：保管员，你这样骂人，是不是有失干部身份？你不觉得自己掉价吗？

竟然有人敢于顶撞他，更来气了。“我……我还要打你，怎么样？”说着便举起手来。我一看这个家伙来势凶猛，转头就往外跑，一直跑到主任的办公室里，也忘记了喊什么报告了。

主任姓何，多少还懂一点政策。他问清楚事情的经过以后，就说：这样吧，你先回去，以后再说。

以后也没有“再说”，只是不再让我扛什么麻袋了，有人通知我到油坊去上班。后来还遇见过那个姓于的胖子，我扭过头去不理他，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到了油坊又是另一番景象。这是总场唯一的半机械化生产单位。所谓半机械化，另一半还得靠人工作业——还是需要扛麻袋，而且扛的不是大米，而是黄豆，比大米要沉得多啊！不过他们不再要求我来扛，而是分配我做后勤工作：比别人早一点来到车间里，把几个火炉一一点着，让车间里的温度升上来。下班以后，比别人晚走一会儿，要做好所有的清扫工作。早来晚走，没问题。没有付出就换不来人家的让步不是？

8点，大家陆续进来，室内的空气已经逐渐暖和起来。他们更衣、扛麻袋，要把今天所需的黄豆从库房全部扛到里面的碾压室，经过机器碾压，成扁形的豆粕，再加热以后，经过压榨，豆油就这样流出来，通过地槽流到大桶里。

一天进行两“榨”，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上榨和出榨，需要大家一起动手。上榨时，大家把已经加热的豆粕赶快运到机器上来，然后开榨。出榨时大家把已经被榨尽了油的豆饼迅速搬运到外面。搬运豆饼时，每人最多可以搬5、6块，而我只能搬得动3、4块，还觉得相当吃力，累得很。带班的王师傅也是就业的，不过有家，而且是正式的“农工”（不戴“帽子”）对我还算客气。他说：慢慢来，时间长了就练出来了。我开始也搬不了5、6块。这位年龄比我大得多的长者，令我很敬重。

除了这两次紧张劳动以外，其余时间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只

是巡视巡视，看看机器运行是否正常，再有就是随时清扫地面，把一些杂物扫掉，以免混入豆油里面去。在劳动的时候，我们都是赤裸裸地只穿内裤。身上的汗水、毛发难免掉在地上、机器上……这样的豆油还能吃吗？能！因为全部产品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沉淀下来的东西叫做“油渣子”，是上好的肥料。还有，如果天气不好，炉子不好烧，来一勺“油渣子”，那火就立刻旺起来了。

外面已经是零下 20 多度，而我必须外出挑煤（用于烧炉子）、倒炉灰，所以给我准备了一件破大衣。在上班期间，我是唯一可以外出的人。由于整天见不着太阳，时间长了容易得病。这一点我很清楚，因此经常利用外出的机会，多待一会儿。面对阳光站这么几分钟，一天来两次，也就足够了。还有个好处：由于遗传的关系，我经常手足皴裂。每到秋、冬季节，总要预备橡皮膏，随时贴用。但是这个冬天却不需要，这一冬皮肤特别细润，手和脚都光滑如婴儿一般。原因很简单：由于整天泡在豆油里嘛！

如此作业，当然需要洗澡。车间内部就有个小澡堂。每天由我负责供应热水（通过锅炉房输送过来的热量），大家洗过以后，我还要清扫干净，总之就是打杂劳动。

到金宝屯去

在油坊里只干了几个月，又要走了。这回是调出镇赉县，调到四平市附近的金宝屯农场。这个农场原来是知识青年下放劳动的一个点。不知道当局出于什么考虑，打算把知识青年撤出去，换成就业的。据说，在干部们的心目中，就业的“好摆弄”（东北话就是说：非常听话，驯服，便于管理。），而知识青年却浑身长刺，不好“摆弄”。是不是这个原因，不能肯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关于我们这些就业的，的确听话，干部

说什么就是什么，叫干啥，就干啥，没有异议，也不敢讨价还价，不敢说个不字。相反，知识青年本身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犯过罪，和干部们同样属于“人民内部”；既然是这样，凭什么你叫我们如何，就得听你们的？另外，叫知识青年干活，干部往往也要一起干，甚至要求带头。而对于就业的，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干部完全可以在一边自在地当“观潮派”，不必“同劳动”。所以，从干部的角度来看问题，当然是愿意接受我们这些人。

当我们到了金宝屯农场一看，却也感到比较满意。为什么？干部原来是领导知识青年的，习惯于和和气气地说话、办事也习惯于商量着办。因此，习惯成自然，对于我们也大多如此。而在镇赉可不一样。因为干部们原来就是管理犯人的，习惯于训斥、指令、批评那一套。态度骄横，颐指气使，动不动就大声吆喝，像赶牲口一样。在他们的心目中，就业的和劳改犯人差不多。

几年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所谓的“兄弟国家”在翻脸以后的论战中，不是批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就是农奴制度吗？这个批评完全符合实际，现实正是这样。在这些现代农奴主们的管理下，我们这些现代农奴们个个都是必恭必敬，唯唯诺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哪里还像个人呢？就是奴隶，或者说是农奴，现代农奴！

到了金宝屯，对于干部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他们对我们也很满意。因为我们这些人干起活来那真是卖力气，比知识青年干得好。干部们有的时候还和我们唠唠家常，颇有点平等相待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工资也和过去知识青年在这里时一样，每天 1.2-1.5 元。这个劳动力价格本来是很低的，但和镇赉比较起来，就多了几角钱。在镇赉，1 等的才每天 1.2 元，3 等的只有 1 元。请算算看：我们在食堂里吃一碗红烧肉要花 7 或 8 角钱，而一天才赚 1 元或 1.2 元，连一天的伙食费都不够啊。另外，在

金宝屯农场的食堂里，由于没有干部们的剥削（在知识青年们面前，哪个干部敢剥削？还不造他的反？），饭菜的价格也相对合理些，我们的伙食支出可以少一点。这样，一算下来，我们的实际收入当然比较高些。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无论从经济上，或者从精神上来说，我们都非常高兴调来金宝屯农场。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世界上人与人本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虽然犯过罪，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是劳改犯了，应该有一点人格和尊严了。

我被分配在总场所在的站（相当于镇赉的分场），下面有 5 个站。由于知识青年留下来的传统吧，我们的劳动也比较轻松，不那么紧张。从春天的播种到夏天的锄地、除虫打药等，我都没有感到什么累。如果在这里呆下去，那可是我们这些人的福气了。

可是好事总难长久。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有各种传说：我们在这里长不了。为什么？因为知识青年们坚决不撤离。在大街上经常有大字报，是知识青年们贴的。下班以后的一大乐趣就是散步街头，看这些大字报。语气的尖锐、态度的坚决、文笔的犀利……都令我大开眼界。这些大字报真是非常好的读物，也可以说是一种业余享受。有些生动的语言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例如：“金宝屯农场是我们知识青年用汗水和鲜血所开创的宝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地，是我们革命青年一代继续干革命的根据地……，谁也别想把我们赶走，我们誓死保卫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能留给那些劳改犯……”。他们把我们称为劳改犯，这不怪他们，我看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觉得可爱、可笑。因为他们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余勇可贾啊！不过最后一句却令我有些不祥的预感。“劳改犯滚回去！”如果他们的要求被接受了的话，我们岂不就要回到那个农奴制度的老窝里去吗？

人心惶惶，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新闻；而且每天的新闻都有新的版本，不断地更新。那里还有心思干活？就这样混了许多日子，

坏消息终于被证实了：明天就要走。

在金宝屯农场生活和劳动了半年时间，给了我许多新的认识。原来，对待我们这些劳改就业犯，也可以是平等式的，不一定需要奴隶主式。其次，工资待遇和伙食标准也是各地不一样的，关键的问题是干部是不是参与其间。如果干部参与其中，必定没有我们的好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都有私心。干部有权，我们没权，两部分人搞到一起，当然是我们吃亏。这样看来，我们不仅要受国家无偿劳动的剥削，还要受干部们的剥削，也就是双重的剥削。

在金宝屯农场的几个月时间，所得到的收获，经济实惠并不是主要的，更大的收获是认识意义。看到了金宝屯农场的管理方法，才知道原来对于劳改犯、就业分子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管理，不一定要像镇赉那样：颐指气使、训斥怒骂、甚至无端打骂。不比不知道，经过比较才可以鉴别，谁个优、谁个劣。

毛泽东一生写了许多文章，说了许多话，大部分的谎言和废话，但是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正确：“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经过比较，如果允许每个就业分子来选择的话，任何人当然都会选择金宝屯。

同理，由于 70 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使每个中国人都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才知道除了中国模式以外，整个世界还有许多不同于中国模式的地方，才知道那些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好，在那些没有所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原子弹的国家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开明、人民幸福的程度更高，更为重要的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饿死几千万老百姓那样的惨剧，也绝对不会发生“文革”式的浩劫。人们的精神面貌当然更为自由、开放。共产党不是经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经过了几十年实践的反复检验和全方位的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比、朝鲜和南韩比、东德和西德比），结论

难道还不清楚吗？可是问题在于，他们敢让人民自由去选择吗？

回到镇赉四方坨子

大概是秋天吧，我们不得不离开金宝屯农场。不过不是“滚回去”，而是乘火车。在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我们每次乘火车，并不是坐在客车车厢里，而是被“装”进一节节“闷罐”里运回来的。什么叫“闷罐”车？就是装载货物，或生猪的车皮。只有车皮，两边有门，可以进出，此外什么设备也没有。我们就是这样，连行李和人都被“闷”在里面，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解决。一个“闷罐”里，要装几十个人，空气之齷浊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我们的待遇。在“闷罐”里，我的思绪似乎回到了16世纪，欧洲人把非洲土著运到美洲去当黑奴时就是用船，把黑奴们装进密不透风的底层，多少非洲同胞就这样被闷死在船舱里，然后抛尸海上。我们也是奴隶，只不过不是黑奴，而是黄色的奴隶而已。

到了六分场，一眼就看到老朋友程远。从长春铁北劳改队一别至此，已经好几年了，真是“他乡遇故知”，也算是美事一桩吧！由于这位老相识，才有了许多方便：知道当地的许多事情和规矩，不至于“犯傻”。即使是这样，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当“马车副司机”。

刚到这里便遇到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放秋垄”。什么叫“放秋垄”？刚开始我也很好奇，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问别人，回答是：马上就到了，你会亲眼看见的。到了秋天，庄稼基本成熟，但是野草也长起来了，为了给明年的除草工作打下一个好基础，先应该把这些野草砍掉。谁来干这个活？犯人。而这时高棵作物已经成熟，都有一人多高，即所谓“青纱帐”。犯人在这样的“青纱帐”里逃跑怎么办？于是，警卫森严，如临大

敌，先把这地块包围起来，距离 20 多米就设一个岗哨：一个中小学生、一个妇女、一个士兵这样轮着排列，互相照应。然后才让犯人进入“青纱帐”干活。每一个妇女都算工分，向劳改队领取报酬；士兵当然没有什么报酬；学生也算是做贡献吧！大热天，当然需要供应水，我所跟的马车就负责给犯人们送水，送到地头，再由犯人自己派人挑进“青纱帐”里。另外还有马车专门给干部和那些妇女、学生们送西瓜和西红柿，免费供应（士兵不吃，他们自备饮水。）。最重要的是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报数”，每名犯人都带有一个代号，报起数来，一个接一个，如果某个数没有人接，就说明那个犯人跑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这块地四面都被包围起来了，你往那里跑？

“放秋垄”以后，紧接着就是秋收了。秋收是个大忙季节，早起晚睡是常态，廉价劳动力还要榨出更多的油来，也就是列宁形象地揭露的“恨不得从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来”。早晨通常是 4 点钟（天还没亮，或刚放亮）就起床，几十分钟时间吃过早饭就套车。从此直到 12 点，7 个多小时；下午 3 点再套车，直到晚上 6—7 点，又是 4 个小时。总计 11 个多小时，工资仅仅有 1.2 元，每小时工资只有 1 毛钱！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中午休息时间除了吃饭，还应该有 2 个多小时，这不是很宽容吗？这样想的人又错了。这不是他们宽容，从他们主观愿望来说，最好是中午不休息，接着干活！大跃进嘛！

可是，马车马车，全靠马拉的车，而马需要吃饭——专门有饲养员喂马。人吃饭只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短，10 分、20 分钟足够了，而马吃饭的时间至少需要 2 个多小时！请想想看，它们那么大的身躯，又要负担那么大的重量，移动那么远的距离。没有足够的食物，就不能摄取足够的热量，怎么能够胜任呢？

刚出狱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给后勤车当副司机时，就做

过喂马的劳动。因为车老板中午去到劳动工地给犯人送饭，回来以后马才能够休息，这个时候已是1点左右了。而饲养员也需要休息，因此我这个“副司机”就提前休息，车老板送饭去，我便休息。等到他回来，我应该在马棚里等候，帮他卸车。然后接着喂马。这里的学问也大着哩！卸车以后，应该先让马在广场里尽情打滚，这是马最好的休息方式。学习这个经验，后来有了条件时，我也学会了在床上来回翻滚，同样觉得很舒服。因此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醒来后、起床前必须来回翻几个滚。看来，“养马比君子”此话有道理。

卸车以后，把马栓上，先提来几大桶水，让它们喝个痛快。（这点又和人不同了。我们吃饭以前，不能大量喝水，以免冲淡胃液）然后才上饭——这里还有讲究：应该先上“草”，吃得差不多了再上“料”。关于其中的道理，我问过老饲养员，得到的回答是这样：这草就好比是窝窝头，料就是红烧肉。如果你先吃红烧肉，吃饱了还能吃得下这个窝窝头吗？所以，必须先给它吃点差的，吃到六七份饱时，它不那么饿时再加料，搅拌均匀后，让它再吃个十分饱。啊！原来如此。所谓“料”就是事先准备好的、切碎并泡软的豆饼和高粱、苞米、谷子之类的粮食。可是，当我把“料”倒进马槽里时，那些可爱的家伙一个个抢着吃这些好东西，因此必须动作快，迅速把好东西搅拌开来，和草混合。它想吃，就必须同时吃下草和料，无法挑拣着吃，这一点又和我们人不一样了。人可以挑好的吃，马却不能。如此这般，时间当然就应该有3个小时左右了。

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劳动时间。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就是所谓“夜战”。通常是吃过晚饭就干，一直干到11点左右收工。然后到食堂去领取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加班饭”。内容是一菜一个馒头，价值是3毛钱。这就是我们劳动力的价格！而指挥我们干的干部则进入伙房的里间，有酒有菜、又吃又喝，然后红

光满面地走出来，边剔牙，边交代明天的劳动任务。那么他的加班费又应该是多少呢？不可能比我们多太多吧？即使按照他的工资比照着算，也不至于超过1元钱吧？他的1元钱可以这样又吃又喝，而我们的3毛钱却只能吃那些东西，这个道理谁能够说得通？归根结底，还是剥削我们这些就业分子嘛！队长是个很胖的家伙，我怀疑：在他那宽大的身躯里，是不是流淌着我们就业分子的血液？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到了冬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拉柴禾，为各家各户准备一冬烧的。柴禾从哪里拉？地里。地里的庄稼拉完了，剩下的就是秸秆了，这些秸秆就是农村全年的能源。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就业的用马车拉回来，送到每一个家庭。当地称为“拉地”，其实不是把地拉回来，只是把地里的秸秆拉回来当柴烧而已。“拉地”也是一项非常累的活，最累的就是我们这些“副司机”即“跟车的”。因为车老板永远是在车上装车（装车也是很有技术的活计，装不好经常会塌下来，而装不够的话，更要被家属们骂：公家的柴禾你为什么不能多装一点呢？在他们看来最好是把全部的秸秆都给他们拉来才满足。），而我这个“跟车的”则必须把每一捆秸秆用铁叉叉起来，再一步一步地走到车前，用力气送上去。每一捆秸秆都比腰还粗，应该有几十斤的分量吧！每车柴禾需要装多少捆？无法计算。在开始装车时，还好办。越到后来，车上已经装得很高时，再要往上送每一捆都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往往装到后半车时，我已经是汗流浹背了（请注意：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季，气温已是零下20多度了。）。更可恼的是，如果下过雪，每捆秸秆上都覆盖着积雪，我用叉一挑，举过头顶，那些积雪就纷纷落在我的头上、衣领里，积雪进入衣领里，马上融化，这个时候背上一阵冰凉！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得过什么感冒，真是奇迹！也许是上苍的保佑吧！

当我累得筋疲力尽时，就希望听到老板一声：绞车！也就是

说，已经装够了，可以用粗绳子把车绞紧，准备往回走了。如果他再踩几个来回，把柴禾踩实些，那我还得再挑几十捆秸杆。因此，就看他是不是发善心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几年前那位姓兰的老板对我说的心理话：我可以让你多干一小时，也可以让你少干一个小时。

再说绞车，也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计。我和老板两个人要配合默契，所用的绳子直径大约有2公分粗，捆结实以后，还要用一种工具（名称忘记了，似乎叫“锥棒”吧？因为它一头是锥形的木棒。）再绞紧。否则，经过一路颠簸，还不得散架了吗？

装完了，又绞紧了，以后就是车老板的事情了。我就可以躺在高高的柴禾上，仰观蓝天，尽情遐想。当然，危险还是有的，那就是如果他技术不过硬，装的车塌下来，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过去的劳动就算是白费了。真的有一次，在路过一个坎儿时，车颠了一下，我就从柴禾上面滑下来，一直滑到河沟里。幸亏已是冬天，河沟早已封冻。否则，恐怕就要变成落汤鸡了。于是我们再装车，直到晚上8点才回到场部、卸车、吃饭。

除了拉庄稼地里的柴禾以外，如果不够供应的话，还要远赴外地拉。有一次，我们一行8人、4挂马车一起出发，去到一个叫什么地方（村子的名称早忘记了），连来带去，需要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早早地套车去，中午才到达目的地。吃过午饭，就开始装车。这回装的不是秸杆，而是草。相对来说，这种草的重量比较轻，因此也比较省力。直到黄昏才装完了车，回去当然是不赶趟，于是就在老乡家里借宿。按照规矩：卸车以后“跟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饮马——给马喝水，要喝个够，喝得它不再喝了才算饮好了，然后才给喂草和料。奇怪！所有的马竟然都不喝水！我们不理解，老板就亲自喝一口，这才明白：这里的水质根本就不能饮用，发涩，还有些苦咸的味道。怎么办？毫无办法！只好先喂草和料，在喂草和料时多加水，用水拌得湿乎乎的。这

样，马才将就着吃了一顿“稀饭”吧！第二天往回走，经过另一个屯子时再饮马，嚯！大口大口地喝，好像要把昨天晚上那顿所欠的都“补够”一样。看来，头天晚上它们一定渴得不得了。岂但是它们，我们人也是一样地感到渴，因为那个地方的水实在无法下咽。那么当地的老乡又怎样度过这样漫长的一生？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四个“跟车的”伺候马的时候，老板们也没有闲着，他们要张罗晚饭，“民以食为天”嘛！。我们来的时候从食堂里买了些馒头之类的面食，本来打算热乎乎就可以了，至于蔬菜嘛，只好向老乡家里买一点了。据说：老乡家里有各种蔬菜（萝卜、白菜、土豆……，在东北地区，这些东西统称之为“老三样”。），可以任意选购。结果我们吃的时候才发现：车老板们作主，把我们所带的面食都换成了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的粘黄米饼子。而蔬菜则是鸡蛋酱、大葱，还有咸菜。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稀有品种”，所以胃口大开，吃得很开心。据说，老乡们也很少见过白面和大米，希望我们下次再来时，带大米和他们交换。

听到这里，我忽然回忆起，当年在大学课堂上和教材里所学的东西。据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资本论》里的叙述，人类的交易行为是从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什么五袋粮食交换一头牛……之类，货币是以后才发明的。马克思大概没有预见到，在他的身后 80 多年，在他曾经关注的东方文明古国，却发生了不用货币，回到人类早期物物交换的境界。这位睿智的老人，地下有知，又当作何感想？正当我神游万里、思接千载的时候，全部饭菜都被一扫而光了。

晚上是这样分工的：老板们都去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他们聚精会神地赶车。而我们四个“跟车的”则分为两班，轮流值班。干什么？其一是喂马（马在晚上还要吃一餐，如此待遇也还可以吧？），其二是看护，以免被盗（盗马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应

该经常在栓马的地方溜达。如果出了事情，那就不得了、了不得！我和另一位被分配值上半夜。除了围着马转以外，我还随便走走以免犯悃。忽然看到一处有灯光，便往那里走去，进屋一看：这些人正在玩纸牌。四个人正聚精会神地打，其余几个同样聚精会神地看。他们不论男女，都在嘴里叼着用报纸卷成的土烟，大口地吸着，还说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荤段子”。冬天四门紧闭，空气不流通，因此烟雾缭绕、乌烟瘴气，一片灰暗，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散发出来的呛人气味。昏暗的灯光，照着他们一张张蜡黄的脸。可惜我不会绘画，要不然，我真的好想把这个场面画下来。这就是 70 年代中国农村的场景。这也难怪：人嘛，总应该有些精神生活，可是他们有的竟然是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啊！

劳改犯的工资遭克扣

赴五道江

在6分场劳动了一年多吧？又被集中，还是用装生猪的“闷罐”装上，运到吉林省东南部通化地区的五道江煤矿。从西北方的镇赉县，运到东南方的通化，横穿全省，火车大概需要运行20多个小时。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闷罐”里，咣铛咣铛地、昏昏沉沉地被运到目的地。这是个露天煤矿，我们的任务是“剥离”，也就是把煤层上部的土全部挖出运走。这个任务比起镇赉的农业劳动当然是轻松许多。首先是时间有限制：上午8点到下午4点，之间还有吃饭时间约一个小时吧，所以实际劳动时间只不过7个小时。其次是劳动程度并不累，也不那么紧张。我们两人一根扁担抬土，运距也仅仅百余米远。没有定量，当然也就没有压力。还有：工资比较高：月末评等级，1等为1.85元，二等为1.57元，3等为1.32元。即使是3等也比镇赉的1等高。

劳动比较轻，收入又比较高，这样的美差应该是非常满意了。另外晚上经常在露天放映电影，可以随便看。关于电影，早在学校里，我非常爱看，即使是在考试期间，有好电影也从不放过，甚至不惜耽误一点复习也要去看的。可是被劳改以来，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那是他们从有利于“教育”而选定的影片，偏偏我就不喜欢看。但是还必须集合去看，我就只能心不在焉地“看”了。后来就业期间看电影，又是另一番心情：对于故事片根本就不感兴趣。因为那都是在老毛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生产出来的垃圾片，毫无艺术性可言。但是，我却对记录片有着

特殊的兴趣。为什么？我从记录片中可以看到老毛，着重看他的老态，老到什么程度？并从中预测他“驾崩”之日还有多远，也就是预测自己的出头之日。到了1974~75年，我看到老毛在会见外宾时已是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脸上的肌肉也已松弛，神情木然、目光呆滞，远非10年前报纸上所宣传的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可比。我的心中那个乐呀，就无法形容了。看来，出头之日不远了。

本来很好的岗位，岂料又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煤矿方面和镇赉劳改队订合同，按照每人每天1.85元支付，但是，镇赉劳改队却要让我们每月评一次，最好的才给1.85元（这样的人很少，大多都是2等或3等）如此一来，干部岂不是剥削了我们？打听清楚以后，毫不迟疑地就给省劳改局写信反映这个问题，我并且明确指出：这是在克扣我们的工资。

这封信很快就被转回劳改队的领导手中。不久，召开全体就业分子大会，会上这个队的总负责人赵某声色俱厉地驳斥了我在信中所反映的内容，他说：“我们干部能克扣你们的工资吗？”却没有解释，为什么矿上给的1.85元，到了我们手上大部分只有1.57，或1.32？这个差额难道不是克扣吗？赵某接着说：这样的人我们不欢迎，不需要。于是第二天就把我和另外几个老、弱、病、残分子共计30多人集中，打发回镇赉县四方坨子。

这回不是被关进“闷罐”里，而是坐在客车的车厢里。为什么？因为人数太少，包一个“闷罐”的费用超过30多个硬坐的票价。经济核算嘛！

在路上，我进行了反思：当时在五道江煤矿的就业分子近千人，如果被剥削，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为什么别人不公开说，而我却要出这个头呢？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应该承认：这样做实在没有什么必要。但这正是我的性格。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一点不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时把检举材料转回原单

位领导处理的做法实在不正确，完全助长了各地官员处理事情的随意性、主观性和打击报复的可能。

回到镇赉县四方坨子以后，仍然又被分配回原来的分场。不过没有多久，再次转移，转移到 10 分场。这个 10 分场，和其他分场不同，不是犯人劳动，一律是就业人员劳动，其强度当然要大得多。在以犯人为主体的农场里，我们就业分子由于可以比较自由地行走，因而多从事后勤劳动：用马车运输什么东西，或者看护场院等等。而到了 10 分场，所有的就业分子都要下地劳动，从春播、夏锄、秋收到冬天的打场（即把已经收获的庄稼进行脱粒，再把已经脱粒的粮食送到大库）全部农活都要会干。这样一来，我就更加显得很不适应，按照劳改当局的说法，就是劳动关还没有过好（从我进入监狱开始，就反复强调犯人要过好三个关：一是认罪关，二是服法关，三是劳动关）。一是因为对农业劳动不熟悉，二是体力也确实比别人差，差得太多。三是自己主观上的确也不肯卖力气干。三个方面叠加，不仅是月月被评为 3 等工资，不但少几元钱，而且经常被批评、嘲笑、训斥。

为“好逸恶劳”一辩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对于所谓“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说法早就看穿了。前面提到过所谓改造思想问题，我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见第 11 章《肃反肃反，越肃越反》）；至于所谓通过劳动，特别是艰苦劳动改造思想的说教，更是十分荒唐的欺骗手段。这里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悖论：既然劳动越艰苦就越有利于改造思想，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地搞发明创造、技术革新，要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努力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如果真的实现了自动化，劳动变成只是看看机器，不需要什么体力消耗，到了那一天岂不是无法进行思想改造了吗？这是第一个悖

论。再一个是：既然劳动，或者说艰苦劳动更有利于改造思想，那么，为什么那些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一个个都像逃避瘟疫一样地躲避艰苦劳动，纷纷走上白领工作岗位？为什么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一个个都飞走了，回到城市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难道他们都是傻瓜？把有利于改造思想的大好机会“让”给那些没有任何门路的普通老百姓？以上两个悖论说明：所谓通过劳动，特别是艰苦的劳动才能改造思想的“理论”是虚伪的说教。而最具有欺骗性的手段莫过于给这种艰苦劳动编造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有利于思想改造云云。再给那些努力劳动的人带上各种各样的桂冠，投射五颜六色的、令人目眩的、美丽绝伦的光环：什么劳动模范呀！先进分子呀！什么什么标兵呀！……。在监狱里，也有所谓“积极分子”之类的桂冠，其作用也不出其外。因此可以断言：所谓劳动改造思想的“理论”实在是生产力极其低下，而统治者的奢靡挥霍欲望又无法抑制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欺骗手段而已。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其他相关手段的运用无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明白这一点，我才千方百计地逃避，宁可每月少收入几元钱。

既然不可能达到所谓“改造思想”的目的，那么，对劳改犯人实行强迫劳动的真实目的何在呢？其实就是两个目的：用繁重的劳动来惩罚罪犯，以警示其他人；通过超经济剥削从每个犯人中聚敛剩余劳动。

有人批判我最常用的武器，就是说我“好逸恶劳”。现在我可以公开地为“好逸恶劳”正名。“好逸恶劳”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更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发明电梯，就是为了免除爬楼梯的劳，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就是为了免除走路的劳，人类发明了挖土机、推土机，就是为了免除镐刨、锹挖的劳，人类发明了抓斗和起重机，就是为了免除扁担挑、抬的劳……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物质文明成果都是由于人类“好逸恶劳”所产生的伟大结晶。如果人类都喜爱“劳”，那何必去搞这么多的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我们的先人早就说得非常明白：贫而欲富、劳而欲息，人之性也。“好逸恶劳”正是人类的天性，谁也不可能违反或改变。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争先恐后地从事艰苦劳动呢？首先是为“名缰利锁”。例如，为了入党、提干、升学……等目的而表现积极，这不是真实的所谓“热爱劳动”，而是另有所图。其次是强迫劳动。当名和利的套索无效时，统治者就只好采用赤裸裸的办法：用刺刀和机枪来“请”了。第三、还有些人真心相信所谓“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神话。这种人最初很多，但是越到后来就越少了。到了没有人相信那一套时，当局就不得不采用前两种手段，特别是运用第二种手段了。

转眼就到了秋收大忙季节，这又将是个非常难过的鬼门关，我必须设法躲避。怎么躲避？我先给大姐去信，请她来信，就说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要我去见见面。当我拿着那封家信去请假时，那个叫奚瑞民的干事是这样奚落着我：“像你这样不爱劳动的人，人家嫁了你还不倒霉呀。”然后才说到正题：“马上就到了秋收大忙时候，只能给你一周的假期，到期必须归队。”我频频点头称是，心里已是无限高兴，我终于可以远走高飞了，管你什么秋收不秋收的！

但是，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我的目的是逃避秋收那繁重的劳动（至少一个月）。下一步又如何？我在黑龙江姐姐家里给劳改队写信说：对方因事到哈尔滨去了，我只好追到哈尔滨去；好不容易找到的对象不能轻易放弃，人之常情，还希望领导宽限几日云云。再过几天又是一封信：到了哈尔滨，由于人生地不熟，再加上长期没出过门，钱包和行李都被小偷偷去了……如此等等。就这样一个谎言接一个谎言地拖，我本人则在哈尔滨和长春两地随便溜达、观光。就业这些年，我手头也有 200 多元的

积蓄，完全可以支持一个多月的费用，当然必须节约使用。在哈尔滨晚上就睡在车站的候车室，混了几天，由于没有免费的住宿地，只好离开；在长春则通过一位就业的朋友，找到一处安身之所，得以住了半个多月。其间用了好几天的时间特地去吉林大学校园里各个地方转转，旧地重游，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原来我们住的7宿舍仍然存在，只是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另外，还新建了一座“文科楼”，颇有一点现代气派。图书馆里仍然是座无虚席，盛况超前。再从布告栏里看看当时的学校氛围：政治气氛特别浓厚，经常有反对修正主义之类的报告、讲座，意识形态仍然严重地束缚着青年们的头脑。可惜啊，可叹！

等到当地的秋收基本结束，这才回到就业队里，向干部一一讲述先是被偷，后来又遇险的各种经过，反正信不信由你。不信也无法去调查，这也算是考验我的想象能力和“编剧”才干吧。

进“学习班”

冬天的劳动基本上比较轻，因为天黑得早，劳动时间也比较短。其中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记。正是大年三十夜，大家有吃有喝地过了个愉快的除夕。第二天发现有个人没起床，去掀他的被子一看，全身已经僵硬了。我清楚地记得昨晚他还在这里聊天，聊得非常和谐有趣，直到10点多才回自己铺位睡觉。用今天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大概就是死于心肌梗塞吧！由于我这个小组平均年龄比较低，干部就指派我们10来个人去到几里地远的地方，替他挖坑。我的天！那是严冬呀！土地早已封冻，一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但无论如何也得干，不但是要对得起政府，更要对得起死者嘛！于是大家轮番地刨、刨、刨，终于刨出一个浅浅的坑，足够这位朋友睡得下就行了。然后，用马车把这位朋友拉到他的长眠之地，草草地埋了。一个生命结束，多么简

单，多么草率！

到了春天，繁重的劳动开始了。最先的刨楂子（高粱楂子、苞米楂子）。据说农业劳动最累的活就是刨楂子，当然无法胜任，勉强地干也经常落后，而且质量不好，要不断地返工……终于在工地上就地被批斗。批斗结束时，不得不口头上答应明天一定好好干，心里却在计划着如何办？

晚上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乘天色未明时，一走了之。但是，我手头的钱已经不多了，为了筹措钱，我决心把手表卖了。当时还非常时髦的“双菱”表原价是120元，我只希望卖个50-60元就很满足了。哪里知道，表没有卖成，我倒先被朋友出卖了。他怀疑我有不轨行为，就告密了。还没等到天亮，就被送进了“学习班”。

进学习班的最大原因，后来才明白：当时正是1976年的春天，恰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风”，是反革命事件。干部们认为，我这个时候要外逃，肯定是去北京，表面上说是逃避劳动，实际上是去参加这个反革命事件。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和警惕性真是太高了，简直是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20多年来，我们这些人总是和当时被打倒的势力“相勾结的”。开始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后来则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的社会基础；再后来又移交给“帝、修、反”，成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到了“文革”初期，则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最后，是林彪的忠实余党……总之，谁被打倒，我们就归入谁的队伍，理所当然地接受批判、斗争。

“学习班”是干什么的？用一个干部的话说就是几多几少：早起点、晚睡点、多干点，少赚点……那个时候，老毛不是说过吗：“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其实如果不办“学习班”，劳改队

早就有其他的办法，什么小号呀，严管呀……等等。总之就是对不驯服的人进行“教育”（实为折磨！）。在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由于我的劳动总是不过关，说明思想有问题，如何解决呢？当然要学习毛的语录。于是中午饭后别人休息时，专门派人监督我（和几个同样的人）正襟危坐，手捧红宝书，认真学习。这还不算，还要在太阳底下学（当时已是6月份了，太阳的热度如何，人们大概清楚吧！）。理由是：因为有了红太阳的光辉照耀，才可以学习得更好、提高得更快！瞧！他们就是这样变着法儿地折磨人！而且还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也曾试图抗议：我因为体力不好，劳动才没干上去。现在别人休息，我却得不到休息，体力更为下降，岂不是恶性循环吗？可是这一切道理都无法撼动那伙野兽以摧残人为乐的铁石心肠。现在，我只能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直到今天，我已养成了雷打不动的午睡习惯，但是每每回想起当年这一幕，仍然感到非常愤怒、余恨未消。简直没有一点人性！

几个月以后，终于把我放了，第二天就集合出发。

再赴五道江 老毛“驾崩”了

这次到五道江，不是在露天煤矿干，而是下井。从地面下到几千米的井下，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真可怕啊！脚下尽是沟沟坎坎，抬头所见，几乎所有的石头都在向我呲牙咧嘴地笑，在向我招手，表示欢迎。在我的眼中，处处是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致命的事故。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葬送在这个深深的矿井里，况且前面已经谈到，据我的观察，老毛没几天活头了，我的出头之日为期不远，多少年都熬过去了，快要天亮时却死在这

里，岂不是太可悲了吗？不行，我不能干，坚决不能干！于是再三请求调动劳动岗位，理由是我有关节炎，不能下井劳动。

这个要求当然不可能获得准许，还得硬着头皮地下去。每天下去时就担心还能不能上来。上井以后，才舒一口气，终于又活过来一天。就这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干了半个多月。因为别一组没有记录员，干部就把我调去担任记录员。我这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官”，这回才当一次；可就是这仅有的一次，竟然出了个大麻烦。

问题出在发工资的时候。因为这个月我先后在两个小组劳动，当然分别记工。领工资时自然分别领了两份——在甲组领取十多天工资，又在乙组再领取十多天工资。这完全合理的事情，却被人怀疑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甲组发工资时发现少了30元钱，报告到干部那里，经过分析，断定是我多领了这30元钱。干部正式找我谈话，先是说服，后则警告。但都无效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强迫手段：关押学习班，反省问题。

问心无愧，自然不怕。而且离开那个可怕的井下劳动岗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心中坦然。

但是，主管我们的干部奚瑞民，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他也调来这里）。因为上次请假逃避秋收的事情，所以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个很不老实、不接受改造的顽固分子。这一回又落在他的手里，他断言：“这个钱就是你拿了”，并且采用体罚的手段：强迫使我低头反省自己的错误，再低头！在哪里低头？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就是在他办公室的火炉上方。用热烤的办法，烤得我满脸通红，实在受不了。还是不承认，再拿出最后的杀手锏：用绳子紧紧地绑起来。古人云：“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他甚至拍着腰间的手枪威胁我说：你这个反改造分子再不老实就枪毙了你！当时我想：量你也不敢。现在才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很幼稚的。因为我曾经看过一部小说，内容是有个犯人在和管教谈

话时被枪毙了。管教就说是犯人夺枪行凶，而管教则是自卫才把犯人击毙的。他当然可以找到许多犯人来“证明”自己的话。瞧！一条命就这样被消灭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完全可以判断，一个犯人怎么敢夺枪？可见所谓的“夺枪行凶”实在是事后的辩解之词。

在这些手段压迫下我决定暂时承认，以后再翻案。

就这样反反复复，今天承认，明天又推翻……双方僵持不下。其间又发生了一件小事：在学习班里，为了防备我外逃，要求我把所有的私人物品，特别是衣服统统交给班里的更夫保管。有这么一天，我们都出工劳动（学习班只能在地面上从事零碎的劳动），更夫在屋里睡觉（他晚上要打更），便把我的东西就放在火墙上，结果东西被烤着了。这件事情当然被我抓住了把柄，要求赔偿。在以后上访的过程中，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在学习班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叙的事情。学习班组长叫周荣佩，上海人。他对我特别苛刻，经常挑刺，这也不对，那也不是，我早就难以忍受了。这一天，忘记了因为什么事情，他竟然骂我，还说脏话。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股子劲头，我猛然扑过去掐住他的脖子，紧紧地、再紧紧地……如果这样下去，把他掐死了，我也就没命了。幸亏其他人立即把我拉开，这一幕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事情并没完，一个有“错误”的学习班成员竟然敢于掐死小组长，如此嚣张，那还了得？到了晚上，学习班开会，首先把我捆绑起来，命令我深刻检讨、认错，大家批判，一直到晚 11 点才散会，解开绳子。这是我最后一次被绳绑。

几天以后，也就是 9 月 9 日，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好事：那天下午 4 点多，快要下班时，广播中播发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老毛“驾崩”了！当听到这个喜讯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只能用“心花怒放”这个成语来表达！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到了今天，暴君

终于归天！中国终于有希望了，我也一定会有希望的。

为了庆祝这一天，我特地去小卖部买了一瓶鱼罐头和一小瓶红酒，准备晚饭加菜，喝个痛快！

我相信，不，我坚信：全中国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包括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党内的民主派和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盼望这一天！都在热烈庆祝这一天！9月9日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伟大节日。

但是，回到宿舍里，情况有变。干部特地来宣布：为了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不许欢乐唱歌，不许大吃大喝……，岂有此理！他死了，关我们什么屁事？竟然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心中虽然这样愤愤不平，但还是没有这个胆量公开顶碰，所以又把罐头和红酒藏起来，以后再庆祝吧！另外，我还可以在心理大大地庆祝啊！

再次与死神交手

又一次上访

果然，学习班第二天就送进来一个新学员，他是北京人，不知道因为什么罪名被劳动教养，后来就业。这一回是因为昨天晚上，他对另一个就业分子说：把你家送来的那个什么叫做“一品香”的茶叶拿出来让我们大家品尝品尝，高兴高兴！对方没敢拿出来，但是早有人报告干部了。这就叫赶在那个点上，该他倒霉！



1979年上访归途，在吉林松花江畔留影。

老毛死了，普通老百姓想喝点茶叶也不行，这叫什么？这就是“专政”二字的具体含义。

经过再三考虑和权衡利弊，长期在学习班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还得来个“曲线上访”。于是，我再一次承认了冒领30元钱的错误，并且保证“永不翻案”（这是学习邓小平的办法），不久就被放出了学习班。经过几天的缜密谋划，再次实行逃跑计划。这回，可不应该再利用开饭时间了，因为吃饭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大事。但是，上班是个重要的时刻，我就利用这个时间。

当大家都匆匆忙忙、风风火火地往工地上赶的时候，我也在赶路，不过不是往工地上赶，而是往车站的方向赶。在通向车站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小浮桥，平时走在桥上，都要来回荡漾，这一回，我的身体当然也在荡漾，而我的心则更剧烈地荡漾：此去吉凶未卜，是福是祸？没有绝对的把握啊！

当火车到了离通化市区还有一站地的时候，我提前下车，硬是用双脚走到通化市。为什么舍弃坐车而走路呢？这就要重温从前的教训了。当我走到通化市，已是饥肠辘辘，必须先解决肚子的问题。但我刚要迈进一家餐馆的一刹那，抬头一瞥，不禁大吃一惊：果然，他们先到了。不远处有三个人正在推杯换盏，酒兴正浓。正是就业队里几个积极分子，他们当然不是来这里玩的。幸亏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嘴巴上，没有发现我。赶快悄悄地缩回来，另找地方吃饭。

饭后当然也不能买票乘车，这也是通过实践不断学习的结果。我迅速迂回到离车站很远的地方，再潜回站台，最后终于上了火车。还不能大意，我从车窗往外观察：有没有就业队里的人进入站台。如果有，我必须马上下车，放弃这次旅行。还好，没有发现就业队的人进站台。“呜——呜”火车一声巨响，宣告了我这一次逃亡的胜利。

车到长春，下了车直奔省劳改局，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在等待中，由于一夜的辛苦，竟然呼呼地睡着了。省劳改局的干部接待并阅读我的材料以后，给我一个封了口的大信封，让我回去解决。当晚我又乘车回到五道江露天煤矿就业队里，向干部们交上那封信。奇怪了，他们既不向我宣布撤消从前的结论，也不再追究的“逃跑”的“罪行”。这样“既不……又不……”处理问题的方式，实在是空前的大策略，大手段。

工伤事故

在“既不……又不……”僵持的局面下，又发生了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工伤事故。

这个时候我已在露天矿从事剥离劳动。为了加快进度，需要经常放炮，通过火炮巨大的爆破力把坚硬的土层或巨石炸开。放炮通常是在下班前一个或半个小时进行，以便明天把土渣运走。按照规定，放炮以前必须大声喊叫“放炮了，放炮了”，以便其他人员及时撤离现场或就近躲避。喊过以后，还必须等待十几分钟，好让别人有足够的时间走开。恰好这天是星期六，有个矿上的正式工人为了早点回家，喊完不久就放炮。一声巨响，漫天的

大小石头纷飞而下。

我和小组的同伴们正在撤离的过程中，有些人已经到达安全地点，但还有一个姓王的组长和我走在最后面，因此，赶上了密集的石头流。那个王某某恰好被砸中了太阳穴（估计他是斜抬头往上看时被砸中的），当场倒地，口吐白沫。距离他只有两米远的我，这个时候，要跑向安全地带已来不及，又无任何工具可以遮挡，手里只有一把大板锹。说时迟，那时快，不允许片刻的迟疑，情急之下，我用双手举着这把锹，举过头顶。也算是急中生智吧！万一石头砸向我的头部，无疑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可是我站立的姿势不恰当，可能有些弓身，腰部和臀部往后撅起。腰部被重重的砸了，顿时被砸得坐在地下。按照通常的情况，这个时候本来还有许多个作业小组都准备放炮的，如果相继放起来，我们就必将被各种石块砸成肉酱无疑。我马上大声喊叫：砸死人了啊！砸死人了啊！这样才避免其他小组陆续放炮。不大一会儿，跑过来许多人，七手八脚把我和那个姓王的一起抬到安全地带，稍后又来了汽车，把我们二人送到矿医院。经过检查，对我的诊断是：腰部和尾椎骨受轻伤，红肿，休息一周。而那个王

某却已经呜呼哀哉了。说起这个王某，本来是个“没帽的”，在井下劳动。只因为他在当地的居民家里“搞破鞋”，又被带上“流氓坏分子”的帽子，这样就和我们这些“有帽的”在一起劳动，还委派他当个小组长。这一回，却成了风流鬼。

总算又逃过了一劫！在病休的日子里，不断有法院来人调查那天的事情经过，又是开座谈会，大家一致愤怒表示，要严惩那个提前放炮的工人，甚至还有人说：别把我们这些就业的不当人看待！我们也是人云云。这些话却有些言重了，其实，矿上还真是一视同仁，一律对待，很认真的，又是调查，又是开会……据说那个着急放炮的工人还被判了刑。相比之下，真正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恰恰就是那些管理我们的劳改队的干部，他们和我们之间永远有一堵厚厚的墙。

一周以后，我的伤早就好了，本来打算出工劳动的。可是干部却不让，他们要我再呆十天。我当然清楚他们的真实目的——向矿上多提经济要求。看来他们把我当成一块要挟的盾牌了。我自然也乐得过几天“不劳而获”的日子。过去，我的劳动远远没有取得应有的报酬，甚至是“劳而无获”，也就是10多年的无偿劳动，今天就算弥补万分之一吧！

又过了几个月，我再一次被他们遣返回镇赉县四方坨子农场。临走之前，我去问干部：我的问题如何结论？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这里。答复是：回总场再说，我们会实事求是的，你放心。

火车又一次把我送回那个可怕的农场、那个苦役之地。负责送我的是一位很和善的中年干部（姓名忘记了），他因为有事回家，顺便就把我“捎”回来了。在路上，我们交谈得很融洽，到了四方坨子农场，就是他的家了，本来可以不再管我，但却执意要我去他家里吃顿便饭。推却不过，只好从命，这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到干部家里吃饭。

这又是个机会，我不能错过。当他问我回哪个分场时，按照规定，我应该回原来的分场，就是那个 10 分场，如果回去，仍然会陷入“劳动——落后——进学习班”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于是我马上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说：我是八分场的。“好吧，我给他们打电话，你自己回去吧！”就这样我来到八分场。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八分场。上次是作为劳改犯人，差一点被加刑。这次是作为就业犯，多少有那么一丁点行动自由了，可以到小卖部买点食品或其他零星用品。在小卖部发现从前那个带队的姓吴的，原来就是这里的营业员，他当然不会认出我。

现在，八分场又恢复了以犯人为主要劳动力。我们这些就业的只做些杂务，主要的还是用马车搞运输，而我的劳动岗位也还是“跟车”。当然，有的时候也被派去做一些其他杂务。例如：1976 的冬天，我就被派去看守“打场”的现场（所谓“打场”就是把已经收获的粮食进行脱粒，装进麻袋，准备运往粮库）。白天犯人打了许多粮食，暂时没有入库，临时存放在现场，这就应该有专人看守。于是派两个人，分别负责看守。我是看下半夜班，那个冷啊！虽然浑身裹得严严实实，但是体内的热量还是不断地消失、消失；带上口罩，早已被冻得棒硬。为了驱寒，不得不来回走动。走来走去，走呀走！天上的明月来相伴，也无心欣赏。只是盼天亮，盼呀盼！终于，天开始发亮了，快熬到头了吧？不行。必须等到 8 点多一些，犯人出工来到现场，我才算完成任务，才有资格去领取 1.2 元工资。多么艰难啊！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为了加快庄稼生长的进度，人们发明了用塑料薄膜覆盖的办法。但是，塑料薄膜又怕老乡来偷，于是，又要派人去守夜，这样的临时性任务还是落在我头上。早春天气还很冷，我就这样在外面度过一夜又一夜。地里有一个小小的窝棚，地下铺一点稻草，就算是我的床铺了。漫漫长夜，就这样孤独地度过。我也曾设想，如果老乡真的来偷，

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能对付他们一群吗？所以，这个任务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反正被派出来就遵命吧！为了驱散孤独和寂寞，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声唱歌，唱京剧……没有听众，没有舞台，我这个演员忽而是宋丹萍，忽而又成了诸葛亮，再又是窦尔敦……唱歌不但需要力气，而且需要喝水，我的身边只带了一小瓶热水，很快就凉了，不能多喝。因此，也就不能长时间地唱。唱了一段时间，累了只好睡吧！

以上是临时性的任务，经常性任务还是“跟车”。

再次踏上征途——上访

到八分场已是秋天，1977年的新年过后，我再次踏上征途，还是去上访。这次是直接到北京。也许有人会认为：30元钱的事情，有这个必要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不对，是正题正做。这是个人格的问题，那怕只是为了一元钱，也应该搞个水落石出呀！经过周密的计划，在一个早晨，借出工的机会（通常我们总是在天亮以前就起床、吃饭、准备劳动），我先是向南，即向食堂的方向走，到了一个柴禾堆前，围绕着转一圈，然后折返向北，大踏步地前进，前进，向着北方。这叫什么？这就叫“声东击西”。真没想到：《孙子兵法》被我用在这里了。

当我向北方走着，走呀走的，不觉已来到一片广阔无际的大草甸子，枯草有一人多高，忽然害怕起来：如果有狼怎么办？想到这里，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打了一个冷颤。难道今天要喂狼了？太可怕了。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带，如果真的来了狼，那是必死无疑了。再一想，我肩上跨着个背包，这个东西有了新用途：万一出现什么野兽，就用这个东西作为唯一的武器。只要把背包轮起来，岂不是也可以抵挡一阵？想好马上就把背包拎在手中，准备应付一切变故。

不久天亮，不用怕了，可是我的身上早已汗透，是因为累？还是因为怕？我也说不清。根据我以前的实地调查了解：到了一个小镇，就有汽车通往黑龙江的泰赉县。果然，按照计划顺利地到达泰赉，再乘上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火车。当车经过那个被叫做“坦途”的小站时，我转过头去瞥了一眼，按照经验推测，他们一定在那里“恭候”我的“驾临”吧？事后得知，还真是这样。他们集合了10多个人（都带着绳子，预备把我捆绑回来。）分别去四方坨子和坦途两地堵截，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我竟然从黑龙江的泰赉上了车。后来还听说，在评积极分子时，有个姓周的，在准备材料时是这样写的：“当反改造分子胡显中逃跑时，我马上不怕牺牲奋力向前……”云云，直接管理我们的干事姓杨，这个杨干事还算是个明白人，他看后立即说：什么逃跑！人家是上访，瞎胡闹！这一条别写了，不算！

以上消息，我是如何知道的呢？有位就业的，也是知识分子，叫王禹，在我们那个小队当保管员，他有机会经常接触到干部们，干部们之间说话也不怎么防备他。整理积极分子材料时当然需要他来做些文字方面的事情。他还经常向我透露一点官方的新闻，也可以算是知己吧！

一到北京，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事先观察一下。这一天正好是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日子。车流很密，我必须提前穿过马路，才有可能按时到达目的地。8点刚过，就有小汽车不断地进入新华门，偶尔也有出来的车。不允许犹豫耽搁了，必须当机立断，我走向一辆刚开出来的车，直直地站在前面，挡住它。从车里伸出一个人头，问道：“你干什么？”我马上翻开手中的本夹，露出两个大字：申冤。他们让我上车，上车以后把早就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他们，至于车子驶向何方？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此我立刻睡着了（坐了一晚的硬坐，能不恼吗？）当我被喊醒来时，正在公安部的办公大楼前面。他们领我走到一间办

公室的外面，让我坐等，等了不多久，出来一个人告诉我：你先回去吧，3天以后再回来。同时又问：你住哪里？我回答说，是刚到北京，还没有住的地方。他又给我开了一张便条，让我去到陶然亭甲8号，并告诉我如何坐车、换车。到了这个地方才知道，这就是上访人员接待站。安排以后，才去吃早饭，已是11点了。3天以后，再去那里时，我又得到一个大信封，叫我回原单位处理，并给我开了一张条子，拿着这个去车站什么窗口，就可以领到一张免费乘车的票云云。几天后，又回到五道江，向他们递上那个大信封。在和大家见面聊天的时候，难免谈到北京上访的经过。还没谈多久，就被叫到干部办公室（早有人汇报了，可见死心塌地做奴才的人是很多的）。还是那个姓奚的对我说：为了避免你乱说，现在把你暂时留在学习班里，等待送回镇赉。几天以后，又是一位干部陪同回到镇赉。这位干部也是让我自己回八分场去。

失败的求爱之路

在好几个分场当“跟车的”，也触过许多车老板，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有在这里遇到一个姓孙的车老板。他说话很客气，特别是听说我是个大学生的，那个时候大学生还算是“稀有动物”吧。接着就唠起了家常，他属于带家的就业分子，其子在当地的学校任教，他颇以此自豪。再谈到在当地学校里还有个女老师，也是就业的子弟，用老毛的说法就是“可教子弟”。这个女老师曾经和一个就业分子（也是大学生）谈过恋爱。据说她的要求只是有学问就行，不管什么就业不就业的，因为她自己就是就业的子女嘛！又据说后来和那个就业的闹翻了，什么原因呢？又有好几个版本，其一是说那个就业分子性急，要动手动脚，把她惹恼了云云。对此，后来我曾经向她求证，她绝口否认说：“他敢？”

我也就此打住了。

孔子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诗经》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名句。只要是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男子，没有不对异性产生兴趣的。因此，我对于这个女教师同样产生了兴趣，设法打听其详细情况。据说，她年已 30 多了尚无对象，那个和她谈过恋爱的，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姓王，比我强的一点仅仅是“没帽的”，而我是“带帽的”。但在我想来，这一点不会成为什么障碍。这个“帽子”问题，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再一个就是看起来，他比我显得苍老许多。反复衡量和比较以后，颇有自信地开始采取行动。我先进行迂回战术，从外围进攻，请一位比较熟悉、又能够和对方说得上话的朋友，和其母接触，表达一点意向，希望进一步谈，其母马上同意召见我。如此快速的反应，实在令我感到意外，原以为希望在前，胜利在握了。

在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我正式拜会这位 50 多岁的女性。她原来是中学教师，而且是教语文的，其丈夫原来是工程师，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后来就业在这里。她正式拒绝了我的要求，理由是：年龄相差过大。她并且说，你不能像鲁迅那样有名望，可以雇保姆来料理家务，那么，你和她将来如何共同生活？

但我并不死心。遥想当年，司马相如能用琴声来挑动卓文君的情思，使她违背父母的意志，和他私奔。今天，我为何不能用我的特长来打动对方呢？思考再三，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下。迂回战术不行，就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直接向她本人进攻。

恰好场部放映电影《刘三姐》，我非常注意地看了以后，决定用诗来打动她：

山歌一曲唱心声， 余音袅袅感慨深。
傲骨从来轻富贵， 绣囊终属贫寒人。

三姐岂只天上有， 笑向人间觅知音。
徘徊彷徨何计是， 小诗一首动芳心。

从我的住处，到她家里或她工作的学校里，步行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却不得不采用邮寄的办法——走几里路，到另一个屯子才有邮筒，而且要几天以后才能收到。可见那个时代办事方式是多么原始，多么艰难！

这首诗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没关系，“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嘛！不久，又放映电影《白蛇传》，我还是照样办理，又寄去一诗：

断桥一见便钟情， 萍水相逢定终身。
法海无端生是非， 素贞有勇战险衅。
满腔悲愤满腔爱， 几度波折几度春。
世人有情皆若此， 何惧他人乱狺狺。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首诗终于打开了对方的心扉。就在我刚值了夜班，应该睡觉的时刻，我算计好时间，在她到学校去的路上，迎了上去，并且自报家门：我就是那个寄诗的人，……她说了些什么，我似乎没有记住，但是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却记住了：有空常来家里玩。不管她说这话是出于礼貌、客气，还是真心邀请，反正在我听起来就意味着：允许我上她家去串门。这难道不是初步的胜利吗？这个小小的胜利可是来之不易啊！

在我们就业分子里，还有一个姓胡的，是北京钢铁学院的讲师，因为生活问题被劳动教养（具体情节不清楚），然后就业的。他也是她家的常客，是她妈请来为其妹辅导功课的。这样，我和这位姓胡的就经常搭伴去她们家里，有时候还在一起吃顿便饭。

（当然，主要是为了答谢那位姓胡的）。

这些事情当然瞒不过干部的耳朵。有一次，直接管理我们的康队长就当众批评我说：“你也应该想一想自己的身份，人家人民教师，而你是什么东西？就业的，是不是太不般配了？”我想说的话很多，但是，为了不扩大事态，还是忍不做声，“沉默是金”嘛！20多年了，才学会这个道理。

顺便说说这个康队长，就业队伍里都叫他外号：“康扒皮”，因为他对这些就业的特别刻薄。劳动要超强度，工资则尽量压低。列宁曾幽默地、形象地描述这种人：“要从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来”。果然，不久我就亲身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有一次，我被马踩了，鲜血直流（请注意：马蹄下都挂了铁掌，被这样的马蹄踩过，什么血肉之躯也要被粉碎的。），在宿舍里休息几天，这个康扒皮竟然不给我记工分，按旷工处理。我找他理论，他还说：为什么别人不被马踩？还是你自己不小心。

后来，有一天我去她家里，竟然被拒。很久，才开了门，她对我说了几个字：“我爸回来了，他不同意。”（她父亲在双阳县某地劳动）。这次的求爱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如此逆转是什么原因呢？据我的估计是这样：当时已有什么 11 号文件，后来又有个什么 55 号文件，右派分子的命运似乎即将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他们的父母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个好一点的归宿，所以，决定不再在这个鬼地方解决终身大事，等几时再说吧！果然，不久她家就最早离开这个地方。据说她父亲被“改正”了以后，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了。相比之下，我这样的就业分子就显得太不够资格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给她寄出的第三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内容只有七个字：“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区区 7 个字的内涵可比以上两封信的内容要深刻得多。前面两信的主题就是一个：求爱。而这封信的内容可多着哩：既有充分的自信，更有殷切的规劝和

忠告。

果然，时间不长，那 7 个字就被生活验证了。大概是 1980 年五一节过后，我在吉林大学经济系上班不久，收到一封其母的来信，内容是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叙旧，还说，准备了一些鸡呀、鱼呀什么的（在当时物资极其缺乏的条件下，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很难搞到的），最好是去过五一节。我的天！这个时候已经是 5 月中旬了。这封信为什么迟到呢？原来她打听到的我单位有误，以至于把信封写成：吉林大学资料室。谁都知道，大学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料室”，只有图书馆；而每个系应该有自己的资料室，但是她又没有写明那个系的资料室，这封无法投递的信就这样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睡大觉。又不知道是哪位热心人，知道我的名字，就把此信转来经济系的资料室，如此辗转，到了我的手中，已是时过境迁、明日黄花了。

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在 5 月下旬的某一天，去了四平市附近的公主岭她的家，呆了几个小时，并吃了一顿便饭（这是我在她家里所吃的“最后的晚餐”）。临别时，她送我到车站。当我们两个人相处时，我告诉她：我已经结婚了，希望她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1995 年我已离休，又在中国新闻社吉林省分社临时打工。某日和社长一道赴公主岭采访省农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留下名片。回来不久，接到社长打来的电话，说有位老相识要见我，原来就是她。双方一见如故，只是彼此的外表都已苍老了许多。

雪中送炭好大姐

在这里应该介绍一下我早年的家庭：父母共计生育了 13 个孩子，存活下来的有 6 个（3 男、3 女），我是他们在连续生育了 6 个女儿以后的第一个儿子。父母都已 30 多岁，才喜得贵子，其喜悦心情无以言表，同时对我的痛爱当然无以复加。可以这样说：要星星，就不能给月亮。

父母的头一个孩子就是大姐胡奋志，长

我 10 岁，曾经接受过中等师范教育，是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的学生，长期从事幼教工作。我们姐弟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早年她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由于我的淘气，曾经被她痛打过屁股。这些，都不重要，是一般家庭里都会发生的普通故事。最重要、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我蒙难的 10 多年时间里，她不避嫌疑，始终和我保持通信，不断地鼓励我、规劝我。尤其使我感动的是：经常从她那微薄的收入中（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也就是四十几元吧），节约出 10 元、8 元，给我寄来，使我在物



作者与大姐胡奋志摄于 2004 年

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可以买些营养品（比如猪肉、鸡蛋之类）。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她的长期“输血”，我还能够度过那极其恶劣的物质生活环境，存活下来，看到平反以后的今天。

特别应该追述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吃是头等大事。我在监狱里缺乏，她们一家在外面也同样缺乏。可是她把每个小孩每月配给的2两白糖积攒起来邮寄给我。接到这包白糖时，我的手都颤抖了。用白糖化成水里，我分明看到她几个孩子脸上闪闪的泪花。我喝的不是甜水，而是苦涩的泪水啊！可怜我的外甥们！以后决不能再寄这些东西了！直到今天，每当看到她的几个孩子，我都有一种愧疚之心和负债之感：按照常理，我这个舅舅应该给予他们什么，可我竟然成了索取者、剥夺者，我算个什么舅舅？

如果从伦理的角度看问题，父母对于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否则就要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一个姐姐，却没有任何义务来资助弟弟，何况还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弟弟，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可以和我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再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父母抚养子女通常有一个经济预期或精神预期：今天我抚养你，将来我们老了，你应该赡养我、回报我们。如果我们不需要你赡养，也应该给我们精神上的安慰与关怀。而我的姐姐根本就不可能预见到我有平反的那一天，而且还当上教授什么的。那么，她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什么？无它，仅仅是一种手足深情吗？不完全是这样，更主要的是，她对我的理解和同情，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中，我是一个“众人皆欲杀”的敌人，可是，在她的心目中，却的值得同情、值得关爱的好人“吾意独怜才”。这就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10多年从经济上给我不断支援的最大理由。这种无私的、不指望回报的援助，难道不应该永远牢记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人人皆知，人人应为。如果今天过上好日子，就忘

记这个大姐，那真是忘恩负义之徒，为所有的中国人所不齿。可是，这些年来，我拿什么回报她呢？太少了，微不足道啊！用一座金山都无法报答她对我的大恩大德，我的一生中最应该感恩的人就是这位大姐。因此，在这本书里，不能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现在附录当年写的小诗一首如下：

千里投邮为哪般？手足情义重于山。
雪中送炭人心暖，暖我十年度劫难。

当我出狱时，身无分文（此前好几年就不允许任何犯人家属寄来钱和物）。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她去信，要钱，要粮票（那个时候，还流通粮票，没有这个东西，只有钱，是买不来食物的。）她都一一满足，并且在不久以后还特地来看我。在送别她的路上，她劝告我：好好保重身体，将来身体恢复了，也成个家。听到这里，我强抑制住泪水，哽咽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两个弟弟都结婚生子，我们胡家总算有后了。至于我，已经不行了。

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才 40 岁，正当盛年，按照普通人的生理周期，完全有可能成立家庭，生儿育女。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因为在专政铁拳的重重打击下，身体垮了，彻底垮了。一个 40 岁的男子，没有性的冲动，还能叫做男人吗？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古人司马迁。他曾经受过汉武帝的“宫刑”，变成一个中性人。自古以来，中国的刑罚什么残忍手段都用过，强迫一个人失去最起码生理本能的刑罚，多么残酷啊！真是太残忍、太无人道了！那是史书记载的，应该成为历史了。可是到了今天，我仍然受到这样残酷对待，以致于不成其为男人了。天哪！这是谁造的孽啊！

时间慢慢地抚平了我的伤口，让我逐渐地恢复了作为一个男人的生理本能，这才有以后的结婚、生育、家庭……等等。我今

天所拥有的一切，应该感谢谁呢？首先应该感谢的不是别人，只能是可敬的大姐啊！没有她的无私支援，我未必能够活到今天，更谈何结婚、生育、家庭？更谈何写作、发表文章、当什么教授？

几年以后，她再度来看我。事先拍了电报，要我去接站。当时我已在五道江露天煤矿，正好因为放炮受伤休息。可是却没有接到电报。在她到了的第二天，电报才到达。瞧！这样的通讯手段多么落后啊！当她知道了我因为 30 元钱的冤案而不断上诉时，再三地规劝我说：像刘少奇这样的大人物不也是在受着不白之冤吗？你就忍了吧。我实在不忍心违背她的意见，只好口头答应她，以后不再追究了。但是心中从来就没有放弃这件事情。

当她离开时，我应该送她到通化市，让她换上去南方的列车。为此我去向干部请假。又是那个奚瑞民，竟然派一个就业的陪同我去通化。名为陪同，实为监督。监督什么？就是怕我借机逃跑，又去上告。可见他们心虚如此！他们还口头上经常说：不怕你告，告到哪里也不怕！既然如此，可为什么还要这样监督呢？这就叫色厉内荏！

看到自己的弟弟和一个根本就不相干的人一道来送别，如此尴尬的场面，使她非常反感。

* * * *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件事情：有位吉林大学的校友王世岚，曾经写过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忘记了）内容是记述吉林大学数学系学生任化民在“文革”期间被迫害，逃到深山老林里谋生的惨痛历史。该书受到当时出版界的追捧，红极一时。后来又受出版社的委托，想再写一些类似的文章。80 年代末期，他辗转打听到我，并找到我的办公地点。我们交谈多次，并把所有的资料全部交给他。后来他写了《冤狱 20 年》的报告文学，发表在沈阳春

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记实文学》1989年第2期上。

这篇3万多字的长文，被淹没在众多色情文章的海洋中，连封面都是几乎全裸的女性。因此，一直羞于示人。另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我的大姐写进去（原稿有很大一段介绍，后来被编辑部删掉了。）。现在想起来，应该在这里好好地弥补。

为了庆祝她的80大寿，我决定送一副寿联。为了写好这副寿联，还专门练习了一阵书法。寿联如下：

奋力持家 儿女皆成才 堪比孟之母；
志在兴教 桃李遍天下 无愧女中豪。⁸

* * * *

这些年来，每到她的寿诞之日或春节，我都要汇点钱，表示一点心意，我所能做的也仅仅如此而已。这点钱对于她来说，可能是“锦上添花”吧？完全不能和当年她对我“雪里送炭”的意义和作用相提并论，其分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这点钱，她也再三表示不要。特别是最近她又直言相告：“一旦我死了，这个钱还有什么用？”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只好从命了。但是我又想出另外的办法：就在不久以前，我给她所在的“老年福利院”去信说明内情，请求他们在大姐生日那一天代我献上花篮和生日蛋糕，用这个方式来祝福她，让她开心、快乐。这个福利院的办事人员还非常负责，一切照办，事后还寄来了祝福现场的照片。

⁸ 这是一副藏头联，她的名字“奋志”二字被嵌入上下联中。

难友群像

在改造的 10 多年期间，相处得比较好的许多难友当中，值得记述的有以下几位（按和我相处的时间先后排序）：

1、**何鼎深** 吉林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时，因为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受到批判。在宿舍里又因为开玩笑，他用指甲剪（请注意：不是用枪，也不是用刀，而是用指甲剪！）追打团支部书记。于是，上升为“反革命报复杀人犯”，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到了看守所，和我相处几十天，后来同时转移到铁北劳改队，在监狱里又相见，但不在同一个车间劳动，他因为学的是化学，所以分配到化验室，从事和专业多少有些关系的劳动，我还很羡慕他。1958 年 10 月下旬吧，我和他同时被调往杉松岗煤矿。我利用这个机会第二次逃跑，抓回来关押小号因而得免。而他却去了杉松岗煤矿，后来死在该矿。

回忆在看守所相处时，他对我说过：将来出去后就回家做一个农民吧。为此，我还写下了一首小诗悼念他：

悼亡

江南孺士何， 塞外遭风波。
当日一戏言， 无辜陷网罗。
空余力耕志， 弃身荒郊坡。
闻此长叹息， 欲言复几何？

2、**李芳绵** 吉林大学物理系学生，因为右派问题而被送去劳

动教养；又因为逃跑被抓回、判刑 10 年，到了铁北劳改队。他从黑板上看到我的名字才知道我也在这里（初期，犯人来了汇款都由监舍的看守负责发放。看守在监舍大门旁边的黑板上写上名字，让犯人来自取。由于这个办法容易产生纰漏，后来改为由车间发放，记录在犯人的帐目上，不给现金）当他知道了我在这里，就利用早晨等待出工的机会，在监舍的大院里寻寻觅觅，终于发现了我，彼此只匆匆交谈几句。后来他又因为组织反革命集团而被加刑 15 年（他的同案犯程指南和我在同一个车间，也加刑 10 年）。1979 年前后，李芳绵也来学校要求平反，临时住在招待所，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面。他的问题比较轻，因此早就改正了，回吉林市某中学教书，据说不久以后也结婚了。

3、**陈永吉** 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因为是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刑 15 年，家住吉林市郊区。我和他是在铁北劳改队聚氯乙烯车间乙班劳动时认识的。后来达到了彼此无话不谈的地步。有一次，他在什么书里看到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任何一个拿破仑都会有他的滑铁卢”。好！说得十分到位，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又例如：当我看到《孟子》里说的：“见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觉得十分深刻，便转告他，彼此相视一笑。还有好像是歌德说的：“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啊，人们，站起来吧！”……类似这样的经典性语言，互相转告并以此为乐。从这些活动中就不难看出我和他之间的理解和默契。当我离开 1 分场转移到八分场，等待上车时，恰逢大队出工。临时遇见他，彼此交谈几句，我说：这可能是咱们的最后一面了，请保重！真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我们又见过一面，也是匆匆而过。1979 年前后吧，我上访路经吉林市，特地去吉林郊区的白山公社打听他的弟弟陈永祥，无果而终。许多年了，现在连他留给我的地址也没有保存下来。不知道他近来情况如何？是否还活着？

4、**赵革东** 中共吉林省四平地委组织部长，这个角色本来

不会和我发生什么关系。可是他犯罪了，什么罪名？反革命集团。像他这样的中层干部怎么也搞反革命？这就要追溯历史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国防部长一下子变成了右倾反党分子。在吉林省有一大批干部思想搞不通，由思想而行动。他们究竟搞了什么行动？我这个局外人也说不出什么内情。反正听说有一个“吉林省干部同盟”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就是指他们这些人。从此，在监狱里就多了一批原来是干部身分的重刑犯人。在另外一个劳改单位里，还有一个首犯，关于这个首犯的传言很多，有几种版本。版本之一是这样：在开始的时候，许多干部轮番对这个首犯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但是，他竟然耍笑这些干部。怎么耍笑的？他站起来说：各位领导对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教育，感谢大家。为了表示感谢，我给各位献上一段《借东风》吧！并且开腔就唱“识——天——时——，玄妙法——，有如反（勒）掌——，管教科长把桌子一拍，大发脾气地说：你这个顽固透顶的家伙，你等着瞧吧！这位首犯还不紧不慢地说：“科长，我这里唱的是慢板，你不要用快板来伴奏嘛！”最后，当局再没有其他手段，只好把他枪毙了。当时还召开了宣判大会。

在铁北劳改队里，有一个“小一中队”成员就是这些具有相当身分的特殊犯人。他们特殊在哪里呢？生活上比较照顾、优待，可以单独到伙房打饭，当然油水要多些。（据说是这样：先从上边舀一勺，为的是捞浮油，再从下面捞一勺，目的是要干货。这样就比我们好吃得多了）；住的也比较宽敞，人均大约有一米宽的地方，足够一个人打滚儿睡；劳动方面更是优待：半工半读，即半天学习，半天从事轻劳动。什么人资格进这个“小一中队”呢？科级以上干部，也有处级干部，没有再大的了。赵革东应该算是县团级吧？当然是其中一员。如果长期保持这个“小一中队”，他也不至于和我打交道。

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全国都在反对特殊化，这个“小

一中队”当然被解散了。这样，赵革东被分配到我所在的聚氯乙烯车间从事轻劳动，这样我们就互相认识了。他来到车间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叫武燕的，也是右派分子上升为反革命的。他说：他被划右派就是我审批的。这下倒好：审批右派的人和被批右派搞到一起去了。赵心里怎么想，无法猜测。但是，从他的表现来看，当然是十分不满意的。阶级斗争就是如此：每次斗5%，七斗八斗以后，就有好几个5%的人被开除出人民队伍，变成了反革命或什么分子。最初斗别人的人后来又和被斗者在一起劳改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遥想当年批斗胡风的时候，周扬扬极一时，成为毛泽东派驻文艺界的奴隶总管。但曾几何时，这个周扬也被关进曾经关押过胡风的秦城监狱。这些事情雄辩地说明：在极权政治统治下，人人自危，朝不虑夕。

赵革东的特长是能够熟练地背诵毛的全部诗词，并且有很好的记忆力。我们有的时候就在一起切磋起诗词格律方面的学问，当然是以毛的诗词为“教材”，以免遭别人误会、打小报告。他和那个武燕见面也打个招呼，但是不多交谈。而武燕对他也没有什么恶感，因为武燕当然知道，这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是当时的大趋势决定的。

5、程远也是小一中队里的成员，原来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科长，宋振庭的部下。他知道许多关于宋振庭的逸事，例如哪篇重要文章是如何出炉的，哪篇文章是谁主持起草、完成的，后来的稿费又如何分配等等。他的罪名也是反革命集团，而且是叛国集团。这个集团和赵革东他们不是一回事儿。这就说明，在他们小一中队几十个人里至少就有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集团的主犯是吉林省最大的发电厂——小丰满水电厂的党委书记（姓李），此人也在我这个车间里劳动。

程远的特长是美术，各种字体都行，因此宣传方面少不了他。早在小一中队里，虽然没有交谈过，但和我见面总是点点头，表

示好感。估计他也听说过我这个人的一些事情（诸如逃跑啊，大学生啊什么的，还有就是上诉改判之类）。后来在文艺组搞国际形势展览，他们当然也要来听，自然就认识我了。我和他的关系还是在此后发展的：他就业期间被分配到6分场，而且颇受到管教干事的器重，有单独的工作室，当然是画画之用。在1979年，我和一大批就业人员从“金宝屯农场”调回来后（按：金宝屯农场在四平市附近，原来是知识青年下乡的一个点，后来上级决定取消这个点，就调我们这些就业人员去接替，但是，知识青年坚决不答应撤走。双方僵持了半年左右，还是我们撤走，回到原来的镇赉县四方坨子农场）也被分配到6分场来。因为他有一定的基础，熟人多，我是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以借他许多光。此其一。

其二是后来他落实政策回家——吉林市。1979年前后吧，我上访时路过吉林市，特地去他家里拜访。这时他仍然搞他的美术工艺，归居民委员会管理。他还打算给我介绍对象（是他妻子的什么侄女，从事会计工作，因为腿部有些不便，30多岁尚未婚配），可惜没成功，对方一听说是“就业的”，不答应。如果成功了，我还应该称他为“叔叔”吧？

6、**张沛远** 某中学的地理教师，但是文学水平很高。我的许多文学知识部分地来之于和他的交谈中，尤其是古典诗词、格律诗（什么五言律诗、绝句，七言律诗、绝句、乐府、古风等等）吟诗、填词中的平仄音韵等问题……。总之，如果说，我在文艺组那几年等于上了几年大学的中文系，但是没有教师；而在这个期间，遇到这个张沛远，就等于是遇到了辅导老师。他的犯罪主要是下放期间，有婚外恋，并且密谋共同外逃到朝鲜去度蜜月。这样，性质就变了，成为反革命分子，判刑15年。有两件事情值得记下来：其一是有一次休息时间，管教叫大家唱歌，有人提议：有文化的人先唱，带个头。这个要求落实在我和张的头上，

我们就选择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支歌本来是非常熟悉的，可是正因为熟悉，也就没有怎么太在意，只是心不在焉地随便唱几句敷衍一下而已。在敷衍的过程中就出了大错：我们是一人唱一句，我唱了上面一句，该轮到他接着唱：“牛鬼蛇神一片惊慌”，可是不知道是不是鬼使神差，他却弄错了行，把上面一行“牛鬼蛇神”接着下面一行的“无上荣光”连在一起唱了。（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不是我亲历，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以为是杜撰吧！为了记忆这段往事，特地翻阅一下最新出版的歌曲选本，查核一下他当时是如何唱错的。可是新出版的歌曲选本已经把“牛鬼蛇神一片惊慌”改成“五洲架起友谊桥梁”）

当时我就发现他错了，并用肩膀碰他一下，他却并没有发觉，一直棱在那里等我接着唱。但我没法、也不敢接着唱下去了。这时，站在一边的管教也马上叫停。事后，找他谈话。怎么谈的，我就知道了。反正是召开大会，批斗了几个小时。要他承认：平时在内心就是这么唱的，这次只是真情的流露而已。他当然不敢这样承认，只是承认不认真，随便敷衍，如此等等。后来也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情更有意义。他因为大量咳血而住进了病号室，经过全面检查，发现是肺气肿。又过了些日子，他托别人捎信给我，要我去他那里见一见面，我去了。他噙着泪水对我说：这恐怕是最后一面了。监狱方面告诉他，让他保外就医，并且不日就要走了。

监狱给予“保外就医”待遇，说明已经病入膏肓了，为免于死在监狱里，增加死亡率，监狱才准予“保外就医”。临别时，送给我一部旧版的《辞海》。他还说：我看你很喜欢这部书，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这部《辞海》伴随着我度过了许多个春秋，给了我许多知识。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附录于本章之后。

还应该提到，在我这篇文章发表以不久，收到《光明日报》编辑部转来的信，是原吉林大学教授徐利治写给我的。他说看到我的文章，就想起了我当年在学校里的一切。他还说，我的文章里有血有泪，令人感动云云。这样我又和这位当年就很有名的大教授恢复了联系，互诉衷肠。

7、**彭绪一** 早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因为闹学潮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后来参加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受伤后回国。因为受彭德怀一案的牵连而被劳动教养三年，解除教养后就业。在镇赉县四方坨子农场 8 分场劳动。因为抗拒改造而送入“学习班”严管。在开始学习时，每人作自我介绍。他是这样说的：“我叫彭绪一，彭德怀的彭，光绪皇帝的绪，一二三四的一。”这样的“自我介绍”令人耳目一新，也使我另眼相看，不久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落实政策前夕，我们又都在杉松岗煤矿的洗煤场劳动，都知道上面有了 11 号文件，还有个 55 号文件。但是，暂时尚未轮到我们的头上，都非常着急。他先请假去北京。回来后，他很有把握地说：没有问题，只等着吧！并且鼓励我去长春上访，如果不行就上北京去。他还把自己曾经使用过的大信封借给我用来坐免费火车。这个信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上面写着“黄克诚大将收”几个字。他说：就是凭这个信封，一路绿灯放行，还可以免票乘车云云。我虽然接受了这个大信封，但是一直没敢用，因为害怕露馅儿。

落实政策以后，他一直住在北京五棵松的某处（多年没有联系，地址也忘记了），1985 年夏天，我因事路过北京时，专程去拜访过他。他也成了新家，夫人是一位地道北京口音的老处女，还给他生了一个女孩子。

8、**马某某** 是我在“就业犯”的最后一个岗位——杉松岗煤矿洗煤场共同劳动中的伙伴，相互没有什么交情。他有点瘸，因此被称为“马瘸子”其名早忘。为什么写他呢？因为据彭绪一说：

他是外贸部部长卢绪章的秘书，他被劳动教养的理由是“耍流氓”。怎么个耍流氓呢？据说是给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写信表示爱慕之情。这可真是色胆包天了。但是，仅仅给一个国家主席的老婆写信求爱，也不至于犯罪吧？爱一个女人，这是任何男人应有的权利，你接不接受另当别论。你不接受，我又没有强迫你。这个行为应该不构成犯罪吧？

后来我查了一下书籍，发现历史上这样类似的事还很多：例如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楚庄王，夜宴群臣，兴之所至，大家翩翩起舞。恰在这个时候，蜡烛熄灭了，一片漆黑。有个大臣也是色胆包天，竟然伸手去拽楚庄王爱妾的衣裙，意图不轨。这位爱妾一手扯下对方的帽缨，交给楚庄王，请予严惩。不久，烛光复明。这个时候要找出那个色鬼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只要看谁的帽子上没有缨子，就是他了。可是，这个楚庄王真是了不起！宽容大度地命令：所有群臣，一律把自己帽上的缨子扯下来，大家同欢吧！这样，那个胆大的臣子才摆脱了尴尬，恢复了平静。若干年后，吴国大举进攻楚国，在国家危急的时刻，有位大将奋勇向前，所向披靡，大破敌军，立了大功。受勋的时候，他坦白说：我就是那个被扯下帽缨的人，承蒙您的宽容大度，今天特来报答！⁹我们假设，当初如果把这个臣子杀了，或者关起来惩办，到了危急的时刻，谁来出力保卫楚王的宝座？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宽容，谁就收获忠诚。

好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好一段令人回味的佳话，好一则发人深思的趣闻。像楚庄王那样宽容大度的人，今天大概不会再有了啊！

如果说这是古代的故事，那么，还有现代的佳话：有一次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检阅军队，有个下级军官跑到宋美龄面前，

⁹ 见《韩诗外传》卷7，《辞海》有“绝缨”一条，可参考。

抓起她的胳膊就是一顿狂吻不止，后来被大家拽开并捆绑起来，本来打算问罪。可是，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宋美龄，亲自审问这个军官，“你为什么如此失态？”军官回答：“因为我非常崇拜您！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的崇拜心情……”宋美龄说：崇拜一个人还构成犯罪吗？不能。于是当场释放了这个军官，并提升他为卫士长。瞧！什么叫宽容大度？请看宋美龄就是。

再补充一个最新的例证：今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前总统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竞选下一届总统。她在加里福尼亚州的某城发表竞选演说的时候，有位男性听众在台下大喊：“亲爱的，希拉里，我爱你，嫁给我吧！”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冒失鬼，希拉里的表现就非常得体：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如果我接受你的爱，就会因为犯重婚罪而坐牢。”没有尴尬，更没有愤怒和谴责，显得多么优容大度！什么叫宽容？什么是气量？请看希拉里。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说得好！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立即分别出高下：古人、今人，都有非常生动的榜样在。为什么他们那么宽容？因为他们有自信，相反则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一个普通干部写了一封求爱信，难道就能够把一个领导干部的老婆勾跑了吗？不至于吧？太小家子气了，也太霸道了。

9、**王永铎** 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同学，他比我低一个年级。在学校里并不认识。直到1970年的冬天，我从八分场转移到5分场，在第二天早晨准备出工时，他走到我的面前问道：“你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还记得七宿舍吗（七宿舍就是我们在学校里所住的地方）？我明白了：你也是吉林大学的呀？他才自我介绍说：我也是经济系的，比你低一个年级。这样才慢慢地接近起来年。

他也是被划为右派，在学校里的农场劳动。期间又因为参加



作者和王永铎（左）1980年在吉林大学重聚首。

“百花学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被送劳动教养三年。又因为参加了什么叛国集团，被判处5年徒刑。看来，他是分三步走，而我则是一步到位，最后都到监狱里会合了，这叫“殊途同归”。

1971年春天我出狱以后，他还在监狱里。后来释放，也留场就业。不过比我强的是，不带反革命帽子，是正式的公民，有所谓的“选举权”，如此而已。

在五道江煤矿劳动时，他由于深得就业队干部的信任，被指定担任大伙房的小组长、兼采购员。经常骑着自行车上街办事，当地的老百姓都以为他是管理员，是干部，颇为风光。

1979年落实政策时，我一直没有希望。因为据说我的性质变了，升级为反革命，不在改正之列。但他却回到学校里办理这件事，因而暂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忽然有一天接到他的来信，叫我赶快来学校里。据说他见到通化师范学院的人事处长，这

位处长希望他落实政策以后就到他们学校里去工作。他不失时机地打听其他人的进展情况。据说学校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叫“55办”因为是落实55号文件而设立）的人告诉这位处长，胡显中也可能改正云云，并且把胡的档案都给这位处长了。

接信后不敢耽搁，马上请假赶赴长春。以后的事情另有记述，在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他为我提供了重要信息。还有就是，当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找我下发《刑事裁定书》时，由于事先没有告知，我不在招待所里，一时找不到人。为了免于耽搁，他马上跑到学校的图书馆里把我找到。真是“知我者，王永铎也！”他就知道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唯一的去处只有图书馆。

可惜的是，在落实政策、安排工作、结婚生子、解决住房不久，1985年他竟然撒手西归。病因可能是脑溢血吧？据他的妻子李女士说：晚上他感到头痛难受，就要求她为其挤头。后来严重了，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租车，等到天亮再找人送医院，已经无力回天。为了纪念他，我曾经写下了《悼念亡友》一文，被收录在华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新中国的一日》这部具有史料价值的书里。

在这篇短文里是这样写的：我和他都是“五七战士”、“北大”同学”。开头的这个说明，真是越说越不明白。再往下才揭开这个谜底：原来所谓“五七战士”并不是“文革”期间走五七道路的意思，而是说：我们都是57年被打成右派的同难者。再来看所谓“北大”同学，那是说：我们都在“北大荒”的同学，共同的专业是“修理地球”。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互相称呼，并以此取笑、自嘲。对于这段遭遇，颇有点泰然自若的样子。

10、**俞国敏**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具体案情并不清楚，他是我在杉松岗煤矿所认识的朋友。接触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对我特别有好感，互相交谈了几次，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我落实政策后，回杉松岗办理手续时，他特意邀请我在一家小饭馆便饭（在

坐作陪的还有李英华和另一位，现在已经忘记其名字）。临别还送我几首诗和一本《古文观止》，这本《古文观止》是我现在案头的必备之物。虽然同样的书已经有好几本，但是，我还是喜欢用他送我的这本。这不仅仅是因为友谊长存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这个本子是 1963 年版，也就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那个时候出版界的作风还是比较严谨的。而书架上摆放着岳麓书社 2002 年出版的那本是豪华本，好看却不实用，太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每当我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想起这位朋友的音容和语态、风度。他送给我的诗有以下几首：

其一（写在我的笔记本上，1979 年 7 月 14 日）

吾友高君铁军、李公英华者，每与吾会，谈及君事，相对唏嘘，多有同感！苦于心灵之寂寂。时震兄偶得〈唐诗别裁〉，大喜过望，问及书主，震曰胡公云云，爱之，慕之，渴于求见。李之疲惫，多误吾望。伊亦云胡公事，吾动遐思，更有慕君之情。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

近日，薄酒初会，谈吐投机。恨生计所迫，行色匆匆。拜读胡公显中大作，感于斯言，聊奉诗词一首，不成体统，权达寸衷耳！诗云：

览君古今篇，满纸辛酸言。一掬悲喜泪，悠思结万端。
君历坎坷事，谁人不亦然？感愤溢言表，沧海两翩然。展诗泪纵横，杯酒且宽言。翻飞云复雨，逆旅一瞬间。常作桃园梦，努力加餐饭。（调寄梅花引）

其二（另纸，1980 年 8 月）

庚申七月十五，与挚友胡公小桥握别。噫嘻！知音骤失，

怅然，沉吟良久。以词抒志，寄赠胡公，兼示英华、国营二位：

别情依依小桥头，互道珍重，更添思悠悠。从此心怀常忆君明眸。相切磋，细论文，道同谋！登高望春城，我举杯，邀君来，君知否？

* * * *

这篇回忆完成以后，又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当时我所写的两首诗：俞君饯别席间有感：

其一：

20 载辛酸史， 一曲长恨歌，
赤子忧国心， 暴君欺民谋。
热肠酒共泪， 冷眼山与河。
与君一席话， 翘首望汨罗。

其二：

黄金岁月狱中过， 颠倒人妖往事多。
岁岁年年人相斗， 家家户户泪成河。
国将不国家何在？ 人已非人叹逝波。
杯酒盛情动客心， 秋风易水共君歌。

东风送来春消息

求爱失意给我带来的沮丧和懊恼，很快就被另一个特大好消息所淡化、驱散、弥补，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个好消息就是所谓的“11号文件”。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是北京籍的就业分子回京过端午节时听说，回场后就传开了（按：11号文件是1978年4月出台）。

其实，这个文件只是要求给全部右派分子摘掉“帽子”而已，并没有后来的所谓“改正”措施。据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他看了这个文件就觉得不解决问题，因此建议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复查平反。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批准了这个建议，这才有1978年9月17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也就是后来大家所津津乐道的“55号文件”。事情的发展总应该有个过程，人们思想解放的程度也会出现前后变化，变化的趋向当然的越来越开放、越进步、越符合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

这个时候，我听到两种绝然相反的声音：许多朋友都说些恭维话：老胡将来要回去当什么教授了；胡老弟将来发迹了可不能忘记患难朋友呀……之类。可是，从干部嘴里说出来的却相反：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不属于右派，已经升级为反革命了，也就是所谓“大尾巴右派”（东北口音把“尾巴”二字读成“以吧”）；更进一步警告我说：你不要硬往好事上贴，没你什么事儿，还是老老实实地改造吧，别的就甭想啦！

听了这些议论和警告，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很难相信哪个意见更准确，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应该先做起来，我立即给

吉林大学经济系领导写信，说明我离开学校以后的全部经历，并且核实一下外面的传闻。这封信委托一位要好的朋友去四方坨子（总场所在地才有邮局）办事时顺便寄出，并且交代他一定要用挂号寄。朋友回来以后，我向他索取挂号收据时，他一脸茫然。后来才明白，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挂号，直接扔进了邮筒。这位朋友还是个高中生哩！我只得叫苦不迭，另外再写、再寄。

不久，总场管教科的干事石振邦来八分场办事，被我偶尔碰到，便向他打听。他也是这样说：“你不是反革命吗？怎么一下子又变成右派了呢？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干吧，想别的都没有用。”我还是锲而不舍地向他说明情况，终于得到他的同意，替我问一问。我于是马上又写了一封致吉林大学经济系领导的信，请他代为发出。顺便说一下，他还向我索要2毛钱的邮资（当时的挂号信每封2毛）。

总之，我做了一切能够做的努力。1979年的元旦，兴之所至，还填了一首词：

渔家傲

东风吹得万山碧，
东风送来春消息。
世道人心谁能敌？
忆往昔，
一曲长恨歌声急。

壮志当酬在今日，
献身四化争朝夕。
几番请纓又碰壁，

长叹息，
志在千里空嘶枥。

最后一次被关小号

这一年的秋天，我和一些就业分子又被转移到杉松岗煤矿。回忆 20 年前的冬天，劳改队准备把我和几百个犯人转移，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杉松岗煤矿。我的同学、化学系的何鼎深也在被调的名单中，去了这个地方，并且死在该处。我则因为逃跑而被关押小号，没有去成。这次又要去那个鬼地方，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到了那里，就要下井挖煤。

这个时候，就好像是长期在黑暗的隧道里生活，眼前发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光明就在前面。如果在这个时刻却不幸死在井下，岂不是太遗憾了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我向干部提出，因为有关节炎，不能下井劳动。一次不行，再提一次，第三次……还是不允许，我干脆生起病来。干部当然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是思想病。他们采取了强硬措施：给我两个选择：要么下井，要么就去小号里呆着。

好的，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因此再一次被关押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被关押小号，也是唯一的一次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

由于刚刚建立，小号的管理很不到位，非常松懈，不仅可以和外面的人说话、联络，还可以托人到外面买食品……在这样的日子，我又可以不断地构思、修改自己的小诗。现在就根据记忆把当时所吟的一首“自白”抄录如下：

某本江南一少年， 洪都故郡赣水东。
百花洲畔书声朗， 滕王阁边诗兴浓。
十三登台逞辩术， 十六报端露文锋。
父友宴前试章句， 嘉宾酒后议鸾凤。
南昌解放欣从戎， 投身革命为工农。
老父霜鬓强挥手， 慈母送别泪如涌。
“革命岂能恋家庭， 私情哪有前途重？”
毅然策马挥鞭去， 引吭高歌“东方红”
扬子江边叹逝水， 黄鹤楼前心潮涌。
南岛耶林歌一曲， 翠亨古迹仰英风。
更喜北国风光好， 苦读寒窗四秋冬。
语罢常令四座惊， 篇成每被师友颂。
欢庆桃李杯未干， 身陷铁窗犹疑梦。
屈指对影说功过， 翘首长空诉飞鸿。
鸿毛轻生未足取， 蒙垢常忆太史公。
半生余年岂虚度？ 一腔热血待东风。

此生活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是考虑到井下劳动的危险性，我还是宁愿这样呆下去，就算是把牢底坐穿，我也心甘情愿，决不出去卖命了。

我有决心，但是，他们却没有耐心。过了 10 多天以后，还是把我放出来，让我到洗煤厂劳动。

过去，听说过洗衣服，洗车子……却没有听说有洗煤的，煤本来就是黑的，还用得着去洗吗？又怎么能洗干净呢？我倒要来见识见识。原来为了供应炼钢厂的优质焦炭，需要先把煤“洗”一遍，洗过的煤没有任何杂质，才能够送去炼焦。用什么来洗煤呢？当然是用水！

在洗煤厂，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里是轻劳动，大都是

年老体弱、或有病不能下井的。比较起来，报酬当然也要低得多。下井的工资大概是每天 1.85 元，另外还有井下补贴，每月可以拿到 70—80 元，每天升井以后，还可以领到一个四两重的大面包。而在洗煤厂劳动，每天只有 1.32，每月只能拿到 30 多元。虽然这样，但我已经非常知足了。

就在我们被分配到洗煤厂不久，井下果然就发生了事故，死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听说这里赚得多，再三要求来这个地方劳动。这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是如果我们把“财”看得轻一些，岂不就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死亡的概率吗？甚至可以完全避免。人啊人啊！醒醒吧！

“三项半”的外号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给各种“有帽的”摘掉“帽子”，其中当然也包括右派分子。按照惯例，摘帽大会后要座谈，无非是希望听到一些歌功颂德的“马屁经”。我忽然心血来潮，想试一试我这个摘掉了帽子的人有没有发言权，如果有，有多大的发言权？于是，放了一炮：我衷心拥护四项基本原则，但是，这四项里面，不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理由是：1、毛泽东思想里面有许多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否则，我们就不必拨乱反正。既然如此，这个有许多错误的东西，怎么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2、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包括老革命家，这个过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随便淡忘的。这样的人物，是非和功过还没有分清楚的时候，怎么能够确立他的指导地位呢？所以，我只赞成三项半，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这一条。

随后，有个什么官员（具体职务和姓名都忘记了）在一次大会上不点名地提出了严厉批评。还说，我们一查，原来他是个右派分子，刚摘掉帽子，就这样胡说八道。我们警告你：摘了帽子

还可以再带上的，你不要太嚣张了。

本来，那位在铁北劳改队里见过一面的刘干事也在这里，据说还对我另眼相看，正打算把我调到当地的中学去教书。这一来，教师是当不成了。在刘干事家里，他非常气愤地批评我说：“本来挺好的事情，叫你自己硬给搅黄了（东北方言：把好事弄坏了，就叫“搅黄了”）你的事情，今后我不管了，你就这样呆着吧！”他这一番话及其神态，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当然，以后我离开杉松岗时，他还是请我到 he 家里吃了一顿便饭，这可以说是在干部家里吃的第二顿饭。吃饭的时候，我和他二人坐在炕上，其余的人都站在地下。嚯！好几个孩子，他可真能生呀！够得上是生育模范了。

从此以后，我得了一个外号——三项半。凡是这个时期在杉松岗就业的，见到了我，不叫我的名字，而称为“三项半”。我回答说：三项半怎么样？还有“三项”的人哩！宗教信仰连马克思主义都不相信，难道不是只相信三项吗？

在我平反并恢复工作以后，基于上述思想，写成《毛泽东思想应该成为四项基本原则吗？》的长文，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这是当时的思想水平，如果今天来写，恐怕就应该写成《四项基本原则应该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本吗？》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是四位一体的东西，应该全部否定。

在洗煤厂劳动，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吓了我一大跳。洗煤厂的核心是安置在地下室里的一台大马力电动机，据说这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本来是由一个老年人看守。那天他轮休，由我代替。刚上班不久，地面上来电话命令启动电机。当我合上电闸，发现冒烟，立刻爬楼梯上到地面，再跑到电工室报警；等电工跑回地下室，已经过去好几分钟的时间，电机烧坏了，我也吓傻了！

几分钟以后，厂长来了，面对着烧坏的电动机，木然许久。

最后对我说了一句令我胆战心惊的话：这台电动机运转了十多年，一些女孩子都能看管，没出过问题，没想到却坏在你的手里！你呀，你呀！然后转身回去了。车间主任和干事相继而来，简单地问了几句，就劈头盖脸地批评起来：“你还是个大学生哩，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很简单嘛！它冒烟，你就不会把闸拉下来？拉下来不就完了吗？什么事也没有嘛！这下倒好，全厂停产，这个损失你怎么赔得起？这台电机至少也得几十万呀！……”

我在心里也直打鼓，躲避了死亡的危险，又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弄不好的话，破坏生产的帽子戴上，就不得了。眼看着光明就在前面，可光明似乎并不属于我？

当天中午，我被勒令“反省”，写出深刻检查。

第二天，电动机修复了，恢复生产。全厂停产一天，损失是多少？修理费用又是多少？我也算不出来。头上悬着一把利剑，会不会掉下来？我茫然。

又过了几天，我被告知：恢复劳动。再以后，似乎没有什么处分了？我也奇怪。这个月发奖金时，没有我的份。这倒也应该，如果仅止于此，那就要烧高香了。怕就怕“耗子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

后来，据车间主任说：算是便宜你了，多亏了刘厂长呀，他在会上说：如果他是学理工科的，那可要处分他；因为他是学文科的，不懂。原谅他无知！

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地，好险啊！我忽然想起来在京剧《空城计》里，司马懿撤退以后，诸葛亮从城楼上走下来，用手抹去头上的汗水，说了一句台词：“好险啊！”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大都是如此：说大就大（说你“破坏生产、阶级报复”也能够说得通嘛），说轻也轻，全看是谁说了算。这也可以说是“弹性原理”吧！总之，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也没有永远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短暂的。君不见，当年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什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原子弹，今天看来完全是一场骗局而已。多么可笑、可耻、可悲！

这位厂长姓刘，又是一位姓刘的好人。临离开该厂时，我专门去拜望这位刘厂长，可惜，他赴外地开会，无缘见最后一面。好人啊，好人！

还有一次，刚下班时，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孙某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问：你认识一个叫陶懋颀的吗？奇矣怪哉！忽然间怎么问起这个？多少年没人提到这些陈年旧事了。我回答：他是我中学的同学。他又问：还有别的关系吧？答：有，我是他入党的介绍人。对方一听，顿时露出惊奇的神态：你还是共产党员？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天外来客、外星人。于是我把 30 多年前的事情简单地介绍了。最后，他要求我写个证明材料。至此，我才知道陶懋颀还活着，而且正在解决党籍的问题，这也可以算是一件幸事吧。至于亲眼见到阔别 20 多年的这位老同学、老战友，则是在若干年以后的北京。他的右派问题早已经被“改正”了，又回到学术界，正在北大开学术会。我和他在其母校未名湖畔漫步，谈到我目前上访仍无头绪时，他说可以帮我一点忙，让我写个材料，他替我交给胡启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启立”在名字。几天以后，材料写好再次去北大交给陶，是不是起了作用？似乎还不好判断。因为以后我的事情也逐步解决，以至于最后解决了。至于哪个方面起的作用？其中内情也无从查考了。

最后一个春节是这样度过的

很快就到了 1979 年的春节，这是我在就业队伍里最后一个春节。怎么度过呢？太……太特殊了。特殊在哪里？

就在大年三十的下午，杉松岗全镇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用水管

道坏了。如果不及时修好，全体居民明天煮饺子的水都没有，情况危急。这个任务当然落在洗煤厂的头上，厂里指派 10 多个人远赴几里地以外的旷野，具体任务是：刨开冻土层，然后由技术工人修复管道。当我们被汽车拉到工地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家家炊烟袅袅。“开始吧！”带领我们前来的正式工人命令道。我们 10 几个人轮班挥镐，刨呀，刨呀！一直干到晚上 11 点左右，已是饥肠辘辘，需要补充热量了。我们随车带来了许多焦炭和面包。焦炭用来生火取暖，面包虽然可以充饥，但是口味也太差劲了。于是，选两个比较会办事的人，设法搞些可口的东西。到了午夜时分，我们被分成 4 批，每批 3 人，被领到附近一个老乡家里，年夜饭早已预备好：大米饭、猪肉炖白菜，几乎没有什么佐料，可也吃得很香，饥不择食嘛！这就是我们这些人除夕夜的晚餐。

下半夜，寒风飕飕，烤火只能烤前面，后面仍然感到寒冷。忽然记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诗句，这个时候才真实地感受这句诗的意境。

在我们分批吃饭的时候，技术工人也把水管修好了。我们又把土填回去，就算完成任务。当我们回到镇上，已是天色熹微，黎明到来。全镇老百姓又可以用上自来水，可以煮饺子了，我们也该进入梦乡。

在就业队里最后一个除夕就是这样度过的。

漫漫上访路

春节过后不久，再次出发。车到长春已是晚上 10 点多，那个时候已没有工交车了，只得迈开双脚，硬是走到吉林大学。值夜班的是校长办公室的干部尹殿海（后来，我上班在经济系办公室管理教学工作虽然没有名分，但是，每次学校科研处，或教务

处开会总是通知我参加，就算个教学秘书吧，而这位尹殿海则是法律系正式任命的教学秘书，我们又成了同事。再后来听说他去世的消息，不胜感叹和悲凉！)

尹殿海问明我的身份以后，开了便条，让我去招待所住下。辗转找到招待所，快到午夜了。打更的老头非常恼火。他问：都什么时候了，还让不让人睡觉啦？我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老大爷，我是来上访的，来落实政策的，请你开开门吧！一听我是来要求落后政策的，他才起身为我开门，登记，把我引入 105 室。进室一看，他们早已入睡，可是经过我和老头的对话，全被吵醒了，一个个瞪着大眼睛，要看看进来的是何人。这一看，许多人都还认识：法律系的讲师 米超群，是 50 年代从美国回来的，当然被打成特务。在监狱里见过几次，没有深谈。中文系的李继学，还有记不起来了。总之，这个 105 室全都是来落实政策的。大家又聊了一会儿，才相继睡去。

第二天，到学校里找到“55 办”（即落实 55 号文件的办公室）有三位干部：化学系的李绮思、法律系的李方志，校长办公室的张某某（女）。他们都非常热情、友善地和我交谈，先问了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再问现在住在哪里？……最后，接受了我的申诉材料，并且安慰我说：既然来了，就安心在这里等着吧，有时间可以到学校的各处走走，看看学校的新面貌云云。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告诉我：你的问题不能改正，因为胡风的问题仍然没有新的结论。为此，我又去了长春市委宣传部，一位姓李的干部也是同样的回答。于是，我只得暂时回到杉松岗，徐徐图之。到了夏天，朋友送给我一张几个月前的《人民日报》，上面登载了一条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公安部 63 名右派全部被改正了。再加上许多其他的传闻，心中蠢蠢欲动，于是再次上访。

我知道，问题不在长春，不在吉林大学，而在北京。因此这

次不得不远赴北京。到了北京，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北京之大，“居大不易”啊！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就有好几位原地下党的朋友（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位陶懋顺，他当时还在内蒙古，后来才奉调进京），可是当时还没有恢复联系，更无法查找他们的地址。怎么办呢？原就业队里的一位北京籍朋友帮忙解决了，就是在一个工棚里，他有一个铺位，让给我临时住几天，他则回家住，来回上班需要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吃饭问题倒是好办，随便找个小吃摊就可以解决了。

当时正值夏季，赤日炎炎似火烧，终日在外面奔波，口干舌燥。举目四顾，西瓜和冷饮有的是，但是，摸一摸自己不太充足的钱袋，再想一想未来上访之路仍然非常漫长，想来想去，还是一个“忍”字，硬是舍不得买来吃。就这样在北京苦苦地等待了好多天，终日辗转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好几个单位，最后在统战部被正式受理。原来这个事情正好归其管辖，当时是这样归口的：统战部管三种人：右派、资本家、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而宣传部则管原文化、艺术、教育系统的人。组织部则管党委系统的人。

在统战部的大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龙蛇阵。排到了，先登记，再递材料，然后回去等待。过几天再去查询结果，又是一个大信封。拿着这个信封回到吉林大学，就算是结束。

在统战部门口排队时，我遇到一位年纪很轻的女士，她看我登记的地址，知道我是从长春来的，就主动说话了。一问才知道：她就是东北师范大学大右派徐乃祚教授的女儿，并告诉我：其父亲已经去世了，她当然是代表家属来讨个公道的。

这个时候形势大好，听说胡风先生也被释放了（后来看到正式材料，胡风先生早在1979年1月就被放出来了，6月还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可是我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才通过小道消息获知）这更增加了我的自信：一定能够平反！

吉林大学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当我正在苦苦等待的时候，忽然接到同学也是难友王永铎的来信，叫我马上回校。当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吉林大学时才知道：通化师范学院的人事处长来学校里要人，并且和王永铎谈过话，希望他改正以后到他们学校去教书。在谈话中并透露：据“55办”的人告诉他，还有一个人正在办理“改正”的过程中，此人很有才，但是遇到一点小麻烦，不过还是有希望“改正”的，只是需要等待些时间云云。王永铎迫不及待地追问，这个人是不是姓胡？对方笑而不答。其实，从他的笑声中就已经作了回答。所以他才立刻给我写信，督促我快回学校，别错过这个机会。

话虽是如此，但是，真要拿到那张“改正通知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问题在那儿呢？问题就在于：胡风先生已经释放，但还没有正式平反；此其一。还有就是我到英国代办处要求出国的事情，仍然是个很大的障碍，他们认为这完全是叛国行为，不能改正。因此，直到1979年年末，还没有结论。

1980年元旦，我特地跑到校长（党委书记？）胡绍祖的家里，首先是向他拜年，其次才说到正题。一开始就自我介绍说：我是本校至今仍然没有改正的、唯一的右派分子……同时递上写好的材料。胡绍祖回答说：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等我问明白了再回答你，好吗？

又等了几个月，我有些不耐烦了。终于向“55办”的人提出：如果不改正，请给我一张“不予改正”的正式文件，我好另做打算。我的计划是，拿到这张“不予改正”的正式文件，马上就进京，再度上访。当然，我也不希望走这一步，只不过是叫板而已。

“55办”的人都非常和善，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人都抱有极大的同情心，也都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并且都希望早日为我们解脱。问题就出在那个党委副书记张德宗，他原来就是造反起家的极左分子，当然对我的问题决不轻易放手。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提出这个要求。可是他们既不给任何“不予改正”的正式文件（没有充分的理由），又不“改正”，就这么拖着，可我拖得起吗？

那个时候还听说有个说法：有人请示邓小平：是不是全部改正？邓回答说：毛主席定的事情，还是留几个吧！（这叫什么理由？就因为老毛决定的事，所以就要留几个来证明其正确？）于是，似乎各个单位都应该“留几个”作为“样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即使吉林大学只留一个，也是“非我莫属”了。

难道我只能束手无策吗？不行，我应该有所作为，什么作为？我的武器只有一样：笔！

上书邓小平

在给邓小平的信里，我是这样写的：（这份材料是复写的，我保存了一份。现在摘要如下）

今天，您又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广开言路，要实行三不主义。我衷心地拥护，一万个拥护。我更相信你决不是再搞“引蛇出洞”的阴谋把戏，你是诚心诚意要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广开言路吗？请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取信于民。一句话：兑现！

怎样兑现？陈云同志说得好：平反冤假错案是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四化的先决步骤（1978年11月12日）反右斗争

是一个全国规模的大错案，必须首先平反、全部平反。无论当时人们的言论和文章正确与否都不构成犯罪。

1、《北京之春》1月号有篇文章说得好：既然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应该再提另外的标准（不管是六条或八条，都没有必要）。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时所抓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和文章大部分是对的，或基本上是对的。

2、既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提出六条标准，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再用六条标准去打棍子，还谈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3、六条标准公布的时间更值得深思。1957年春天内部传达时没有提什么标准，反右开始以后，6月19日报纸正式公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才将六条标准加上去。用今天公布的标准去衡量人家昨天、前天的言论和文章，难道不是“不教而诛”吗？“不教而诛谓之虐”这是古代大思想家孔子的话。奴隶社会的思想家尚且能够主持公道、顾全起码的道德、信义，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竟然出现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虐杀，这是文明还是野蛮？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民主还是专制独裁？天下自有公论。

所以，反右斗争实际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大迫害，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所谓右派，完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是封建社会文字狱的现代版，是“引蛇出洞”阴谋的受害者。这是开国以来最大的错案。必须公开宣布全部、彻底平反。这个实际行动要比一火车的宣言、社论、讲话更有价值，更有说服力，更能收到实效。

当你和华国锋、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之日，如果不能大刀阔斧、排除干扰，抓紧做好这项工作，将来不幸辞世

之日，何以慰先烈？何以告后人？何以向历史交代？

正如一篇政治幻想小说《2000年的悲剧》里所说：“30年以后的评价是无情的”，说得好极了。这不仅仅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子孙万代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关乎你们这些开国元勋的身后评价、历史地位的大事情。如果能够立功于当代、遗泽于后世、流芳于千古、彪炳于史册，开创一个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崭新时代，则天下幸甚！

当然，我也设身处地为您和你们各位老革命家考虑，要这样做，必需有更大的魄力。因为这涉及对大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你们怕担一个“赫鲁晓夫”的恶名，“凡是”派关于“砍旗”、“变修”之类的谰言狂吠，使你们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请本着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精神来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反思一下：

大人物是不是“常有理”？

大人物如果有错误，应不应该公开承认、彻底改正？

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我只能同意三项半。我也准备随时被再度打成右派、反革命。尤其最近读了关于张志新的材料更增加了我说出自己观点的勇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封建时代的文人文天祥有这样大的气派和胸怀，一个受过五四精神、又受过四五精神教育的人更应该有这种勇气。

请看今日现实：当年被大人物一一剪除的人（包括您自己）不是一个个都站起来了吗？都通过实践检验和证明是正确的吗？（刘少奇同志的平反也在意料之中）。相反，当年被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不是死的死、倒的倒了吗？当年被大人物所批判、否定的事物不是一件件都恢复过来了吗？相反，被他所肯定和赞扬的事物不是都一件件地销声匿迹、束之高阁吗？无论从制度的兴革和人物的沉浮来看，你

们已经事实上对大人物做了大胆的批判和否定（我一万发拥护）今天，唯一剩下的仅仅是一块完全没有价值的空头招牌了。难道为了大人物的威信和声誉，就要用一大批人的政治生命和名誉来做殉葬品吗？这样做太不公道的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这封信发出以后，又等了几个月，终于得到校方的一张“复查决定”，原文照抄如下：

关于胡显中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决定

胡显中同志原系我校经济系 1957 年毕业生，于 1957 年 9 月被定为极右分子。同年 11 月在查清其投靠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企图逃往英国的问题后，被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后加刑三年，刑满就业。

经复查，胡显中在 1957 年鸣放期间，发表过《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再论胡风问题》、《纵论国是、兼评鸣放》等文章及《至打手》等大字报，受到学校的多次批判。批判后于 7 月中旬去北京英国驻中国代办处，询问去英国的一些情况，企图逃亡英国。

胡显中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考虑到：他参加革命较早，在鸣放期间的言论虽有严重错误，尚不属于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去英国驻中国代办处的问题，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其目的基本上还是为了谋求生活出路，事后经组织教育，还能老实地交代问题，并且为此又服了十几年的刑期；鉴于上述情况，本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胡显中的右派问题从宽处理，予以改正。

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 1980 年 5 月 20 日（印）

关于胡显中同志右派问题的
复查决定

胡显中同志原是我校经济系一九五七年毕业生，于一九五七年九月被定为极右分子。同年十一月在查清其投靠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企图逃往英国的问题后，被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加刑三年），刑满就业。

经复查，胡显中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发表过《纵论国事》、《兼评鸣放》、《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再论胡风问题》等文章及《致打手》等大字报，受到学校多次批判。批判后于七月中旬去北京英国驻中国代办处，询问去英国的一些情况，企图逃往英国。

胡显中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考虑到：他参加革命较早；他在鸣放期间的言论，虽有严重错误，尚不属于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去英国驻中国代办处的问题，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其目的基本上还是为了谋求生活出路，事后经组织教育，还能比较老实交待问题，并且为此又服了十几年的刑期；鉴于上述情况，本着划清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对胡显中的右派问题从宽处理，予以改正。



胡显中右派问题复查决定影印本。

这份决定根本没有承认是“错划”，只是“从宽处理”才予以改正。我当然不能接受，但是，考虑到当时办案的顺序，必需先由原划右派的单位，给予改正，法院才能够受理，并予平反。

只好违心地签字同意。

两个月以后，收到了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80）刑监字第 233 号刑事判决书，全文如下：

申诉人胡显中，男，现年 48 岁，学生成分。江西省南昌县人。捕前系东北人民大学留校考察生。

申诉人因反革命罪于 1958 年 5 月 22 日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上诉后 1958 年 8 月 13 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改判有期徒刑 10 年。申诉人多次不服，提出上诉。经本院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审查查明：

原判认定申诉人 1957 年“散布反动言论和写反动文章，煽动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失实，其主要文章是发表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应该是允许的。其中错误观点是思想认识问题，并非出于反革命动机目的，其右派问题吉林大学党委已作了改正。关于申诉人 1957 年三次与英国驻京代办处接触的做法的错误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谋生，并无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原判认定“企图叛国”实属不当。据此本院特判决如下：

撤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58）刑字第 72 号判决和本院（58）刑上字第 95 号判决。

对胡显中宣告无罪。

1980 年 8 月 1 日（印）

从无期徒刑到宣告无罪，其间走过了 23 年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也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毕竟走出了毛泽东时代对内专制独裁、对外闭关锁国的可怕阴影，回归到世界讲民主、讲人权的大潮流中来。

在这里再追忆一段插曲：在上访期间，一直都住在吉大的招待所里。在这里，专门有一间 105 号的房子。里面全都是像我这样来要求落实政策的人。大家几乎形成一个习惯：谁被落实了，得了几个钱，一定要请这个房间里的难友们吃一顿，我当然也不例外。在吃过以后，不知道是谁提议：咱们照张像吧？几乎异口同声地同意，惟独其中一位坚决不同意，而且理由非常充分，我们只好作罢。是什么理由呢，请看我事后写的小诗：

不欢而散

（写于 1980 年）

（1）

风风雨雨廿多年，同窗好友再见面。
对酒当歌庆解放，促膝相倾肺腑言。

（2）

夜深握别复流连，盛会难再应留念。
人人挥毫题书册，滚滚诗情涌笔端。

（3）

惟独老李不以为然，语重心长动人心弦。
“吃吃喝喝都不妨，题书留念有风险。”

（4）

看今天万紫千红艳阳天，谁知道明天老天什么脸？
他年若再搞运动，这岂非留下罪证昭昭然？

（5）

密实策划狗胆包天，反党集团铁证如山。

到那时一个个瞠目结舌，一个个有口难言。

(6)

“前事不忘后事师，谨言慎行别冒险。”
从此分手各天涯，每念此事思悄然。

既然写点留念的文字都害怕，那么照相像就更不敢了。从这件小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思想是多么地胆战心惊、余悸未消啊！由此更不难知道我们的精神状态是多么封闭。这正是几十年的迫害所造成的后遗症。可见专制统治对我们的精神压抑太严重了。

* * * *

直到 1980 年夏天，才算是走完了全部司法程序，很快就恢复工作，回到学校经济系，在办公室做教学秘书的工作（但没有正式的名分）。

上班不久，我再次向校方提出那个复查结论的问题。原信如下：

吉林大学党委：

23 年前，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唯一的根据就是我写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到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是具有远见卓识、切中时弊的香花？我本人到底是一个右派分子，还是一个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敢于忠言直谏的革命同志？答案在哪里？

答案不在某个先知的大脑中，不以某个救世主头脑发热为转移。而应该以实践为标准，让历史来回答，让生活来回答，让事实来回答。

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我的文章内容绝大部分是正

确的。

胡风先生不是反革命……（从略）这些话，对照最近传达的70号文件，有没有错误？

在《纵论国是、兼评鸣放》一文的第一节里，我大声疾呼：……。这一呼声今天不是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吗？历史和现实不是雄辩地证明了我们社会弊端丛生、三害横行，正是我们实现四化最大的绊脚石吗？

在《纵论国是、兼评鸣放》一文的第二节里，我写道：……。对照一下最近人大、政协许多代表和委员的发言，不正是“不谋而合”吗？

在该文的最后一节里，对当前反右派斗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大胆断言：党中央犯了错误。对照邓小平同志今年春天的内部讲话，其精神不是一致的吗？我还在文章里特别警告“整风把三害从大门赶了出去，反右却又开了一个窗口，让他们爬进来，危害我们的事业”20多年来，三害恶性发展，党风严重不纯，社会风气败坏，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教训啊！

历史，只有历史，才能对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做出最公正无私的评价。但是，遗憾的是，有些同志仍然闭眼不看现实，死守着“凡是”的框框。在这方面，最典型、最出色的标本就是今年5月20日你们关于我的问题的复查决定。

该决定没有正面回答：1957年划我为右派是否正确？此后的一系列处分（开除团籍、留校考察）是否有效？……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因而也没有回答：我胡显中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合乎规格的右派分子？同时也没有明确宣布恢复我的政治名誉和工作。这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回避？或两者兼而有之？或者另有奥妙？

作为一个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受害者，有权利要求明确回答这些重大问题。

其次，复查决定既然全面列举了我在鸣放期间的主要文章，当然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对这些文章做一个全面、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新的党中央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以来，全国人民破除迷信、砸烂精神枷锁、粉碎思想镣铐、挣脱“凡是派”、本本主义等等中世纪、封建的、愚昧的心理桎梏，敢于说真话、实话、心里话，思想活跃，形势大好。在这样良好的政治气氛下，完全有可能对我的文章做出正确的评价。复查决定既然肯定了我的文章“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所谓“严重错误”何在？当年划我为右派分子的根据又何在？对我处分的理由何在？按照有错必纠、拨乱反正的精神，明确宣布撤消那些错误的处分决定，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按照党中央 55 号文件和 11 届 3 中全会、五中全会决议办事的必然结果，根本谈不到“从宽处理”云云。事实上对我的处理，从来就没有“从宽”过。

因此，我要求给我一个合乎事实、合乎政策、合乎情理的复查决定。特将原决定奉还！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应该紧随着前进。这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胡显中 1980 年 11 月 2 日

（被捕 23 周年纪念日）

大约一个月以后，党委办公室来电话，要我去一趟。他们给我看了一个新决定的草稿，征求我的意见。这个新决定明确承认：当年是错划，并恢复名誉……等等，其他用词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我看了以后表示同意，他们才打字作为正式文件给我。这样，我又得到一份改正决定。在 55 万被改正的右派当中，得到两份改正决定的，恐怕我是唯一的吧？

所谓“窃款问题”

在这里还应该追记一下：1980年春，镇赉劳改大队特地派人来到长春，打电话给我，请我前往劳改局招待所。到了那里，干部向我出示一份文件，并且交给我300多元钱。文件是这样写的：

关于胡显忠所谓窃款问题的结论

吉镇劳总字（80）第2号

胡显忠（名字就错了一个字），男，贫农出身，学生成分，汉族，大学文化，系南昌市人。因现行反革命罪于1958年8月13日被捕（时间错了，应该是1957年11月2日）经长春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满留队就业，后调辉南劳改总队。

胡显忠来信称：因所谓窃款问题被责令反省7个多月，要求给予纠正赔偿经济损失。经查我总队通化工程队于1976年9月1日发工资时，就业人员大组长张杰提出差款35元，当时认定胡显忠多领去窃归己有，将胡送学习班达7个月，令其退款35元，并给予记过处分。在这次复查中发现原认定的结论是没有证据的。为了落后党的政策，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经吉林省劳改局批准，做如下结论和处理：

- 1、胡显忠所谓窃款问题应予纠正，被扣的35元现金应予补偿，并撤销记过处分。
- 2、胡显忠在学习班7个月的工资差额和反省10天的工资，应补发199元2角。
- 3、胡显忠为此事二次去长春、一次去北京上访和上

访期间未发工资，在经济上造成些困难，可给予补助 70 元。

- 4、胡显忠在学习班期间被烧坏的衣物，鉴于当时已赔偿 30 元的具体情况，不再给予补偿。

1980 年 1 月 3 日

从这个文件上的日期推断，干部们找我的时间，应该是在新年后、春节前。我还记得：当时拿到这笔为数可观的赔偿款时，非常高兴，特别有成就感。马上就用“胡克奚”（克者，克服、战胜之谓也；奚即当时主持其事的干部奚瑞民）的名字存入银行，并且计划永久保存这笔存款。可是，后来因为结婚用钱的地方太多，筹措困难，就把这笔钱也动用了。

通过以上几件事情，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道理：公平和正义永远不会自动来到，必须去争、去抗争。只要尽力而为，即使失败了，也问心无愧，甚至可以说虽败犹荣。如果自动放弃，那就便宜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滥用权力之辈。我非常欣赏梁漱溟先生的名言：“一个人先要有说‘不’的勇气，才可能获得说‘不’的权利。”这话说得多么好啊！我一直把它当做座右铭，压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

历史从来就是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中前进的，各种力量互相制衡，社会才能够平稳、和谐地发展。遥想当年，庐山会议上，如果那些中央委员们，特别是政治局的各位委员、常委们，都能本着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明辨是非，仗义执言，坚持真理，勇敢地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反对老毛的独断专行和倒行逆施，那么，局面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景象，结局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或将改写。而这一切都不存在，现实却是那样的令人遗憾：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一个个都对老毛唯命是从、唯唯诺诺，企图牺牲彭德怀来讨好老毛。结

果，老毛得逞，下一个就轮到他们自己了。这是这些权要们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悲剧。悲剧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性的一大弱点：自私！因为自私，所以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自私，所以才明哲保身。因为自私，所以才……才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可怜的人们啊！结果是自食其果，造神——被神所抛弃。

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还压着许多类似这样的格言。如：
高尔基：“生活方式只有两种：腐烂与燃烧。”

巴尔扎克：“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 * * *

还应该记述一下关于中共党籍的问题，直到 1986 年才得以恢复。当时我填了一首词：

调寄《满江红》

蓦然回首，三七年，蹭蹬曲折；
书生气，纵论国事，慷慨激烈。
歌舞春风庆桃李，铁窗秋夜对星月，
心如焚，叹人妖颠倒，神州劫！
时代潮，浪千叠；人权兴，王权灭。¹⁰
终还我，共产党员资格；
老骥又萌千里志，雄心何惧两鬓雪。

¹⁰（注）这 6 个字当时是这样的：“挽狂澜，有人杰”，后来根据认识水平的提高，改成这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尽余年，当鞠躬尽瘁，死方歇！

最近收到《中华名人格言》的征稿信。信的全文如下：

基于您在专业领域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社会的认同，受到书报刊等新闻媒体的广泛颂扬，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由此，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和北京台苑文化发展中心真诚邀请您为《中华名人格言》一书撰写格言。愿您的人生感悟早日成为社会大众的精神财富。敬请在百忙中给予大力支持。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名人。他们找到我，实在是由于道听途说的误传、误导所至。但是既然人家如此盛情邀请，只好从命了，也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真实思想。于是，写了这么几条：

1、“善欲人知，决非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应该如此，对于一个大党、一个执政的大党来说，就更应该如此。

2、一个人的实绩是分子，而其自我吹嘘和张扬则是分母，后者越大，则分值越小。同理，对于一个党来说也是如此，或者说更应该作如是观。



风刀霜剑等闲度，三十年后又一春。



2004年在母校南昌心远中学留影。



作者在办公室的工作照。1987年。



平日喜读李锐书，正在看的就是。2002年。



桂林山水，胸中波涛。1991年游桂林。



生命不息，攀登不止。1991年登长城。

万花梅为首 先占春色

恢复名誉以后，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工作安排。按照文件规定，应该就地或就近安排。按照这个规定，我只好到通化市去工作了。当然，通化师范学院也曾经有过接纳我的打算（请阅本书“难友群像”）。但是，我于1980年冬天结婚了，妻子是一位中学的数学教师，家就在长春市，长春市也可以说是我的新家。

吉林大学也曾经向附近的吉林省财贸学院推荐，多多美言，希望该校接纳我。据说对方是这样回答的：既然这么优秀，你们自己为何不留下呢？这无疑是将了吉大一军！

“好，我们就自己留下了”。这是后来经济系里一位领导对我透露的内情。当时系里也确实需要一个既懂业务又能自愿从事非学术性工作的人。在正式安排之前，系党总支部书记靳宝兰要我保证在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3-5年。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当跳板，再谋求其他更好的工作，我答应了。

回到母校当然很高兴，安排在系里做教学秘书的工作，但没有正式的名分。说起教学秘书，名义上很好听，但实际就是打杂而已。给那些老教师打杂，当然心甘情愿；但是同时也为所有教师包括那些年纪很轻的后生打杂，我心里可有点嘀咕了。这个时候还是讲究服从分配的，况且又做了保证，所以只好这样干下去。同时创造条件，等待机会另谋他就。

几年以后，机会终于来了——1984年，“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作为省委和省政府的咨询机构成立了。那里需要人，而且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我的同班同学李贤祖长期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处长，最早知道这个信息，在征求我的意见后，介绍我

去了。这也符合了一句老话：人熟是个宝啊！提起这位李贤祖，他和我也可以说是比较要好的同学。在班上时就比较接近，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但是运动一来，身不由己，也不得不参加批判大军，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正因为此，据说在我被捕以后，他也受到“延长党员候补期”的处分，理由是对敌斗争态度不坚定云云。后来他倒是一帆风顺，从吉林日报社提拔到省委宣传部，从干事开始，最后升为处长，再后来调到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业务副台长的职务。可惜呀！就在快要退休的时候，突发脑溢血，经过治疗，又在病魔的折磨下苟活了8年，于2000年去世，终年还不到70岁。我怀着满腔的惋惜送他走了最后一程：去火葬场。好人一个啊！

1985年被正式调入该处，任务是筹办一个经济学方面专业性、学术性的杂志，很快就出版发行了，这就是《经济纵横》月刊。我开始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也就是所谓“为人作嫁”的工作。不过，在为人作嫁之余，也不断地做几件满意的衣服来装扮装扮自己。

正式工作以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失去的20多年光阴追回来，最大限度地弥补损失的时间。因此，决心在工作之余全部投入到学习中。接下来的问题是，学什么？经过20多年的荒疏，外语很难再拿得起来了。在监狱里，我利用机会学了许多古代的经典作品，在古汉语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经过再三权衡利弊，我选择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突破口。

再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先从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入手。据说在这方面目前还很少有人涉足。这个状况，为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从捧读《孙中山选集》开始，大约花费了一年左右时间，就写出了一篇《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初探》，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这是我平反以后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篇作品意味着：一个长期被关押的罪犯，终于恢复了

做学问的资格。

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的稿费很高，这篇一万字的稿件得了70多元稿费，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相比之下，今天大陆的稿费就很低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千字百元左右吧。

随后不久，又在《人口学刊》上发表了《孙中山先生的人口思想》。3年以后，一部《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书稿完成了。可是在出版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点令人气愤的周折或者说是麻烦。后来我在《编辑之友》月刊上发表短文追记其经过如下：

书成之后，送到当地一家出版社（按：即吉林人民出版社）。十天以后，原稿被退回来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稿，十天时间便“审”完了，真是高效率。

事后得知，他们“审”的不是文稿本身，而是作者其人。他们派人来我当时所在的大学，了解这个人的情况。如果我当时是副教授什么的，这本书大概也就可以出版了。可惜的是，直到现在（1986年），我连助教的职称也没有。学校经济系管人事的党总支副书记这样介绍：“此人毕业后便划成右派，关进了监狱。1980年落实政策才恢复工作，此前他并没有担任教学或科研工作。”于是，文稿被“枪毙了”。

我偏不服从命运的安排，更不甘心自己的心血白费，我不相信：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识货的人？我复写了几份书稿内容提要，分别寄给与孙中山革命活动有关地方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没有（也不可能）去调查作者情况，而是审阅书稿本身的价值。先后收到四家出版社的回信，都同意审稿。但是回信最快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间是半个月！稿件寄出后，一个多月，被退了回来。可打开一看，附了一封很长的信，稿件中还夹了几十张浮签。他们认真地看了原稿，并提了几十条修改的意见。在个

别的标点符号下面，都有用铅笔划过的痕迹，表明此处标点用得
不当。我又兴奋，又感激。兴奋的是：我的心血并未白费，已引
起人家的关注、重视；感激的是，编辑同志如此负责，如此细致，
周到。

春节期间，我既不串门，也不在家，躲进办公室，埋头书堆
里。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动，修改稿终于寄出了。对那一张张
浮签，我都珍藏起来。这也是人家的心血呀！对于编辑的意见，
大部分接受了。有些问题，未能采纳，写成《几点商榷》的长信。

书稿就这样定下了，直到见书以前，我一直不知道编辑同志
的大名。因为每次通信，都是用“总编办公室”的名义。

1986年，即孙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我接到了新书，翻
开版权页，才得知：责任编辑是：魏允和、鱼建光。

手捧新书，心绪翻腾。想想这本书的整个问世过程，真是令
人既无比兴奋又感慨万分。

现在，我自己也成了学术性期刊的编辑。“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当年吃过的苦头——审人不审稿的编辑，几乎扼杀
了一部合格的书稿。（作者本人，不敢下更高的评语，说自己的
作品“合格”，还是可以的吧！）今天，我时时记住自己曾经吃
过的苦头，不要再加之于别人。当我看稿时，只审稿，不审人。
不管是无名之辈，还是声名显赫的作者，一视同仁，以稿件质量
定取舍。

我感谢该书责任编辑，也愿意以他们为榜样，去做我面前
每篇来稿的责任编辑——真正对作者、对文稿负责的编辑。

* * * * *

上面那篇短文发表以后，陆续收到不少作者的来信，内容都
是求助，希望我帮助他出版某方面的专著。可见学术界一片繁荣

景象，但也说明出版界的书号是奇货可居。普通的学者要想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公诸于世，除非自己掏钱，很困难、很困难！因为，出版社也要讲究效益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也是政府救助的责任所在。可是，当局宁可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去出版那些假、大、空的官样文章，却没有什么兴趣来出版那些真正具有某方面学术价值的著作。

1987年，我拿该书参加两年一度的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选，结果竟然落了空。原来大陆的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定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先由自己申报，再由所属的学科小组初评，一级一级地上报，到最后总评。各级评委自己大多有成果申报，同时又参加别人成果的评定工作。这些评委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这种评奖办法，实际就是由各级评委们集体瓜分所有的获奖名额，如果还有剩余，则施舍给那些和评委们关系比较好的人。我的天！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德性，一旦自己有了权，同样的用权来谋私。这并不奇怪，人人都有私利，自私可以说的人类的天性。问题在于有没有办法使这种天性无法实现、达不到目的。办法当然有：裁判员就是裁判员，不能下场踢球，不能当运动员。这样非常简单的设计，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可是在大陆却办不到，为什么？整个的制度设计根本就不合理，指望某一个单项制度设计得相对合理，也难。

没有评上奖，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压力。因为经过那么长期的政治迫害，性格早已变得坚定了、成熟了，在心理方面具有了超强的抗压能力。这点挫折算什么？小菜一碟而已！

我仍然笔耕不己。记得在和朋友们爬长城时遇到一块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不到长城非好汉”，因为是老毛的诗句，许多善男信女们争相在这里留影。显然，这是利用老毛的诗句做商业广告。可是，难道到了长城就真的成了好汉吗？未必！这样的好汉也未免太容易当了。我不屑于在这里照相，另择一个比较陡的

路段，请人照了一张往上攀爬的镜头，并且题字云：生命不息，攀登不已。这就是我的性格、我的追求、我的座右铭。

此后，我又进一步向古代的其他思想家进军，先后写作了《管、商异同论》、《论孔子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精华》、《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的比较》、《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思想家——朱执信》、《改革英雄的悲剧人生》（商鞅）《千古文章未尽才》（韩非）《亦功亦过说李斯》、《千古功罪秦始皇》（未发表）一系列的学术性文章，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其中《管、商异同论》一文被刊登在《管子学刊》的首篇，并因此被邀请参加第二届“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年），和来自台湾、香港、美国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以后，还参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每两年一届的年会。由于参与学术活动增加，自然接触了许多学者，他们的思想状况各异，但是总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话题。从此，我又有了发挥自己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平台，有了广泛的发言机会，又可以纵论古今，评议时政了。

1988年，新来一位杨会长，在未和我本人沟通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哈哈！编辑部副主任是个什么级别的官职呢？按照共产党所实行的等级制度，也算一个副处级吧！记得孔夫子他老人家在56岁的时候，才担任鲁国的大司寇，摄行相事（大概就是代理宰相的职务吧），可惜只干了三个月，就主动辞职周游列国去了。这一年我也是56岁，真是巧合。但是我却不能同意这个安排。因为我顿时想起来许多古代人物，首先一个是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还有一个谁？写下了：“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这些古人的高风亮节，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我决不能做那种“拜迎长官”和“为五斗米折腰”的角色了。

为什么这位杨会长不事先和我沟通就突然宣布这个事情呢？按照共产党统治下的潜规则：提拔谁，就等于是遇到“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那样的美事，就一定会高兴得心花怒放，并且还要感恩戴德，永记不忘。因为按照普通人的心理，做官是最大的成就、最大的恩典。可是他忘记了一句古话：“人各有志”。我的最大志愿是专心从事研究学问，增长智慧。如果涉猎官场，追逐权力，那就必然要分散精力和时间。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事业，我决不能从命。

于是，立刻求见这位杨会长，请求收回成命。理由是我从来就没有领导别人的才干，在我自己这个三口之家，我也不过是个三把手而已。对方笑问：你现在是副高职称，还想不想更上一层楼？离休以前，晋升为正高级？我说：当然想呀！他又说：你再上升为正高级，可需要更多的业绩，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可能吗？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很难啊！胡老兄，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都非常清高，耻于谋官。但是今天的现实你不能不考虑吧？

一番话说得我只好接受这个职务，为了创造“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嘛！但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为杂志的文字方面把把关而已，至于其他“拜迎长官”之类的俗务一律由正主任去应付，统统与我无关。幸亏只干了5年，就该离休了。我没有把握，如果继续干下去，会不会变得庸俗，甚至会堕落？因为环境可以改变人，可以像染缸一样把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染成五颜六色、所谓的“人”。多少优秀青年在学校里都是壮志凌云、抱负不凡，可是经过官场的“染”，就变成了唯唯诺诺之辈、溜须拍马之徒，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可悲啊、可叹啊！

再说这个文字把关的任务，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的权力只限于对稿件二审，还有终审一关。终审人是外聘的吉林大学教授、博导，也是我的老师——张维达。有时我认为很好的稿件，到了他的手里，却被枪毙。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但是，我必须尊重他的意见。另外，他也经常拿来一些稿件，多半是吉林大学的

教师，或他带的研究生，还有就是他在经济学界的同行。这些文章，一般来说都比较有水平，但也有个别例外的情况。对于这些，我都必须坦然接受。

还有更为矛盾的情况，例如有一次我否决了一篇十分平庸的稿件，那位正主任立即对我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财神爷，你可不能否决他的稿子（我们单位的财政拨款全靠财政厅的某个处负责）。我说：那就摘要发表千把字吧？照顾一下，如何？他说：也不行。应该全文发表，而且要按照最高标准支付稿费。我明白了：这就是变相的权钱交易嘛！

更为棘手的是，单位的头头有时候也要写点文章，那不过是工作报告或总结之类的东西，很难说是“文章”，更谈不到水平了。这些东西如何处理？不发表吧？说你骄傲，目中无人。发表吧？实在对不起读者。如此种种，其中的甘苦，只有我心里清楚。

由于我的敬业和勤奋，工作上小有成就：1990年杂志的的发行量达到7000多份，这是直到今天为止该杂志发行的最高记录。（据新任负责人最近向我透露：目前的发行量仅为1000余份）另外，也是在这一年，刊物所发表的文章被最具有权威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三篇，也是历史最高记录。当然，这些成就并不能归功于我一个人，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由于同事们在外面组稿、约稿，才有这些优秀稿件来充实刊物的版面。

这一年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就在快要干满5年的时候，面临着晋升职称问题。眼看就要回家了，如果拿不到，以后就没有机会，这可以说是职称的末班车，势在必得。可是当时单位里有4个副高级职称，他们都是官员（包括副会长、秘书长），只有我一个老百姓。因此，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面临的形势也很不利。如果只看官位高低，我显然处于弱势。但是，如果公平竞争，就必需靠实力，所谓“实力”就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在申报的同时，我写了一个声明：

“为了实现公正和公平，必须实现公开操作；只有公开操作，才能够保证公正和公平；如果是真的公正和公平，才敢于公开操作。”如何公开操作？我提出：把四个人的研究成果公开展览出来，让大家来评判，谁够谁不够。我们不是经常说要相信群众吗？还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这个声明无疑是对他们三个人的叫板）。我更进一步写道：我只需要用任何一年的成果来比，其余同志，当然按照规定用5年的全部成果。（这就等于说，好比下棋，我只用一半的“车、马、炮”和你们下！）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高傲和挑战。

看起来，我是志在必得，因为这是我的核心利益。他们终于向我摊牌说：如果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你的，不必争论了。为什么他们如此大度呢？可能是他们考虑到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同时也考虑到我们单位就在省委对面，如果我不服，直接找宣传部门的主管官员告状，易如反掌。当然，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说，他们三个人无论谁评上其他二人都会不服气，所以最后只好让给我了。

1992年末，出版系列的职称评审委员会以15人全票通过对我的资格审查，同意我晋升为正编审，即正高级职称，这是单位里当时唯一的正高职称。

这一年的春节，妻子按照惯例要贴春联。她买的春联无非是“恭喜发财”“万事如意”之类，我瞥了一眼随便说一句“俗透了”。她却反过来将我一军：“你来一个不俗的！”我本无心，经她这一激，就激活了我的文思。想了良久，终于想出一副别具新意的对联。于是叫她再去买红纸和笔墨，自己写！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家里写的春联：

万花梅为首 先占春色；
百兽猴最灵 敢闹天宫。

前一句暗示着，最先拿到正高级职称；后面一句更明显：猴年是我的本命年，猴性也代表着我的性格。



胡显中一家三口近照。

纵论古今笔未休

2002年，70岁的时候，写了几首“七十述怀”。

其一：

人生匆匆七十秋，
半世为民半为囚；
晚来一事最堪慰，
纵论古今笔未休。

其二：

世上风云空自嗟，
书中玄妙潜心阅。
一支秃笔一颗心，
满纸文章满腔血。

另外，还有一首七律：

皇帝新衣何处寻？
神州遍地齐读经。
敢夸孺子说真像，
羞做小虫只应声。
真理从来思考出，
满园鹦鹉谁创新？
问心无愧平生事：
我以我笔写我心。

那个时候，我还在用笔写文章。但是，一年以后，我也“换笔”，改为使用电脑“打”文章。

不管用笔，还是用电脑，产品都是一样东西：文章。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脑力劳动生产出精神产品，来满足社会各方面人士的精神需要。

20多年来，我写作的目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为了在学术上打下一定的基础。因此所写的文章集中在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从孙中山上溯到孔夫子），是纯学术性的东西。没有这些成果，就很难从学术上站住脚，当然，职称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阶段 当我在学术上被人们认识和肯定以后，开始转移方向：主要是为了抨击时弊，议论朝政，臧否人物（从正面人物鲁迅先生到反面人物陈伯达）。

第三阶段 近年来有了互联网，我又学会了电脑和上网方法，更为方便。当局从邮政渠道封堵的稿件，可以通过因特网传输出去，而且速度之快，为邮寄方式所望尘莫及，万里之遥，瞬间可达。因此有许多在境内无法发表的文章，一经上网，就可以在境外发表。可以这样说：互联网是封建专政制度严密封锁的克星，是冲破玉皇大帝天罗地网的孙行者，功莫大焉！

笔耕不断

20多年来，由于笔耕不断，共计发表了将近200篇大大小小的文章。其中当然有些是应景之作，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应该让其速朽。有些文章还是值得保留下来，传给后人的，这就是我编辑出版《一个幸存者的思考》的理由。

有些文章还受到不同的奖励，例如：199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用倾斜政策来平衡农民的倾斜心理》一文被该报和国家

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授予三等奖。此外，还曾经获得过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2、3 等奖各一次。

还有最近获得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006 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三份）。在获奖者的名单里，离、退休的老年人只有 4 人（全部离、退休 180 多人），在这 4 人中，有 3 人是刚退休的，即他们的成果是在原岗位上做出的，只有我一人是在离休 10 多年以后仍然保持笔耕不辍而获得的奖励。获奖说明自己的文章得到社会的肯定评价，代表着研究成果的水平，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的学说，人的需要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最低级的是生理需要（包括温饱和性爱），再高一级就是安全需要，第三层级为社会交际的需要，其上是被尊重的需要，最后也是最高级的需要就是实现自我价值。其中 1~2 项和一般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只有第 3、4、5 三项是人所特有的。也就是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和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需要被尊重，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么，如何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呢？古代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前两项我肯定是做不到，但是力求做一点“立言”的事情，也算是不虚此生吧！因此，我倍感欣慰，也算是实践了我在 1986 年写下的《满江红》里的决心：

“老骥又萌千里志，雄心何惧两鬓雪”。

《一个幸存者的思考》

2007年的春天，我决定把20多年来所发表的文章集结，自费出版。经过几次联系以后，委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出版社承办，费用是12500元。这笔钱本来早就有的，但是，考虑到我的女儿将来的学习或出国深造，需要大量的钱，所以不敢轻易花费。现在，她已经出国工作，而且收入颇丰，看来用不着我再为其花什么钱了，这才敢动用这笔钱。

该书的书名就叫《一个幸存者的思考》。书的扉页是这样写的：谨以此书敬献给：

在20世纪50-70年代毛泽东极权统治下，为维护真理而抗争、而呐喊、而献身的英雄群体（包括张志新、林昭、王申酉、遇罗克、史云峰、李九莲……等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先驱们），同时献上作者最崇高的敬意。

在中国极权统治下，被监禁、摧残、折磨，最终被夺去生命的无数亡灵（其中包括我的中学同学、好战友钟纯民），同时表示作者无限的思念与同情。

书的自序如下：

一个幸存者对于先烈们的责任

1898年9月21日，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实行百日的维新运动扼杀在起步阶段。被杀害的“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当时正在寓所里和梁启超密商。消息传来，梁建议他立即逃走。他则坚持让梁走，而自己坚

持赴死。他说了一段气贯长虹、震古烁今的话：“不有死者，无以报皇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今吾与君分任之，可也！”

谭嗣同这段话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面前，必然有两种人：用生命和血肉之躯和反动势力作最后的拼搏，以死来报答皇上（或祖国、或人民）；用保存生命的方式以图将来。前者是伟大的、可敬的。因为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毅然选择了去死，视死如归。后者虽然不那么伟大，但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人物。如果所有的志士仁人都去慷慨赴死，结果如何呢？那就会被反动势力杀光、死绝。谁图将来？正因为如此，那些有幸存活下来的人，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把那些先烈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继承下去，把他们来不及完成的思考和努力继续下去。否则就对不起那些用生命和血肉之躯和封建势力作最后的拼搏、冲刺，英勇就义的亡灵，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

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例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藐视强权的大无畏气概，“横眉冷对千夫指”“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硬骨头作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真理而献身的勇气……。这些都是我们伟大的先辈们所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切全都被人们彻底遗忘了！本来应该成为时代先驱、社会良知代表、真理代言人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个个低头弯腰、服服帖帖、唯唯诺诺地拜倒在、继而是跪倒在权力的魔杖之下。历史上中国人民所固有的骨气、志气、浩然正气统统不见了！

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毛泽东则反之：对知识分

子大部分不杀，但却千方百计地“辱”之，没完没了地“辱”之。这还不算，还要在“辱”完了之后，勒令被“辱”者再反复地自辱、自污、自我作贱，把自己骂成最大、最坏的恶魔。大陆一时风行的“检讨文化”就是在毛泽东强权压迫之下形成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把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通通抛掉，来换取苟活的机会，像狗一样苟且偷生，可怜地、毫无尊严地活下来。可就在这“万家墨面”、“万马齐喑”的时候，竟然有人甘冒生命危险，傲视强权，用自己薄弱的生命和身躯勇敢地冲击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极权势力，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和抗议。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勇敢的反叛者，也许有人会贬斥为“以卵击石”“不自量力”“蚍蜉撼树”……等。可正是他们才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是“社会的脊梁”，应该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一想起他们，就令人肃然起敬。作为那场空前浩劫的幸存者，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的余生投入到中国民主化事业中去，用自己的头脑去继续他们未完成的思考；用自己的笔，把他们来不及思考、或来不及完成的事情继续下去，并把这一切忠实地记录下来。本着这样的信念，在这25年时间里，写作和发表了百余万字的文字。从其中选出一部分，自认为值得流传后世的，集成此书。既是对先烈的告慰，也可以说是对于历史和后人尽到一份责任吧！

有位西方哲人说过：“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综观本人的一生，基本上印证了这句话：前半生，和55万多善良的识分子一样，就是因为思考、因思考而表达，而陷入了毛泽东的“阳谋”之中，倍受苦难的煎熬。后半生则有幸

看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新的表演，也在不断地咀嚼苦难的同时，更进一步思考、因思考而表达。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该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忽然接到出版社的通知：该书已经印刷、装订，就在即将发书的前夕，被当局查扣了。

我当然感到非常恼火，简直怒不可遏。过后冷静一想，在集权体制下这种结局也是必然的。否则就不成其为“集权体制”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以后，引起许多朋友的愤慨。有位过去的难友、现在已经移居海外的贾先生，仗义执言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给予抨击。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最近中共 17 大开过了，在 17 大的文件里就有关于给人民“表达权”的许诺，如果这个许诺只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并不打算认真实行，也就罢了。如果是真心实意要兑现的话，那还是应该从每一本书、每一本报刊的放开做起，不要害怕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会真的推翻自己的统治，还不至于如此虚弱吧？一个大党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还有位鲍君也在《民主中国》上发表文章，列举了包括我的书在内、被当局所查禁的几本书，说明中共所允许的“表达权”其实只不过是“鸟笼政治”罢了。

有了这么多朋友的热心支持，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这本书将来一定能够出版，而且由于当局的查禁，反而会增加其影响力。真理的声音是扼杀不了的。

打工生涯

1993年离休的时候，每月的收入只不过4百多元。维持全家吃饭是不成问题。但是我唯一的女儿还在读小学，她未来的教育费用仍然是个大大的窟窿。如何填补？作为一个父亲，女儿是我这一辈子的希望所在，不能不下大力气培养；培养就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钱从何来？无他，只有出卖劳动力。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我不得不出去打工，以增加收入。最初是到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科联”）下属的《市场经济时报》担任编辑，也可以写点小文章补充版面。每日上班半天（上午），每月收入30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月收入的一半还多，当然很可观。

可是这个好事没有干几个月，就被辞退了。为什么？因为发表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该文发表时间是1995年3月21日。现在全文照录如下：

让谁过紧日子？

署名：东方剑

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中国财长刘仲藜在报告中说：在财政方面，仍然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财政状况仍未见好转。预计今年财政赤字将高达668亿元之巨。为此，必须从严控制投资及消费需求，同时，要求全国上下过紧日子。

从我国经济实力来看，的确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但从

世界各国横向比较中，我们仍然比较贫穷，人口多，底子薄，这已是人所共知的最基本国情，目前尚有 8000 万同胞未能脱贫。一般城乡居民也仅仅解决温饱二字，离小康水平尚有一段距离，要达到富裕水平尚须作更多的艰苦努力。为此，必须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现在的问题是：主要应该要求谁过紧日子？

在当今中国，最有权力、有机会大把花钱的是什么人呢？除了已经“提前富起来”的极少数大款之外，只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官员们。君不见，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不良之风正是在中央三申五令的严禁声中越演越烈，不断升级，集团购买的金额也在全国上下、一片限制的呼声中逐年猛增。仅据 1992 年的统计，即高达 900 亿元。其中尤以购置高级轿车最引起人们的反感，为了少数官员一时风光、舒适，不惜挪用扶贫、支农基金，克扣教师工资，甚至动用救灾粮款的事，时有所闻，见诸报端。虽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感与谴责，但时至今日，真正查办、惩处的能有几人？

值得令人欣慰的是，新年伊始，辽宁省财政厅长纪玉英先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十分坦诚地说：“过紧日子首先要从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做起，做出表率。”（见《经济参考报》1995 年 1 月 15 日）

纪先生是掌管一省财政大权的官员，本身又是一个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能有如此见识，又能公开向新闻记者发表，实在难得、可贵。问题在于，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过紧日子应该有许多硬措施，要牢牢把住 12 亿人民的钱匣子，防止少数败家子任意糟踏民脂民膏。

这样一篇短文，说了几句老实话，就刺激了当局的神经，承受不了，以至于把我辞退。仅从这件小事情，就可见该报主管部

门领导人的精神状态如何，也许就是因为触及某方面的利益了吧！在他们看来，任何文字都不允许有触犯“上面”的迹象，也就是不能“犯上”，“犯上”就可能“作乱”嘛！这个时候已经是1995年了，距离新世纪只有几年时间，吉林省相当部分领导人的思想状况就是如此，可叹啊！话又说回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又岂只是吉林一地的领导人如此吗？

离开《市场经济时报》不久，又去新华社吉林分社主办的《吉林内参》做兼职编辑，全天上班，月薪500元。已经有好几位新闻界的老前辈在那里干了很长时间了。大家的任务是从新华社内部消息中筛选出比较重要、而又可以公开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杂志，每周一期，因此，比较紧张。可是也只干了几个月，又一次被抄了鱿鱼。这次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内部有个老处长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打算来加入这个行列。这样就把我挤掉了。

第三个岗位是应邀到省工商局下属的《民营经济》去做编辑，每周只去三天，月薪也是500元（其他雇员都是全天上班，只有400元，对比一下，对我应该说是比较“优待”了）可是，这次也没有干长。为什么？几个月下来，我感到这里的官本位现象比我在原单位还要严重得多。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每当午饭时间，同在一个大食堂里，大家都要排队买饭菜，可是在另一处专门辟有首长席，那是供应局长们的，他们来了就吃，吃罢把嘴一抹走人。当然，理由很好找：首长们的时间宝贵呀，等等。我最看不惯的就是等级制度，局长和处长本来就只差一级，可这一级却特别重要。局长就算是高干，归省委组织部管，叫“省管干部”，而处长则是一般干部，归人事厅管理。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强调“官兵平等”的原则，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等。可是一旦取得了政权，马上就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眼不见，心不烦”因此，我干脆就不去食堂吃午饭。事先买好“方便面”，用开水一泡，就解决问题。可是天长日久，如

此对付总不是好办法，更不是科学的办法。方便面不宜经常吃，这是人人皆知的科学常识啊！再一个原因是午睡被取消了，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不能承受的牺牲。赚钱固然重要，但是，健康更为重要。不能用健康去交换金钱，更不能用尊严去交换金钱，只能用劳动去交换。因此，这一次是我主动抄他们的鱿鱼，不干了。

又过了一年多吧，遇到在毛泽东统治末期被无辜杀害的史云峰弟弟史俊峰，他担任中国新闻社吉林分社社长。正物色人员、充实队伍，也把我收入他的旗下。他看我的经历，颇有些同情心理，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优待。但没干多久，人马大增，就必然要进行选优汰劣，把那些力不胜任、或能力较差的人淘汰出局。和那些年轻的朋友比较起来，我60多岁的年龄显然缺乏竞争力，无论是采访，或者编辑（用电脑）都不如年轻人。因此，也只好明智地告退了。

此后，由于体制内的收入在较快增加，打工几百元钱的诱惑力逐年下降了，就没有再出去打工了。

纵观四次打工的经历，既有付出，也有所收获。付出的是劳动，还有休息的权利；收获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有经验和阅历。特别是第一次打工被辞退的原因，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事业所以难以启动，或虽然启动却进展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

结束语：友谊来自理解

回顾我的一生，几多坎坷、几多曲折，最后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较长久。这似乎应该感到欣慰。

对我曾经做过的事情和写过的文章，可以用 8 个字来概：问心无愧，不虚此生。至于别人的反应如何，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批评性的、规劝性的。其中包括我最尊敬的大姐，还有我的弟弟、表弟、同学、昔日的战友。在这里举出一封来信为例（写信人姑隐其名）：

寄来大作，已拜读。恕我逆耳忠言：你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一半错了。你的正确定位应该是中共党员、党的第三代地下工作者、离休干部。这是你主流的一面。至于 57 年被错划一事不过是你的支流，不必耿耿于怀。我们应该珍惜 1948 年在风雨如磐年代的光辉时刻。千万珍惜你是一个光荣的离休干部。……如果那些崇拜“多党制”的人来执政，我们的离休待遇也就打水漂了，现在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对原共产党的待遇就是个教训。

这封信写于 2007 年 3 月 11 日，是看了我的《应该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等文章以后的回复。

必需承认：所有规劝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好，怕我重蹈覆辙，又被抓起来，再去过监狱里的日子。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解我。

一个人生在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吃、喝，（当

然这些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应该首先具备的，否则就无法生存，当然也就无从谈其它），而是做一些对于社会进步有益的事，过去冒险参加共产党的目的也就是这个。最近读了《炎黄春秋》第10期的首篇文章，作者是党内38式老干部、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当年入党就是为了反对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

李老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千千万万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所怀抱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的准确概括，他们当年冲破千难万险，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所为何来？难道不就是为了以上的目标吗？可是结果如何呢？大家都看到了：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的确是被打倒了，而“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任务却远未完成，甚至可以说距离仍然十分遥远。无情的现实把当年的美好的理想击破了、粉碎了、埋葬了！这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是打算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跑进了另一个房间”。

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实和理想不一致、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结局呢？答案何在？这就是我这些年所研究、探讨的主题。

另外一些人则对我抱着理解的态度。他们支持、鼓励我写。其中有些朋友是因为先辈曾经受到过迫害，甚至被折磨至死，在心灵里自然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也有些朋友，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本人也属于共产党的基本群众（即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等）。例如有位朋友（为了他的完全，姑隐其名）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本人还毕业于“党化教育”最严格的某大学。由于彼此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我曾好奇地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你的思想会这样呢？他淡然一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现实生活和历史教训也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历史和现实的纵向思考，再通过中外横向对比，不能不使许多朋友从思想上突破共产

党“党化教育”的束缚，看破其内容的虚伪和苍白，看穿其动机的狭隘和自私，看透其宣传手段之欺骗性。因而觉醒、清醒，因而明白、清楚。当然，由于他身处体制内部，行动上还不能过于张扬，不得不保持低调。这也是共产党用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的结果，他们处心积虑实行‘党化教育’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恐怕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吧。

中国的希望在未来，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朋友们身上！从这些朋友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这些朋友当中，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例如桂向明先生便是。我和桂先生素昧平生，却通过老朋友转来他写的文章：《一个遇罗克式的思想者》、《抚哭叛徒的吊客——胡显中其人》，在文章中对我赞美有加。看了文章，当然要设法认识这位桂向明先生。大概是从2001年以后吧，我们就经常通信，不断地交流思想和信息。也是通过这位桂先生的文章，胡风先生之女张晓风女士才知道远在关外的地方，还有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并且给我写信，随信还附来了她写的或主编的几本书：《胡风30万言书》、《我的父亲胡风》、《我与胡风》等。在《我的父亲胡风》书中还特地写了一篇《胡风案件与右派学生》的长文。文章中列举了三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林希翎、刘奇弟、胡显中。在谈到我的部分，除了简单介绍我当年所写的、为胡风先生鸣不平的文章主要内容以外，还有这样的文字：

从这以后直到1980年获“改正”，他经历了无数折磨与摧残，但坚信自己的无辜与正确，几次越狱逃跑未遂，得到的是变本加厉更为残酷的待遇。

1980年平反后，他回到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做教学行政工作。他继续着对真理的探求，写下了不少专著，人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第2

期《时代论评》上的《三论胡风问题》，一方面继续他于1957年所写的那两篇胡风问题的文章，同时也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文中着重提出了：胡风定案的历史教训昭示我们，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在五四运动过去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高举当年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

他当年所写的政论文章“纵论国是，兼评鸣放”和两篇论胡风问题的文章当时被校方列为三棵大毒草，并收入《毒草汇编》，这成了他当年被判刑的主要依据。二十年后，这些原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作为革命文物保存。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张晓风女士这篇文章早在几年前就被收入在美国出版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一书中，2005年，也就是胡风先生蒙难50周年纪念的日子，大型文史类刊物《纵横》主编许先生向她约稿，这篇文章才在国内正式发表。2007年又被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胡风》一书里。颇有意思的是，最近，这本书被中国民主同盟吉林省机关工作的绳海文先生看到了，并且千方百计地打听书中所记录的人物，几经辗转，才得到我家的电话，特地联系，希望互相认识、交流。经过见面交谈得知，他是1964年高中毕业，成绩优秀，但因为是富农成分，大学与他无缘，只好在家里“修理地球”14年，直到1978年，才当上了中学教师。几年以后又通过招聘考试，被录取为公务员，分配在中国民主同盟吉林省机关从事宣传工作。他说：早在40年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普通的书摊上，就看到过我那本被学校里编印的《毒草汇编》，并且买了保存下来，后来“文革”期间因抄家而遗失，但是对我的名字却牢牢地刻在记忆中。今日一见，真是“相见恨晚”呀！

此外，还有一些相同命运的难友、网上结交的网友、昔日的战友，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大都表示深有同感，正所谓“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吧。

不论是前一类型，还是后一类型的朋友，我都表示欢迎和理解。即使有些朋友暂时并不同意我的做法，出发点也完全是为了我的安全。总而言之，友谊来自于理解，只有理解才能够产生纯粹的、毫无功利性、珍贵的友谊。在这本书里，向所有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福。祝福大家健康和长寿，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风景和戏剧场面。

附录：

为纪念反右派运动 50 周年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我们都是在 50 年前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害者。

众所周知，50 年前所谓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冤案。这场运动逆转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它不但把 50 余万热爱祖国、献身建国大业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使他们备受凌辱煎熬达 20 余年；而且以关心国家大事、说真话有罪，说假话受奖的大量事实，在全社会形成了不敢谈论国事、不愿讲心里话、彼此虚伪、相互戒备的恶劣风气，戕害了中华民族仁爱信义、知荣知耻的优良传统，严重地败坏了道德风尚，破坏了社会和谐。更为严重的是，反右运动摧残了做人最基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使我们的民族丧失了创造活力，人们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经济、文化、艺术、学术等各个领域产生不出大师级的人才，不能攀登世界科学、艺术高峰而深深忧虑。

只有能够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民族，才能看清未来，创造未来。但是 1989 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准人们进行反思，以求得所谓的稳定。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在竞争中发展，在走向全球化，这正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大好时机。科学、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靠人才，靠人才的创造活力。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使全民族都得健忘症的愚民政策，继续麻痹我们的创造活力了。必须唤起我全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

重振我们具有光荣传统的伟大中华民族。因此，我们迫切呼吁：

一、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我国的民主进程。

二、中央以适当方式，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我国宪法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不能让我们的共和国史上留下所谓“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缺点是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的历史笑柄。

三、对于在反右运动中遭受开除公职、强制劳改、家破人亡等摧残而至今仍处于困境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在物质上给予必要的赔偿，至少使他们能够得到安度晚年的合法权利。

我们深信，真心信奉“三个代表”，倡导“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所有正直的有识之士，都会赞同我们以上合法、合情、合理的呼吁。

静候示复，不胜企盼之至。

2007年3月3日

签名（姓氏笔划为序）：

姓名	年龄	反右时单位	离退休单位	备注
丁仁正	74	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	黑龙江中学	退休
万耀球	76	北京大学生物系	北京大学生物系	离休
王书瑶	71	北京大学物理系 55 级学生	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	退休
王亘坚	81	中国人民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授	离休
王克岩	72	北京大学物理系 54 级学生	上海零陵中学	退休
邓乔年	72	湖南乡阴中学	湖南乡阴中学	退休
冯志轩	76	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	原机械部北京机床研究所	离休
史若平	81	山东大学校刊编辑室	山东大学出版社	退休
叶孝刚	75	杭州中苏友协	杭州师院	退休
石天河	83	《星星》诗刊社	重庆文理学院	离休
任众	73	北京市公安局	朝联古建筑公司	退休

刘冰	75	四川青年报社	德阳日报社	离休
刘衡	85	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社	离休
刘乃元	82	新华社翻译部	新华社	离休
刘玉轩	81	青岛《海鸥》编辑部	青岛市文联	退休
刘显生	77	北大物理系4年级学生	北京市化学建材厂	退休
刘钿湘	73	北京市公安局	宣武区公安局	退休
纪增善	69	北京大学化学系56级学生	北京光华染织厂	退休
许良英	87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离休
吴永良	81	大公报社	经济日报社	离休
吴明海	72	浙江嘉善中学	浙江嘉善中学	退休
宋林松	70	北京大学物理系54级学生	苏州大学	退休
李安	87	中国人民大学进修	人民大学	退休
李凌	82	空军政治部	中国社科出版社	离休
李才义	71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建行	退休
李承欧	79	中国银行总行	中国银行	退休
李昌玉	74	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	山东大学附中	退休
李泰伦	71	北京九中	劲松一中	退休
杜光	79	中央高级党校	中央党校	离休
杜高	77	中国戏剧家协会	中国剧协	离休
杨治仁	72	北京工学院二系54级学生	北京光华染织厂	退休
汪国训	75	北京大学学生	武汉大学	退休
沈泽宜	74	北京大学中文系54级学生	湖州师范学院	退休
邵正祥	75	水电部	国家电力公司	退休
陈奉孝	71	北京大学数学系54级学生	潍坊三中	退休
孟昭容	77	人民大学法律系4年级学生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离休
林希翎	72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旅居 法国
茅于軾	78	中国铁道部工程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	退休
郑海天	77	中央高级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	离休
南鸿禄 (纪由)	76	北京丰台区工会	北京东铁营工人文化馆	离休

姚仁杰	74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退休
姜弘	76	长江文艺编辑部	江汉大学	离休
柯林	80	桂林卫计委	桂林市木材公司	离休
胡作群	73	北京大学俄语文系学生	北方工业大学	离休
胡显中	75	东北人大经济系 53 级学生	吉林省社科院	离休
赵文滔	79	第二机械工业部	北京外贸总公司	退休
倪艮山	82	国家经委	中国地质经济研究所	离休
徐梅芬	82	大公报社	武汉大学	离休
晓枫 (铁流)	74	成都日报社	成都日报社	退休
高汾	87	中央高级党校	经济日报社	离休
曹馨铭	75	铁道兵	上海市政工程局	退休
黄福裘	74	北京工学院一系 53 级学生	中国纺织机械总公司	退休
提钟正	75	甘肃省广播电台	甘肃省广播电台	退休
程玉章	73	铁道部航空勘察事务所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退休
鲁幕迅	78	长江日报编辑部	湖北省美术家协会	离休
谭天荣	72	北京大学物理系 53 级学生	青岛大学	退休
锺沛璋	84	中国青年报社	中共中央宣传部	离休
燕遯符	69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北京市纺织局职工大学	退休
戴煌	79	新华社	新华社	离休
戴铭辛	71	北京工学院三系 54 级学生	中国纺织总会	退休

联系地址：100035，北京德内大街花枝胡同 5 号任众

电话：010-61758057 13522148009

电子信箱：honey_h1@163.com

作为一个幸存者，回顾几十年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追忆含冤而死的战友，深深地感到有责任把过去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下来，公之于世，一方面是为了告慰逝者，让他们的灵魂得到些许安慰；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昭示来者，以史为鉴，以史为戒！

——胡显中

黑色文库第24集
阳谋下的人生
胡显中著

My Life as a Pawn in Mao's Political Game
By Hu Xianzhong

Black Series, Volume 24
Washington, DC 2008

ISBN 978-1-931550-24-6
Printed in Hong Kong
USD \$25.00

